

國立中央大學

歷史研究所

碩士論文

後文革時期趙紫陽之研究

(1978-1989)

研究生：黃立中

指導教授：齊茂吉博士

中華民國 96 年 6 月 25 日



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 碩博士論文電子檔授權書

(95 年 7 月最新修正版)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全文電子檔(不包含紙本、詳備註 1 說明)，為本人於國立中央大學，撰寫之碩/博士學位論文。(以下請擇一勾選)

- 同意** (立即開放)
 同意 (一年後開放)，原因是：_____。
 同意 (二年後開放)，原因是：_____。
 不同意，原因是：_____。

以非專屬、無償授權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與國家圖書館，基於推動「資源共享、互惠合作」之理念，於回饋社會與學術研究之目的，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紙本、微縮、光碟及其它各種方法將上列論文收錄、重製、公開陳列、與發行，或再授權他人以各種方法重製與利用，並得將數位化之上列論文與論文電子檔以上載網路方式，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研究生簽名：_____ 黃立中 _____ 學號： 941305019 _____
論文名稱： 後文革時期趙紫陽之研究(1978-1989) _____

指導教授姓名： 齊茂吉 _____

系所： 歷史研究所 博士班 碩士班

日期：民國 96 年 6 月 25 日

備註：

1. 本授權書之授權範圍僅限電子檔，紙本論文部分依著作權法第 15 條第 3 款之規定，採推定原則即預設同意圖書館得公開上架閱覽，如您有申請專利或投稿等考量，不同意紙本上架陳列，須另行加填聲明書，詳細說明與紙本聲明書請至 <http://thesis.lib.ncu.edu.tw/paper.htm> 查閱下載。
2. 本授權書請填寫並**親筆**簽名後，裝訂於各紙本論文封面後之次頁（全文電子檔內之授權書簽名，可用電腦打字代替）。
3. 請加印一份單張之授權書，填寫並親筆簽名後，於辦理離校時交圖書館（以統一代轉寄給國家圖書館）。
4. 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上列論文，應依著作權法相關規定辦理。

摘要

論文名稱：後文革時期趙紫陽之研究（1978-1989）

頁數：134

校所：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研究生：黃立中 指導教授：齊茂吉

中文提要內容：

本論文主要探討的問題有：第一，後文革時期，沒有軍隊背景、相對年輕的趙紫陽，如何從地方大員迅速爬上總理、總書記的職位，其過程是值得探討的。第二，後文革時期中共致力經濟改革，趙紫陽擔任總理時主管經濟工作，趙所扮演的角色將在本文探討。第三，趙紫陽擔任總理與總書記均需要鄧小平的支持，為何在1989年學潮時，兩人立場相左，因此趙與鄧之間互動的變化是值得深入分析的。

晉身中央前，趙紫陽政治敏銳度高，能力強，也能積極配合中央政策，是一個精明幹練的官僚，但或許受限於中共習於鬥爭的政治文化，此前的趙紫陽稱不上有政治理想。1980年成爲總理後，趙紫陽執行鄧小平追求經濟改革開放的意志，同時也受限於政治上的「四個堅持」，以致經濟改革難以順利進行，社會轉型的問題接踵而來，也因此承擔價格改革挫敗的責任；及至升爲總書記，趙紫陽即使想推動政治改革，沒有鄧小平大力支持，也不容易，等到學潮不可收拾，趙竟能堅持自己的理念，不再依附鄧小平的想法，卻也葬送自己的前途。

Abstract

A study of Zhao Ziyang in the late period of Cultural Revolution

(1978-1989)

The main subjects of this thesis are as follow. First, in late perio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ack of military background, relatively young, how does Zhao Ziyang climb rapidly on the positions of the Premier and the General Secretary from a local primary official? Its cause and process are worth probing into.

Second, in the late perio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devoted to the economic reformation. Zhao Ziyang is in charge of economic affairs while taking on the Premier. The role he acts will also be discussed in this thesis.

Third, as Zhao Ziyang serves as the Premier and the General Secretary, he needs Deng Xiaoping's support. Why they stand the opposite positions at 1989 student strike? It is worth deeply analyzing the change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Zhao and Deng.

Before becoming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Zhao Ziyang's is a shrewd and capable bureaucrat, who has highly political sensitivity, well capability and constructively cooperating with the central policy. But perhaps limited to the China Communist Party internal political faction culture; Zhao Ziyang, at that time, does not deserve to be called having a political ideal.

After becoming the Premier in 1980, Zhao Ziyang carries out the Deng Xiaoping's will of pursuing economic reformation and opening-up. Meanwhile, he is also limited to 'The Four Insistences' on politics at the same time. Therefore, the economic reformation is difficult to move on smoothly, the problem caused by the society transition comes one after another. He also bear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goods price reformation failures. When promoted to the General Secretary, even if Zhao Ziyang wants to lend an impetus to political reformation, but without Deng Xiaoping's fully support, it is not easy. Until the student strike is out of control, Zhao no longer depends on Deng Xiaoping's will. He adheres to his own faith and that leads to the end of his political career.

誌 謝

由於大學時期，所學的並非歷史相關科系，對於自己是否有能力可以完成論文，常常感到很惶恐，經過兩年時間，在歷史所師長的薰陶和、指導及鼓勵下，讓自己逐漸找到方向，竟能如期完成論文，此刻心中充滿感動及感恩，也期勉自己繼續秉持努力不懈的精神，在各領域上努力及學習。

首先，我要感謝我的論文指導教授齊茂吉老師，齊師的專業和治學態度，值得欽佩、學習。這兩年來老師在學業上耐心指導與鼓勵我，使我在學術研究的領域中有所成長，順利完成本論文。也感謝吳振漢教授、鄭政誠教授的指導且提供許多寶貴的意見，使本篇論文能更加完整。還有感謝吳學明教授、王成勉教授、賴澤涵教授、李力庸教授、朱德蘭教授的教導，讓我受益良多。

另外，感謝這兩年來一同學習、成長的同學依純、靜玫、文雄、應誠、德瑞、良貞、孟萱、美如、依官、文惠、煒舒、錦昌、宗旺、鳳貞、庚龍、嘉惠、月琴、敬忠、錦萍、世宗、雅鳳、文欣、富宏、美純、堯文、鈺棠、美芳等，謝謝你們這兩年來給我的幫助，與你們一起上課、學習的日子，讓我感到很充實。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父母、太太，你們對我的支持，是我奮發向上的原動力，也要謝謝我的小孩亮亮、元元，你們的配合讓爸爸在白天忙於教職後，能專心於學業研究，在此將這一份成就與喜悅，與你們一同分享。

目錄

	頁次
中文摘要.....	I
英文摘要.....	II
誌謝.....	III
目錄.....	IV
第一章 緒論.....	1
第二章 趙紫陽的崛起.....	15
第一節 建國前在河南成爲土改專家.....	16
第二節 建國後隨南下工作團調廣東.....	22
第三節 文化大革命中下台與復職.....	34
第四節 四川經驗成爲全國改革藍圖.....	44
第三章 總理全國經濟.....	53
第一節 經濟體制改革.....	55
第二節 經濟改革困境.....	65
第三節 1986 年的學潮.....	73
第四節 繼承人的問題.....	78
第四章 直接面對政爭.....	83
第一節 價格改革失敗.....	85
第二節 「反自由化」的干擾.....	89
第三節 政治改革牛步.....	96
第四節 天安門事件.....	105
第五章 結論.....	115
徵引書目.....	125

第一章 緒論

壹、研究動機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1915-1989）去世時，學生藉口悼念胡耀邦發起示威請願，要求進行政治改革，解決權貴「投機倒把」¹的社會不公平現象。²1989年6月4日，中共在天安門廣場調集軍隊，武力鎮壓舉世矚目的學潮，釀成「六四天安門事件」。6月24日，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指出：「極少數人利用學潮，在北京和一些地方掀起一場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動亂，進而在北京發展成了革命暴亂。他們策動動亂和暴亂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這場嚴肅的政治鬥爭中，黨中央的決策和採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都是必要的和正確的，得到了全黨全國人民的擁護。」³但是1989年的學潮雖然主張政治改革，卻也支持共產黨執政，當時也沒有任何政治組織能與共產黨抗衡。

十三屆四中全會也通過李鵬（1928-）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關於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認為趙紫陽（1919-2005）「在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錯誤，對動亂的形成和發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其錯誤的性質和造成的後果是極為嚴重的。他在擔任黨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期間，雖然在改革開放和經濟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指導思想上和實際工作中也有明顯失誤。特別是他主持中央工作以來，消極對待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方針，嚴重忽視黨的建

¹ 這是大陸俚語；因為後文革時期法律修訂速度無法跟上經濟發展，所以「投機到把」常被拿來形容各式各樣經濟犯罪。

²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下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年），頁944；陳一諮，《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頁149。。

³ 丁望編，《六四前後》，下冊（臺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95年），頁149-150。

設、精神文明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給黨的事業造成嚴重的損失。」⁴因此，同情學生、主張與學生對話的趙紫陽在 1989 年 6 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仍舊表示：「廣大學生要求改革、反對腐敗的熱情是可貴的，是應該予以充分肯定的。」⁵雖然趙紫陽貴為總書記，且一度被認為是鄧小平（1904-1997）的接班人，竟然就此被撤銷一切職務，軟禁終身。

1978 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鄧小平掌握權力，深知人民厭倦政治鬥爭，因此致力於改善經濟；而趙紫陽在四川成功推動包產到戶，改善四川經濟，為自己打開晉身中央的門票；在 1980 年至 1989 年任職總理與總書記期間，推動了中國農村改革、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鄧小平提出國家發展的戰略，關於沿海地區的發展、農業、價格改革、工業改革等經濟政策，趙紫陽可說是鄧政策忠實且重要的執行者。從 1980 年到 1989 年，趙紫陽極具改革開明的形象，擔任總理期間推動的農業改革頗有成效，但論及整體經濟結構的改革並不順遂，經濟政策的改革開放也因而進進退退，在這樣的政績下，鄧小平在 1987 年支持趙紫陽接替胡耀邦成為總書記，並在 1989 年鄧趙因為對待學潮理念不同產生尖銳矛盾，趙紫陽也因而下台。改革 10 年（1980-1989）是中國經濟成長與社會轉變的重要時期，也正是趙紫陽晉身中央到黯然下臺，權力達到巔峰的 10 年。因此，趙紫陽擔任總理、總書記的作為，應該能反映出中國 1980 年至 1989 年政治經濟發展的曲折。

鄧小平在 1978 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成為中共最有權力的人。因此，趙紫陽擔任總理與總書記期間，勢必需要鄧小平的支持。換言之，趙紫陽推動政策，勢必積極配合鄧小平的態度與想法；這是否也意味著趙紫陽在 1989 年學潮時，與鄧小平出現無法協調的矛盾。為何趙紫陽能在 1989 年學潮前能配合鄧小平，卻在學潮時立場鮮明的對抗呢？趙紫陽與鄧小平間的互動，對中共政經情勢的影

⁴ 丁望編，《六四前後》，下冊，頁 150。

⁵ 趙紫陽，〈1989 年 6 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收於袁會章主編，《趙紫陽最後的機會》（香港：明鏡出版社，1997 年），頁 197-216。

響，是值得研究探討的。沒有在軍隊歷練過的趙紫陽，以相對年輕的地方大員迅速成爲中央要員，這中間的過程也是需要深入討論的。

貳、題目界定

本論文的題目是「後文革時期趙紫陽之研究（1978-1989）」，在此就題目中的關鍵詞彙、研究範圍與時間斷限做一番界定。

首先，「後文革時期」是指 1978 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結束文革以來的混亂，掌握大權，並揭示中共全力改善經濟的政策；這也成爲致力改善四川經濟有成的趙紫陽晉身中央的契機。在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主政期間，文革雖然結束，但是平反文革的工作仍持續多年，改革與保守的勢力在政治上的對立直至趙紫陽下台也未曾緩解；因此，1978 年以後中共政局仍受文革影響，可稱爲後文革時期。

其次，主角趙紫陽是位除軍隊的歷練外，黨政資歷完整的中共高層政治人物，青年時代即加入中國共產黨青年團，積極推動土改；建國以後在廣東表現搶眼，成爲當時最年輕的省級領導幹部，雖然文化大革命中下台，卻也是第一批獲得重新啓用的老幹部；其後以四川的政績晉身中央，1980 年擔任總理，1987 年接任總書記直至 1989 年下台。另外，「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是指鄧小平所設定中國 1980 年至 1989 年的發展策略，一個中心是指中國以發展經濟爲中心，兩個基本點則是指以改革開放與「四個堅持」爲基本方針。

再者，「六四天安門事件」是指 1989 年因胡耀邦去世，學生藉由悼念胡而引發的大規模學潮，因爲中共高層決定在 6 月 4 日以武力鎮壓和平請願，也稱做「六四事件」；這次學潮基本上是民衆要求政治改革，解決改革開放造成的社會不公，

學潮的主要份子多為大學生，但也有知識份子聲援學潮的訴求，並引起其他階層的市民加入。學潮聲勢浩大，除了北京外，其他城市也出現請願活動，但位於鄉村的農民卻始終沒有捲入這場抗爭，雖然部份以趙紫陽為首的中共高層幹部同情學潮，主張以溫和方式處理，卻無法的得到鄧小平與軍事系統的支持，因此溫和處理學潮或強硬處理學潮，造成中共高層兩派人馬的對抗，導致趙紫陽的下台。

至於時間的斷限上，主要以趙紫陽晉身中央後，在 1978 年到 1989 年中共推動改革開放期間，趙紫陽以治理四川的政績，被鄧小平提拔為總理與總書記的角色為主要討論範圍。由於鄧小平非常重視改革開放的推動，但也不願共黨專政受到挑戰，因此鄧在選人用人方面特別慎重，往往留意政治保守與改革開放的勢力間的權力平衡，因此趙紫陽在改革中的角色及功能，主要取決於鄧小平的態度。從歷史淵源來看，趙紫陽的崛起，和他在地方上的政績，以及善於利用宣傳機器增加曝光率，同時對政治風向判斷敏銳有很大的關係；因此 1980 年之前，趙紫陽的崛起背景時期，會列入討論範圍。而 1989 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及其對中共高層改革與保守勢力的消長的影響，這一過程，可看出趙紫陽在這關鍵時刻的所扮演的角色，也讓趙海內外聲望達於頂峰，在其個人卻是受到軟禁的待遇，因此六四事件期間也是列入討論範圍內的。

參、研究回顧

由於筆者以趙紫陽在後文革時期，1978 年至 1989 年改革開放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主要問題，因此對於在此時期與趙紫陽有關的研究，都有必要加以回顧與檢討。目前以「趙紫陽與改革開放」相關的學術論文有盧伯華的〈趙紫陽研究〉⁶、胡國君的〈趙紫陽崛起之研究〉⁷、陳漢昕的〈趙紫陽之研究-經濟路線探源〉⁸；

⁶ 盧伯華，〈趙紫陽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 年）。

⁷ 胡國君，〈趙紫陽崛起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1981 年）。

與趙紫陽相關的學術論文則有翁振發的〈中共國務院之研究〉⁹、李冬華的〈中共「胡趙體制」之研究〉¹⁰、國安民之〈八十年代中共改革派之興起與變遷〉¹¹等。

盧伯華的〈趙紫陽研究〉一文中，認為中共的改革開放政策可以說是自中共文革以來最重要的施政方針，它大幅度地改變了中國大陸的經濟面貌及中共的國際形象。趙紫陽自改革政策推行以來即擔任中共總理，繼而升任總書記直至「六四事件」後遭罷黜，從趙的個人的經歷討論中共改革政策由發軔至受挫的一個完整階段。此文完成時尚有相關資料未公開，作者對趙紫陽的描述多引述自趙蔚的《趙紫陽傳》¹²，有失偏頗，對鄧小平與趙紫陽的互動也未深入探究。

胡國君的〈趙紫陽崛起之研究〉一文中，其時間斷限由趙紫陽的出生 1919 年至 1980 年擔任總理，討論趙憑藉哪些條件晉身中央，胡國君認為趙紫陽四川的政績與敏銳的政治判斷是受到鄧小平賞識的主因。作者由於資料的限制，引用外國學者的統計資料，或中共官方的宣傳文章，缺乏第一手資料及其他文獻比較，因此對趙紫陽的能力與聲望的評價過高，忽略趙在政治鬥爭中為求生存，在政治上缺乏理想性的特色。另外，趙紫陽既然依賴鄧小平的支持，那趙紫陽如何獲得鄧小平信任的原因，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

陳漢昕的〈趙紫陽之研究-經濟路線探源〉一文中，認為 80 年代中共正於大陸進行一系列的「變革」，其中尤以經濟變革的幅度較大，速度較快，也最為世人所注目，而從整個經濟變革的焦點來看，似乎又集中在以「四川經驗」發跡。作者認為趙紫陽的竄升是掌握了機會主義、鬥爭經驗及工作表現三者同時並進而

⁸ 陳漢昕，〈趙紫陽之研究-經濟路線探源〉（桃園：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1982 年）。

⁹ 翁振發，〈中共國務院之研究〉（台北：文化大學大陸問題研究所碩士論文，1982 年）。

¹⁰ 李冬華，〈中共「胡趙體制」之研究〉（桃園：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1984 年）。

¹¹ 國安民，〈八十年代中共改革派之興起與變遷〉（桃園：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 年）。

¹² 趙蔚，《趙紫陽傳》（北京：中國新聞出版社，1989 年）。

僥倖達成的；中共所高喊的一切變革，只是證明了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之不能適用於中國的預言；消滅私有財產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任務，然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來看，中共實踐共產主義卅多年，唯一檢驗出的真理是：「消滅私有財產，才是人類社會最大的悲哀。」以上述內容觀之，本文作者過份表現其意識型態，忽略中共鄧小平等高層幹部堅持共黨專政的決心，即使趙紫陽本人也從未對共產黨失去信心，即便是 1989 年發動學潮的學生，其訴求也沒有挑戰共產黨的執政。

其他與趙紫陽相關的學術論文，如翁振發的〈中共同務院之研究〉一文中，以中共憲法內容討論國務院縮減編制的成效，翁振發認為無法達成黨政分離的作用；但是作者卻忽略了趙紫陽可在縮減編制的過程中，重組資源並成功引進年輕有能力的人才，同時讓自己透過人事安排迅速掌控國務院。李冬華的〈中共「胡趙體制」之研究〉一文中，討論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等集體領導的可行性；李冬華認為中共內部權力鬥爭反覆無常；在「人民民主專政」，不僅政治上未上軌道；而在「四化」的口號下，經濟亦未見好轉；中共力求改革，無法挽救搖搖欲墜的政權。不可否認中國的迅速發展伴隨著各種難以解決的問題，但就此否定中共對合理化引進領導人才的努力，雖然幹部更替的成果不符中共高層預期，卻仍有提升中共人才素質的成效。國安民之〈八十年代中共改革派之興起與變遷〉一文其時間斷限是由 1976 年 10 月「四人幫」垮台起至 1989 年 6 月趙紫陽下台為止這段期間為主，主要在討論胡耀邦、趙紫陽下台原因及改革所遇到的各種困境。國安民認為中共意識形態的自我設限，使其無法避免改革與開放兩派的鬥爭；但是本文卻忽略中共所面對的情勢並無前例可循，「摸著石頭過河」卻是其無法避免的發展方式，而鄧小平的態度與支持則是局勢發展的關鍵。以上與趙紫陽相關的學術論文，多半成文於趙紫陽下台前，其引用的資料或缺乏第一手資料的佐証，或表現出強烈的意識形態，均使趙紫陽在改革開放期間的作為有深入討論的必要。

與趙紫陽相關的專書則有袁會章主編的《趙紫陽最後的機會》¹³、張昕、張淑華主編的《他終於自由了-趙紫陽逝世風雲錄》¹⁴、陳一諮、嚴家其主編的《趙紫陽與中國改革》¹⁵，而與趙紫陽生平傳記有關的論著，有趙蔚的《趙紫陽傳》、劉守森的《年輕時的趙紫陽》¹⁶、桑鮑著、陳瑋譯的《趙紫陽：地方干部到總理》¹⁷、沈大為等著、徐澤榮譯的《趙紫陽》¹⁸等。

袁會章主編的《趙紫陽最後的機會》一書中，主要討論趙紫陽於 1989 年下台後復出的機會，其討論焦點超出本文範圍，但是書中同時收錄趙紫陽在六四事件後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講話，是相當重要的參考資料。張昕、張淑華主編的《他終於自由了-趙紫陽逝世風雲錄》一書則是收集悼念趙紫陽的文章與相關報導，其討論焦點超出本文設定之範圍。陳一諮、嚴家其主編的《趙紫陽與中國改革》是以趙紫陽 85 歲（2004 年）生日時，由前改革派官員、知識分子、異議人士共同參與的研討會發表內容為主，探討趙紫陽的政治與經濟改革理念，同時也描述趙紫陽的個人特質；本書同時也收錄於中共十五大代表大會發表的〈趙紫陽的公開信（1997 年 3 月 5 日）〉，是相當重要的參考資料。

趙蔚的《趙紫陽傳》一書中，作者以其社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並透過滑縣黨委劉守森獲得一手資料，描述趙紫陽的生平，但是除了羅列文獻資料外，趙蔚並未有深入探討趙紫陽的見解；而書中聲稱趙紫陽在四川開創農業改革之先聲，事實上應該是萬里（1916-）最先在安徽實行包產到戶，趙紫陽稍後在四川實行類似政策，彼此沒有模仿，時間卻有先後。相較於趙蔚，沈大為等著的《趙紫陽》，

¹³ 袁會章主編，《趙紫陽最後的機會》。

¹⁴ 張昕、張淑華編，《他終於自由了-趙紫陽逝世風雲錄》（加州：博大出版社，2005 年）。

¹⁵ 陳一諮、嚴家其主編，《趙紫陽與中國改革》（香港：明鏡出版社，2005 年）。

¹⁶ 劉守森，《年輕時的趙紫陽》（香港，太平洋世紀出版社，2006 年）。

¹⁷ 桑鮑著、陳瑋譯，《趙紫陽：地方干部到總理》（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88 年）。

¹⁸ 沈大為、寒山碧、范言、陸鏗著、徐澤榮譯，《趙紫陽》（台北：日知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2 年）。

則從趙紫陽的「曝光率」與爲了生存所採取的「機會主義」，說明其迅速決起的原因，這樣的觀點尙稱中肯；但是在第一手資料的搜羅上，是明顯遜於趙蔚的。桑鮑著、陳瑋譯的《趙紫陽：地方干部到總理》一書，其內容多爲趙紫陽生平大事的編年紀錄，是對照趙紫陽與中共重大事件時的參考書，但是在討論趙紫陽個人內涵的部份則不如趙蔚。劉守森的《年輕時的趙紫陽》一書中主要討論趙紫陽在建國以前留在根據地所作所爲，說明了趙紫陽家庭背景，同時也詳細描述趙紫陽在滑縣生活方面的資料。

另外，還有透過相關專書的蒐集和整理，從中找尋有關的論述，加以整理分析，也有助於了解趙紫陽在文革中所扮演角色。如：陳永發的《中國共產革命的七十年》、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¹⁹、袁會章主編的《趙紫揚最後的機會》、張昕、張淑華主編的《他終於自由了-趙紫陽逝世風雲錄》、陳一諮、嚴家其主編的《趙紫陽與中國改革》、許家屯的《許家屯香港回憶錄》²⁰、高舉的《後文革史》²¹、陳一諮的《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丁望的《六四前後》、陳小雅的《天安門之變-八九民運史》²²等。

由以上的回顧可看出，關於趙紫陽在 1980 年至 1989 年改革開放時期相關的資料頗多，但是香港與台灣方面的資料多屬於臆測，並沒有一手資料的支持；而大陸方面的資料則多半屬於政績的宣傳或社會現象的探討，對趙紫陽的作爲並沒有加以分析。因此，如何比較多方資料了解真相，值得再去深入還原和探討。

¹⁹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6 年）。

²⁰ 許家屯，《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上、下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3 年）。

²¹ 高舉，《後文革史》，上、中、下卷（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3 年）。

²² 陳小雅，《天安門之變-八九民運史》（台北：風雲時代出版事業公司，1996 年）。

肆、資料運用與研究方法

資料運用方面，在 1978 年至 1989 年與趙紫陽有關的資料，將是蒐集上的重點，並試圖利用一些中共已開放的檔案資料、相關的黨史著作、有關的專書和期刊論文，來了解趙紫陽在文革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處境。

由於趙紫陽去世不久，趙的下台與軟禁及其對六四事件的態度，都有頗多爭議，目前官方檔案開放的程度還不高，因此在研究上有一定的困難。「一般的研究者，包括海外的研究者，要想直接利用第一手的檔案資料全面地研究中共的歷史，幾乎是不可能的。……有相當一部分原因就是因為他們能看到的 firsthand 檔案資料太少，以致於不能不更多地利用主觀的推測或並不可靠的各種二手資料。當然，現狀如此，不等於不能研究，畢竟，即使就中共歷史檔案而言，其開放程度較前已有相當進步。」²³直接查閱原檔有其困難，因此利用經過整理和編輯的已出版檔案資料，就成了研究趙紫陽的一種重要選擇。

在史料檔案方面：從中共一些重要的史料需要加以注意，如：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²⁴內容包括中共中央的指示、政令宣導、政策說明、重要人物的講話紀錄和批示等；另外，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²⁵、《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²⁶、《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²⁷等也都收錄了部分中共建國後的一手檔案資料。

²³ 楊奎松，〈淺談中共歷史檔案的利用與研究〉，《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總期 27（1999 年 3 月），頁 137。

²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1-20 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1998 年）。

²⁵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

²⁶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

²⁷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

至於改革開放時期與趙紫陽有關的期刊和報導，中國大陸、香港、台灣方面的都有相關資料，如：中國大陸的《新華月報》、《紅旗》、《黨史資料通訊》，香港的《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動向》、《爭鳴》，台灣的《國魂》、《中國大陸研究》等。

趙紫陽本人曾多次在《紅旗》發表文章，通常都是配合政治運動或是宣傳自己的政績，例如：〈奮發努力加快四川建設，為國家為人民多做貢獻〉²⁸、〈大搞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加速農民思想的無產階級革命化，廣東農村開展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的基本情況和經驗〉²⁹、〈鞏固第一批社，辦好第二批社，迎接互助合作運動高潮〉³⁰等，透過宣傳機器替自己爭取曝光率。

香港與台灣的期刊與報導則可分兩個時期討論，分別是趙紫陽擔任總理時期與擔任總書記時期。趙紫陽擔任總理期間，期刊與報導多討論大陸經濟建設與經濟政策，例如：〈農工商聯合企業-中國的一種新事物〉³¹、〈從進口狂潮到緊急剎車〉³²、〈趙紫陽報告受批評〉³³等，其內容多半肯定經濟的改革開放，但是對伴隨而來的社會弊病與經濟犯罪亦感憂心。趙紫陽擔任總書記期間的刊物與報導，則牽涉中共的人事鬥爭，及其後社會轉型問題、政治改革緩慢的討論，例如：〈十二屆六中全會的妥協〉³⁴、〈高層人事塵埃初定〉³⁵、〈全民怨憤的物價問題〉³⁶、

²⁸ 趙紫陽，〈奮發努力加快四川建設，為國家為人民多做貢獻〉，《紅旗》，期1（1978年1月），頁16-23。

²⁹ 趙紫陽，〈大搞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加速農民思想的無產階級革命化，廣東農村開展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的基本情況和經驗〉，《紅旗》，期10（1966年8月），頁14-25。

³⁰ 趙紫陽，〈鞏固第一批社，辦好第二批社，迎接互助合作運動高潮〉，《華南農村》，總期18（1954年6月），頁3-5。

³¹ 劉相齊，〈農工商聯合企業-中國的一種新事物〉，《經濟報導》，總期1667（1980年4月），頁25-27。

³² 齊辛，〈從進口狂潮到緊急剎車〉，《九十年代》，期6（1985年6月），頁47-51。

³³ 羅冰，〈趙紫陽報告受批評〉，《爭鳴》，期1（1983年1月），頁12-15。

³⁴ 林衛，〈十二屆六中全會的妥協〉，《九十年代》，期11（1986年11月），頁22-25。

³⁵ 齊辛，〈高層人事塵埃初定〉，《九十年代》，期5（1987年5月），頁35-37。

³⁶ 余集文，〈全民怨憤的物價問題〉，《九十年代》，期2（1988年2月），頁52-53。

〈專訪張五常：趙紫陽對當前經改的想法〉³⁷、〈參與設計者的獻議-高放談政治改革〉³⁸、〈給李代總理打幾分〉³⁹、〈北京：無盡的憂慮〉⁴⁰、〈揭開北戴河會議的面紗〉⁴¹等，此時期刊文章多認為改革開放一方面提振經濟，但另一方面社會轉型卻也始終讓中共內部倍感壓力，於是人事的起落備受矚目，〈專訪張五常：趙紫陽對當前經改的想法〉一文甚至提出鄧小平應賦予趙紫陽更大的權力與自主權，反映出鄧趙兩人權力分配上的矛盾。

相關人物的傳記或年譜，以及中共的黨史相關出版品，裡面提供相當多的參考資料，但在運用方面，要與其他史料作比對，避免陷入編纂者因其個人意識形態或情感因素，而導致失真的陷阱，如：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鄧小平年譜（1975-1997）》⁴²、劉魯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要事錄（1949-1989）》⁴³、鄧小平的《鄧小平文選》⁴⁴、吉林省中共黨史學會編的《新中國紀事（1949-1984）》⁴⁵等。

其他資料在報紙和期刊的部分，《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都是重要的資料，趙紫陽個人就曾多次再這些刊物發表文章，爭取曝光。還有一些大陸方面的期刊資料，如：《新華月報》、《動向》、《七十年代》、《九十年代》等，裡面有些相關的文章，有助於了解部分趙紫陽在改革開放時期的經歷和處境，不過內容多有宣傳和歌功頌德的意味，在運用上要適當的解讀，才能反應真正的事件始末。

³⁷ 李怡、方蘇，〈專訪張五常：趙紫陽對當前經改的想法〉，《九十年代》，期 10（1988 年 10 月），頁 17-21。

³⁸ 李怡、方蘇，〈參與設計者的獻議-高放談政治改革〉，《九十年代》，期 12（1988 年 12 月），頁 58-64。

³⁹ 林衛，〈給李代總理打幾分〉，《九十年代》，期 2，頁 46-48。

⁴⁰ 童顏怡，〈北京：無盡的憂慮〉，《九十年代》，期 6（1988 年 6 月），頁 35-37。

⁴¹ 齊辛，〈揭開北戴河會議的面紗〉，《九十年代》，期 9（1988 年 9 月），頁 16-19。

⁴²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 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⁴³ 劉魯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要事錄（1949-1989）》（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9 年）。

⁴⁴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卷 3（台北：地球出版社，1994 年）。

⁴⁵ 吉林省中共黨史學會編，《新中國紀事（1949-1984）》（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 年）。

研究方法部分，是以歷史研究法為主，檢視歷史的紀錄和資料，重建歷史的事實，發現因果關係。在此將透過官方的檔案資料、傳記年譜、期刊報紙和有關專書的研究和分析，並試圖避免其中宣傳和渲染的部分，加以適當的解讀，藉此來了解趙紫陽在 1978 年至 1989 年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並深入探索趙紫陽與鄧小平從彼此配合到立場相左所造成的人事變化。

伍、論文架構

本論文共分成五章，第一章是緒論，第五章是結論。第二章是關於趙紫陽崛起的背景，下分四節：第一節說明趙紫陽 1919 年至 1951 年在河南家鄉入黨，從基層幹部從事農業、宣傳、組織等工作的經歷；這一段時間趙紫陽經歷不同性質的工作，是否能讓其資歷獲得中共黨內的承認是需要去了解的。第二節說明趙紫陽從 1952 年至 1965 年南調廣東時，在此起彼落的政治運動中迅速陞遷；隨南下工作團到廣州是趙紫陽相當活躍的時間，進而了解趙紫陽為何能平步青雲。第三節說明 1966 年 1975 年文化大革命中，隨著陶鑄（1908-1969）的失勢，趙紫陽跟著失去權力已及其後復職的過程；從這一段的經歷，可了解為何趙紫陽能在平反後獲得鄧小平的信任。第四節則說明 1976 年至 1979 年趙紫陽領導的四川經濟改革，獲得中央青睞，成為全國經濟改革的樣板；也因為這個政績，使鄧小平決定提拔趙紫陽到中央更大的舞台。

第三章是關於趙紫陽在擔任總理期間，中共上下積極改善經濟，但是在四個堅持的意識型態的限制下，趙紫陽總管經濟工作的作為。內容分為四節，第一節是討論經濟體制改革的內容，以趙紫陽 1982 年提出的六年經濟計劃，「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為方針，了解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的設計。第二節是討論經濟改革所面臨的困境，了解政策、政治結構、商品市場無法跟著進行改革的情形。第三節討論 1986 年的學潮引發的權力鬥爭，並從其他角度討論胡耀邦、鄧

小平、趙紫陽間的矛盾。第四節討論中共素來權力如何轉移，並從胡耀邦在 1986 年學潮後，討論鄧小平與趙紫陽如何面對胡耀邦的去職。

第四章是討論關於趙紫陽接任總書記後，經過價格改革的失敗，失去總管經濟大權，並於天安門事件中堅持溫和處理學潮的立場，終至下台被軟禁終身的過程。本章內容分爲四節，第一節討論價格改革的提出與失敗的原因，並討論價格改革對趙紫陽的影響。第二節討論層出不窮的「反自由化」運動的干擾，藉此討論鄧小平在政治事務與經濟事務上的態度，以及趙紫陽如何因應「反自由化」運動。第三節討論政治改革窒礙難行，卻因爲經濟改革的擴大，不可避免的觸及政治結構的問題，從趙紫陽提出的政治改革的設計與實行的成果，了解鄧小平與黨內幹部的態度。第四節討論六四天安門事件對趙紫陽的影響，並從黨內矛盾去解釋趙紫陽的處境與最後下台的原因。

第二章 趙紫陽的崛起

趙紫陽 1938 年加入共產黨以後，開始其政治生涯，1980 年出仕中央，本章依趙其崛起前（1916-1979）分四小節敘述。第一節說明趙紫陽 1919 年至 1951 年在河南家鄉入黨，從基層幹部從事農業、宣傳、組織等工作的經歷；第二節說明趙紫陽從 1952 年至 1965 年南調廣東時，在此起彼落的政治運動中迅速陞遷；第三節說明 1966 年 1975 年文化大革命中，隨著陶鑄的失勢，趙紫陽跟著失去權力已及其後復職的過程；第四節則說明 1976 年至 1979 年趙紫陽領導的四川經濟改革，獲得中央青睞，成為全國經濟改革的樣板。

1980 年代以來，共黨國家因為計劃經濟運作失敗被迫改革，俄國的戈巴契夫（1931-）透過黨國機器的變革，促使政治結構的轉型；大陸的鄧小平則先在經濟制度做出變革，避免觸及黨國機器變革的問題。¹中共計劃經濟的基礎是透過「統購統銷」低價收購農產品，再將累積的資本發展重工業；鄧小平於文革後掌權體認到經濟改革迫切需要，²鼓勵務實的經濟改革，於是農業上「包產到戶」又重新試用，工業上則提出經濟特區的概念。³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最早的始點是在安徽和四川，在四川就是趙紫陽領導的，所謂「要吃糧，找紫陽」就是四川流傳的一句話。因此，文革後支持經濟改革、形象開明的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等人，便調到北京成為鄧小平推動經濟改革的助手。

¹ 李英明，《向鄧後時代轉折》（台北：生智出版社，1999 年），頁 93-94。

² 文革結束象徵大陸對政治鬥爭不再熱情，同時經濟狀況也相對惡化；1978 年的農業人口從 1949 年 81.4% 升為 84%，個人生產量卻從 1956 年的 612 斤降為 590 斤，可是化學肥料與機械馬力都是增加的。陳一諮，《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頁 22。

³ 包產到戶又稱「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俗稱「大包干」，1960 年已經出現，它改變統購統銷的生產方式，允許農民擁有剩餘農產品；當時毛澤東並不認同而取消；1978 年安徽農民又開始試用這一方法，並成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在中國農村推動的一項重要改革。陳一諮，《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頁 13-15。

鄧小平從華國鋒手中取得中共意識形態的主導權後，更在 1982 年十二大正式確立了人事主導權，展開鄧小平的時代。⁴在鄧小平復出之後，趙紫陽和萬里曾經是省委書記中鼎力支持鄧小平瓦解農業公有制的幹將，率先分田，因此受到鄧小平的器重，調中央工作。趙紫陽從 1978 年開始擔任中央重要職務，1978 年 2 月至 1983 年 6 月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第一節 建國前在河南成爲土改專家

趙紫陽原名叫趙修業，中學時期改名爲趙紫陽。1919 年 10 月 17 日出生於河南省北部的滑縣桑村鄉趙莊一個地主家庭，是家中的獨生子；父親趙廷賓，家裡擁有田產數十畝和穀倉。⁵1920 年代北洋政府在趙莊成立滑縣第十七小學，這所新式小學便成了趙修業的啓蒙學校；⁶當時還聘請了外縣及外省的教員，帶來新的觀念，其中有些是共產黨員，1930 年代的滑縣第十七小學便是共產黨地下組織活動區域之一。⁷1932 年九一八事變後中共地下組織在河南積極活動，⁸當時滑縣縣委聶真（1908-2005）與組織部部長胡敬一（1902-1965），⁹吸收桑村完小（按：原第十七小學）校長楊慶然（?-?) 與教員徐仲三（?-?) 加入共產黨，成

⁴ 在鄧小平的主導下，1981 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毛澤東思想定位爲中共領導人的集體智慧結晶，避免毛澤東思想淪爲派系鬥爭工具。李英明，《向鄧後時代轉折》，頁 16-20。

⁵ 張昕、張淑華編，《他終於自由了-趙紫陽逝世風雲錄》，頁 10。

⁶ 趙蔚，《趙紫陽傳》，頁 12。

⁷ 1931 年中共在滑縣成立縣委，由聶真主持，下轄三個支部，桑村支部便設在第十七小學。中共滑縣縣委黨史辦公室編，《中共滑縣黨史大事記 1925-1987》，上編（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13；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編委會編，《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大事記》（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87 年），頁 10；聶真，〈關於滑縣革命運動和建黨過程的一段回憶〉，收於中共安陽地委黨史資料整編委員會編，《安陽地區革命回憶錄選》（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149-150；胡敬一，〈我在滑縣搞建黨工作的情況回憶〉，《黨史資料通訊》，期 1（1986 年 1 月），頁 23。

⁸ 1932 年「九一八事變」以後，中共在冀南號召民眾參加抗日活動，1935 年已有黨員與共青團二千多人。楊波，〈匪晉冀魯豫邊區老根據地〉，《匪情研究》，期 325（民國 54 年 4 月），頁 81。

⁹ 聶真：1908 年生於河南滑縣。1930 年 11 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 年後回滑縣建立中共滑縣縣委，任縣委書記；1937 年任冀魯豫省委工作委員會組織部部長，創建晉豫抗日根據地。胡敬一：原名侯介槐，1933 年在山東被捕，文革中被迫害而死。參閱中共滑縣縣委黨史資料整編委員會，〈中共滑縣黨史人物簡介〉，《黨史資料通訊》，期 1（1986 年 1 月），頁 62-64。

立桑村黨支部；¹⁰同年不滿 13 歲的趙修業在桑村的教室裡宣誓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¹¹，其介紹人就是徐仲三。¹²

1932 年中共滑縣縣委發動鬥爭，隨即遭到國軍鎮壓，滑縣中共幹部星散；¹³與共黨幹部失去聯繫的趙修業在接下來的時間順利完成滑縣完小的學業，考取開封第一中學，並於 1936 年畢業，十八歲（1937）進入武昌高級中學就讀，並自行改名為「紫陽」。¹⁴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趙紫陽決定輟學北上回鄉。¹⁵

中日戰爭爆發後，趙紫陽回到滑縣，直到戰爭結束都在冀魯豫邊區活動；鄧小平、范子文（1909-1975）、謝富治（1909-1972）、黃鎮（1909-1989）、李雪峰（1907-2003）、劉伯承（1892-1986）、薄一波（1908-2007）、蘇振華（1912-1979）、宋任窮（1909-2005）、王任重（1917-1992）等過去中共的領導人，都曾在當時的冀魯豫邊區工作，1944 年後可能與趙紫陽有所接觸。¹⁶日本入侵河南後，滑縣成為冀魯豫邊區第三特區的一部，1938 年 2 月 19 歲的趙紫陽加入中國共產黨，

¹⁰ 胡敬一，〈我在滑縣搞建黨工作的情況回憶〉，《黨史資料通訊》，期 1，頁 23-24。

¹¹ 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簡稱中國共青團或共青團）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個由中國信仰共產主義的青年組成的的群眾性組織。其前身是 1920 年 8 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2 年 5 月，在中國共產黨的直接領導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開始成立一個全國統一的組織。1925 年 1 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46 年 10 月改為民主青年團。1949 年 1 月改為新民主主義青年團。1957 年 5 月改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共青團不是共產黨員錄用的唯一途徑，卻是最重要的。沈大為、寒山碧、范言、陸鏗著、徐澤榮譯，《趙紫陽》，頁 219-220；〈趙紫陽簡歷〉，《人民日報》，1980 年 9 月 11 日。

¹² 趙紫陽在 1967 年 5 月 26 日文革期間會見「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代表時曾說明其加入共青團的情形，但是加入時間有 1932 年 3 月與 6 月兩種說法。參閱廣州軍區聯合辦公室編，《反應情況》，期 19（1967 年 5 月 31 日），轉引自中共滑縣縣委黨史辦公室編，《中共滑縣黨史大事記 1925-1987》，上編，頁 13；張昕、張淑華編，《他終於自由了 趙紫陽逝世風雲錄》，頁 10。1932 年滑縣並沒有獨立的共青團，趙紫陽年紀尚小也沒有管道自行加入，因此透過黨組織吸收共青團團員，在當時並不奇怪。參閱趙蔚，《趙紫陽傳》，頁 15-16。

¹³ 中共滑縣縣委黨史辦公室編，《中共滑縣黨史大事記 1925-1987》，上編，頁 15；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編委會編，《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大事記》，頁 9。

¹⁴ 趙蔚，《趙紫陽傳》，頁 21-22。

¹⁵ 中共滑縣縣委黨史辦公室編，《中共滑縣黨史大事記 1925-1987》，上編，頁 22。

¹⁶ 當時八路軍之一的第一二九師在晉冀魯豫邊區建立根據地，下轄晉冀豫戰區與冀魯豫戰區，師政委就是鄧小平。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篇 3（台北：正中書局，1965 年），頁 34；沈大為、寒山碧、范言、陸鏗著、徐澤榮譯，《趙紫陽》，頁 20。

接著擔任滑縣工作委員會書記、滑縣縣委書記，開啓政治生涯。¹⁷

1937 年回到滑縣的趙紫陽尚未與共黨幹部取得聯繫，面對紛亂的戰爭局勢，便和同鄉青年成立「通俗學社」，宣傳抗日；同年 10 月，中共派員回到滑縣恢復黨組織，至年底已有七十個支部，二百多黨員，發展迅速。¹⁸1938 年與滑縣共黨幹部取得聯繫後，於 4 月被派到太行山區北方局冀魯豫省委黨校學習，期間正式成爲共產黨員。¹⁹趙紫陽從小學、中學，直到 1937 年 7 月中日戰爭爆發輟學，加入中共冀魯豫省委黨校學習，雖未受過高等教育，也沒有出國；但是在當時已經是難得的受到完整的教育，使趙紫陽有較豐富的知識與更寬廣的視野。²⁰

1938 年 9 月趙紫陽離開黨校回到家鄉擔任滑縣工作委員會書記，當時滑縣共產黨員已將近千人；²¹此時共軍攻佔滑縣縣城，雖然 11 月得而復失爲日軍所奪，但是已經讓發展黨員的工作獲得進展，至年底黨員已達二千人。²²1939 年共軍進駐滑縣，趙紫陽推動黨務更爲順利，同年滑縣工委改稱縣委，並組織地方武力，自成格局；²³同時成立「抗日訓練班」，離開黨校不久的趙紫陽親自授課，大批介紹青年入黨。²⁴3 月，在趙紫陽的運作下，國民黨政府委任的滑縣縣長率眾三百人脫離國民黨政府，加入共產黨，使得國共兩黨在滑縣勢力出現明顯的消

¹⁷ 沈大爲、寒山碧、范言、陸鏗著、徐澤榮譯，《趙紫陽》，頁 20。

¹⁸ 中共滑縣縣委黨史辦公室編，《中共滑縣黨史大事記 1925-1987》，上編，頁 22-23。

¹⁹ 冀魯豫省委黨校：由劉柏承所率領的 129 師所辦的抗日軍政訓練學校，當時 129 師的政委正是鄧小平。參閱廣州軍區聯合辦公室編，《反應情況》，期 19（1967 年 5 月 31 日），轉引自中共滑縣縣委黨史辦公室編，《中共滑縣黨史大事記 1925-1987》，上編，頁 13。

²⁰ 沈大爲、寒山碧、范言、陸鏗等著，徐澤榮譯，《趙紫陽》，頁 20。

²¹ 當時中共中央發表〈關於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指示：「大量地千百倍地發展黨員，成爲黨目前迫切而嚴重的任務。」參閱中共河南省委資料整編委員會編，《中共河南黨史大事記》（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頁 98；中共滑縣縣委黨史辦公室編，《中共滑縣黨史大事記 1925-1987》，上編，頁 27。

²² 當時攻佔滑縣縣城是共軍在中日戰爭中第一次攻下縣城。參閱中共滑縣縣委黨史辦公室編，《中共滑縣黨史大事記 1925-1987》，上編，頁 28。

²³ 中共濮陽市委組織部、中共濮陽市委黨史資料整編委員會、濮陽市檔案局編，《中共河南濮陽市組織史資料（1926-1986）》（北京：中國黨史出版社，1986 年），頁 62。

²⁴ 中共滑縣縣委黨史辦公室編，《中共滑縣黨史大事記 1925-1987》，上編，頁 28。

長，也使趙紫陽的才幹受到注目。²⁵從 1938 年到 1939 年，短短兩年之間，趙紫陽便經歷了黨校、縣委的歷練，並讓共產黨在滑縣打下良好基礎。

1939 年 6 月，趙紫陽調任豫北地委宣傳部長，²⁶1940 年 4 月 18 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委成立，下轄四個地委，此時剛滿 21 歲的趙紫陽升遷為第三地委書記，管轄濮陽、滑縣、長垣、東明等縣委。²⁷1940 年至 1942 年日軍為有效控制平漢、津浦、隴海等鐵路交通，集中部隊攻擊冀魯豫邊區，中共八路軍主力只能撤離此地區，初步建立的地方武力隨即被打散；²⁸隨著中共控制區域日漸縮小，共黨組織也隨著轄區變化整編，第三地委書記趙紫陽在失去根據地後，就曾因此成為「流亡黨委」。²⁹1942 年 10 月，冀魯豫邊區黨組織繼續縮編，趙紫陽轉任第四地委副書記，書記則為張璽（1897-1967）。³⁰

1943 年 7 月冀魯豫邊區黨委和第四地委決定在滑縣試辦土改，由第四地委副書記趙紫陽負責指導，發動雇佃群眾要求地主與富農減租、減息，使群眾從鬥爭中獲得明顯而直接的利益，進而加強共黨群眾基礎；³¹土改效果卓著，其所發表的〈滑縣群眾是如何發動起來的〉，引起上級黨委注意與推崇：「紫陽同志這篇文章從頭到尾貫徹了從群眾來的領導方法，望同志們讀後詳細研究。」³²1944 年北方局成立平原分局，包括直南、豫北、魯西三大根據地，管轄十二個地委，

²⁵ 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編委會編，《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大事記》，頁 72；中共滑縣縣委黨史辦公室編，《中共滑縣黨史大事記 1925-1987》，上編，頁 29。

²⁶ 1939 年 4 月，中共將直南特委劃分為直南、豫北兩個地委。參閱中共滑縣縣委黨史辦公室編，《中共滑縣黨史大事記 1925-1987》，上編，頁 29。

²⁷ 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編委會編，《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大事記》，頁 116。

²⁸ 中共河南省委黨史資料整集委員會編，《冀魯豫抗日根據地（一）》（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頁 8。

²⁹ 劉玉峰，〈豫北沙區革命鬥爭的一段回憶〉，收於中共安陽地委黨史資料整編委員會編，《安陽地區革命回憶錄選》，頁 78。

³⁰ 中共濮陽市委組織部、中共濮陽市委黨史資料整編委員會、濮陽市檔案局編，《中共河南濮陽市組織史資料（1926-1986）》，頁 32-33。

³¹ 中共滑縣縣委黨史辦公室編，《中共滑縣黨史大事記 1925-1987》，上編，頁 44。

³² 參閱趙紫陽，〈滑縣群眾是如何發動起來的〉之「按語」（編委會著），收於中共平原分局機關刊物《平原》，期 2 增刊（1944 年 10 月），轉引自趙蔚，《趙紫陽傳》，頁 37。

趙紫陽隨著改任第九地委兼宣傳部部長、組織部部長；同年秋天，與從婦女工作委員會到滑縣幫忙工作的梁伯琪結婚。1945年4月，趙紫陽在新設的濱河縣主持工作幹部會議，說明土改是「根據新民主主義政策，要削弱封建經濟，發展小農經濟，就要走減租、增佃、減息、生產的路子。……我們走了民主鬥爭的道路，它帶著極大的經濟意義。它要部分解決土地問題，還由子它把地主對農民的經濟作了清算，就直接把封建經濟基礎給予了致命的摧毀，但這並不等於均產，因為只是經過了民主鬥爭。對地主，由於其罪惡輕重也給了文鬥、武鬥、反省三種形式的輕重不同的處罰。」³³同年春天，中央局書記鄧小平在山東冠縣召集趙紫陽等幹部舉行土改問題座談，會中特別肯定趙紫陽的滑縣土改經驗，進而推廣至中央局轄區，並將趙紫陽所著〈滑縣群眾是如何發動起來的〉收於機關刊物《平原》廣泛宣傳，也因此有「土地問題專家」³⁴的稱呼。

1945年10月，隨著中日戰爭結束，平原分局裁撤，組織整編後趙紫陽任冀魯豫第四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治委員。³⁵1946年6月國共內戰開始，中共中央認為大規模土改，將可獲得廣大農民認同；同時強調地方武裝與民兵，必須堅持地方幹部留守地方，堅持鬥爭，因此趙紫陽等地方幹部內戰初期沒有隨共軍主力撤退。³⁶國共軍對在滑縣產生拉鋸戰，勢力消退常常伴隨地主與農民間的清算，「經過油及戰爭和敵人佔領，農村階級關係起了很大變化。農民被地主打落在地，農村陣地跨了。敵軍直接支持地主，兩個階級對立更尖銳，農民抬不起頭來。要發動農民對地主的鬥爭，就必須給地主這種氣焰以打擊與報復。」³⁷不少地主在土改過程中被抄家，掃地出門，以至於打死；趙紫陽的父親趙廷賓也在這場風

³³ 趙紫陽，〈趙紫陽同志 1945 年春在濱河縣新店會議上的報告〉，轉引自趙蔚，《趙紫陽傳》，頁 38。

³⁴ 中共滑縣縣委黨史辦公室編，《中共滑縣黨史大事記 1925-1987》，上編，頁 55。

³⁵ 中共濮陽市委組織部、中共濮陽市委黨史資料整編委員會、濮陽市檔案局編，《中共河南濮陽市組織史資料（1926-1986）》，頁 61-64。

³⁶ 中共滑縣縣委黨史辦公室編，《中共滑縣黨史大事記 1925-1987》，上編，頁 58、60。

³⁷ 趙紫陽對地主如此嚴厲是怕屬於地主出身的自己，若在鬥爭中出現猶豫或動搖，會被認為是政治上不正確趙紫陽，〈趙紫陽同志 1947 年 6 月在濮陽縣灣子會議上的報告〉，轉引自趙蔚，《趙紫陽傳》，頁 42-45。

波中喪生。

1947 年秋，趙紫陽調任冀豫皖邊區安陽根據地（又稱爲第四後方根據地），率地方幹部近千人隨晉冀魯豫野戰軍第十縱隊南下桐柏山區；9 月，趙紫陽擔任地方工作團團長。³⁸第十縱隊與劉伯承、鄧小平領導的晉冀魯豫野戰軍會合後，於 12 月 3 日召開第十縱隊與地方工作團以上幹部西進動員大會，讓趙紫陽能進一步與鄧小平接觸；³⁹12 月 13 日中央局成立桐柏區黨委與桐柏軍區，趙紫陽任副書記兼軍區副政委；⁴⁰此時趙紫陽的周圍同事都是紅軍老幹部，在相當重視革命資歷的中共組織中，顯然趙紫陽早年參加共青團的經歷是被認同的。⁴¹

1948 年趙紫陽調至豫西任桐柏區委副書記，1949 年 3 月任中共南陽區委書記兼南陽軍分區政治委員，並擔任宣傳部與組織部的工作，任中共桐柏區黨委副書記兼桐柏軍分區副政治委員。當時桐柏區相當於專區的編制，受中原局的領導，而當時中原局的第一書記就是鄧小平；擔任區委副書記的趙紫陽，根據中共 1947 年公佈的〈中國土地法大綱〉⁴²在桐柏區擴大土地改革配合中原戰場的開關，支援戰爭物資需求。趙紫陽推動土改的方式如同在冀魯豫區推行的模式，發動農民鬥爭地主，接收地主土地與財產後再重新分配。⁴³1948 年初由於共軍佔領區推動土改過於急切，引起地主武裝反抗，一時間效果不佳，毛澤東（1893-1976）將其歸咎於「土地改革宣傳中的『左』傾錯誤」⁴⁴；中原局第一書記隨即提出土

³⁸ 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編委會編，《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大事記》，頁 284。當時第十縱隊由地方武裝整編而成，司令員爲王宏坤，政委爲劉志堅。參閱中共桐柏縣委黨史辦公室編，《桐柏解放區大世紀-戰鬥的十六個月》（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82 年），頁 2。

³⁹ 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劉志堅談桐柏區的幾件大事》，《中共黨史資料》，集 24（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87 年），頁 95。

⁴⁰ 當時的區相當於省，換言之，趙紫陽此時已相當於省級領導人。參閱中共河南省委資料整編委員會編，《中共河南黨史大事記》，頁 162-163。

⁴¹ 趙蔚，《趙紫陽傳》，頁 51。

⁴² 〈中國土地法大綱〉宣佈：「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土改隨即展開。中共河南省委資料整編委員會編，《中共河南黨史大事記》，頁 160。

⁴³ 胡國君，〈趙紫陽的崛起〉，頁 12-13。

⁴⁴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合訂本，卷 5（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 年），頁 1175-1176。

改四項修正規定，並向毛澤東報告「這四項規定在實行後，很快就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局面趨於穩定。」毛澤東立刻要求「各地仿辦」。⁴⁵因此 1948 年 7 月桐柏區黨委在趙紫陽主持下召開縣委書記聯席會議，規定「有步驟、有分別、有準備、有計劃地再以分田地控制區進行複查調查工作；在未分田地控制區進行反蔣清算，雙減運動；在游擊區進行對敵鬥爭。」⁴⁶終使土改順利運作。徐蚌會戰爆發，中共軍隊物資上獲得充分供應，也顯現土改得到效果。同年 9 月後，國共內戰戰局逆轉，國民黨軍隊遭受連番沉重打擊，據趙蔚趙紫陽傳所述：「蔣介石政府比過去二十年的任何時候都更加接近崩潰的邊緣。」⁴⁷

1949 年 3 月 1 日，中共成立河南省委，接著統一按省畫分地區，原本的區黨委一率取消，趙紫陽轉任南陽地委書記兼南陽軍分區政委。⁴⁸1949 年 10 月後，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常務委員、秘書長、農村工作部部長、副書記、南陽區第一書記等職到 1951 年。趙紫陽自 1938 年加入共黨至 1951 年隨南下工作團南調廣東，共在河南工作了 14 年，由滑縣的基層幹部到桐柏區的地委書記，升遷非常迅速，其原因除了河南地處武裝根據地，需要大量基層幹部，趙紫陽受過中學教育，也在基層幹部中比較突出。⁴⁹這段時間參加「土改」，在其早期的政治生涯便經歷共產黨工作中農業、宣傳、組織的三個關鍵領域。⁵⁰

第二節 建國後隨南下工作團調廣東

⁴⁵ 鄧小平四項修正規定：(1) 任何時候不要忽視團結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中立那些可以中立的人。(2) 在鞏固區和游擊區採取不同的策略步驟。(3) 禁止亂殺人。(4) 注意掌握工商政策，保護工商業。參閱中共河南省委資料整編委員會編，《中共河南黨史大事記》，頁 165。

⁴⁶ 中共桐柏縣委黨史辦公室編，《中共桐柏縣黨史大事記-新民主主義時期》(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84 年)，頁 59-60，69。

⁴⁷ 轉引自趙蔚，《趙紫陽傳》，頁 54-55。

⁴⁸ 此時趙紫陽的職務是相對下降的。參閱中共河南省委資料整編委員會編，《中共河南黨史大事記》，頁 177-178。

⁴⁹ 胡國君，〈趙紫陽的崛起〉，頁 13。

⁵⁰ 雖然他的父親趙廷賓在 40 年代晚期「土改」期間遭到鬥爭而死，趙紫陽仍留在共產黨。；沈大為、寒山碧、范言、陸鏗等著，徐澤榮譯，《趙紫陽》，頁 20-21；〈趙紫陽簡歷〉，《人民日報》，1980 年 9 月 11 日。

1949年10月1日中共正式建立政權，屬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結束，進入「社會主義革命」；但是，「土地制度的改革，是新民主主義的主要內容」，⁵¹而在此過渡時期，劉少奇（1898-1969）於1950年6月14日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發表〈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指出：「尚有約二億六千四百萬農業人口，沒有進行土地改革。……在兩年到三年內，……基本上完成全國的土地改革。」⁵²1950年中共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準備自1950年冬至1953年春耕前，以3年時間去完成農村地區3億人口的土地改革，⁵³「有領導地、有計劃地、有秩序地去進行，……如果在這些地區開始土地改革後，發生了某些偏向，並引起某些混亂狀態，而不能迅速糾正時，則應停止這些地區的土地改革。」⁵⁴但是1950年6月韓戰爆發，隨著中共參戰，尋求戰爭物資的壓力更形成對土改成果的依賴。

中共建國以後，由於廣東在1949年10月從國共內戰中「解放」，又與香港相鄰，吸收海外的資訊較快、影響也深，加上廣東「地方主義」較重，種種因素使得當時中南局領導人兼任廣東省主席葉劍英（1897-1986）、副主席方方（1904-1971）、古大存（1897-1966）、李雪峰等在廣東推行的土改效率不彰。1950年9月華南分局向中南局要求補充縣以上幹部一千餘人，一般幹部六千餘人協助兩廣的管理；⁵⁵在中央政治當局指示下，1951年5月，32歲的趙紫陽擔任華南分局土改委員會副主任，⁵⁶隨著中南局大批幹部增援廣東更嚴厲的土改政策，親

⁵¹ 毛澤東，〈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收於《毛澤東選集》合訂本，卷2，頁646；金一鴻，《中共土地改革總論》（香港：新世紀出版社，1953年），頁1。

⁵² 中共研究雜誌社編，《劉少奇問題資料專輯》（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1970年），頁23。

⁵³ 本法於由劉少奇提出，在1950年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中通過並公布。黎明華，《中共的土地鬥爭》（台北：政大國研中心，1955年），頁237-246。

⁵⁴ 中共研究雜誌社編，《劉少奇問題資料專輯》，頁23。

⁵⁵ 當時中共從各地選派主要幹部七百五十名，一般幹部一千名到補充兩廣幹部荒。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廣東、廣西幹部需要情況及縣、市人口情況〉，轉引自趙蔚，《趙紫陽傳》，頁57-58。

⁵⁶ 當時的主任為方方，另有兩個副主任分別為陳冷與李堅真。參閱王健英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匯編》（北京：紅旗出版社，1983年），頁605；沈大為、寒山碧、范言、陸鏗著，徐澤榮譯，《趙紫陽》，頁21。

自參加清算地主的鬥爭，因為「應當發動和組織起來的中農和其他勞動人民，很多尚未發動和組織起來。……有些地區已因此顯出貧雇農孤立的徵象。此問題如不加以解決，要肅清殘餘敵人的活動，鞏固土改勝利是不可能的。……對中小地主打得徹底，有的打得過重，對大地主和當權派打得卻不夠徹底。」⁵⁷由於土改立場上反對任何成分的資產階級，這也使他與葉劍英、方方、古大存等廣東領導人意見相左。⁵⁸

1951年8月，趙紫陽任華南分局書記處秘書長，並成為華南分局常委委員；⁵⁹因為執行嚴厲的土改政策，趙紫陽此時被稱為「熱切的左派」。⁶⁰秘書長的工作是綜合各省的日常事務，是負責將上級指示傳達給下級的關鍵人物，並向第一書記匯報這類文件，監督第一書記起草報告和演講的過程；換言之，趙紫陽在華南分局處於一個資訊管理者的位置，既能監督他人，又能使他人適應他對上級指示的解釋。1951年8月6日至8月20日，中南局召開幹部擴大會議，趙紫陽以華南分局秘書長的身分發表重要講話，號召低階幹部對阻礙土改的高階幹部提出批評；雖然批評如預期湧現，卻是針對使用嚴厲手段的南下幹部；為了回應擴大會議的批評，中南局發起宣傳活動，企圖解釋土改的嚴厲政策是韓戰導致的必然結果，接著派遣更多幹部南下廣東消除土改阻力，其中包括中南局的領導人陶鑄（1908-1969）。⁶¹陶鑄於1952年春從廣西調到廣東後，任華南分局第四書記，立

⁵⁷ 趙紫陽，〈趙紫陽關於樂昌縣農運工作至華南分局的報告（1951年7月20日）〉，轉引自趙蔚，《趙紫陽傳》，頁61-62。

⁵⁸ 沈大為、寒山碧、范言、陸鏗著，徐澤榮譯，《趙紫陽》，頁21-22。葉劍英在1951年9月的廣東省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就說：「許多代表要求趕快進行土地改革，……只有群眾真正起來才能快，僅僅幹部圖快事不能快的。不穩的快、冒進的快，結果多出偏差，妨礙農業生產的發展。」參閱葉劍英，〈在廣東省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的總結報告〉，收於廣東葉劍英研究會、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葉劍英在廣東》（北京：中共文獻出版社，1995年），頁406。

⁵⁹ 沈大為、寒山碧、范言、陸鏗著，徐澤榮譯，《趙紫陽》，頁22；張昕、張淑華編，《他終於自由了——趙紫陽逝世風雲錄》，頁10。

⁶⁰ 陶鑄、趙紫陽「糾正」了葉劍英、方方等「廣東特殊論」的「右傾路線」，在廣東土改、肅反中實行「村村流血，戶戶鬥爭」的極左路線。1951年5月開始，僅粵西區地主自殺已達1165人；1953年「土改複查」時，僅2月3日到3月6日一個月，自殺者又增805人。楊立，《帶刺的紅玫瑰——古大存沉冤錄》（廣州：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1997年），頁31-51。

⁶¹ 沈大為、寒山碧、范言、陸鏗著，徐澤榮譯，《趙紫陽》，頁23-24。

刻對土改狀況進行調查，並指定趙紫陽領導檢查團的工作；開啓此後陶、趙兩人往後 15 年密切關係的開端，「在陶鑄同志直接領導下工作十五年，他留給我（按：趙紫陽）的印象及其深刻，永生不能忘懷。」⁶²不論是政治鬥爭或是政策執行，趙紫陽都緊跟陶鑄。⁶³

1952 年廣東全面展開土改，陶鑄與趙紫陽推動鄧小平在西南區實行的「減租、退押、清匪、反霸」八字運動。⁶⁴1952 年春，毛澤東批評葉劍英廣東土改不徹底，確定「依靠大軍，依靠南下幹部，由大軍和南下幹部掛帥」的土改政策，演變成「第一次反地方主義運動」，批判地方幹部的「和平土改」與「整頓幹部隊伍」；⁶⁵在中央的支持下，1952 年至 1953 年，方方下放粵北曲江，葉劍英調離廣東代理中南局書記，古大存也遭到排擠，並由陶鑄接替葉劍英的職務，趙紫陽也隨之迅速升遷。⁶⁶在南下幹部贏得這場權力鬥爭後，1952 年 7 月的華南分局擴大會議中湧現對地方幹部的嚴厲批評，⁶⁷趙紫陽則表示「『參座』（按：葉劍英，曾擔任參謀總長）的報告和方方同志的檢討對我都有很大的教育。」⁶⁸從這裡或可以看出趙紫陽處事的圓融。

1951 年 12 月 1 日，中共中央發表〈關於實行精兵減政，增產節約，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接著毛澤東號召群眾「開展一個大規模的反對貪汙、

⁶² 趙紫陽，〈共產黨人的高尚品德〉，《人民日報》，1979 年 3 月 23 日，版 3。

⁶³ 趙蔚，《趙紫陽傳》，頁 63，76。

⁶⁴ 胡國君，〈趙紫陽的崛起〉，頁 18。

⁶⁵ 葉劍英，〈在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擴大幹部會議上的報告〉，收於廣東葉劍英研究會、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編，《葉劍英在廣東》（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 年），頁 324-328。

⁶⁶ 1953 年調任中央軍委會副主席，陶鑄繼任華南分局第一書記。參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黨史通訊》，1984 年期 9（1984 年），頁 9。方方從中日戰爭起一直在南方從事游擊戰，中共取得政權後，再華南分局形成一個以地方幹部為基礎的系統；1952 年 7 月在華南分局會議上發表〈我的錯誤初步檢討〉：「對趙紫陽同志也沒有積極依靠他，發揮它應有的作用。」參閱胡國君，〈趙紫陽的崛起〉，頁 18。

⁶⁷ 參閱武光，〈武光同志在華南分局 1952 年 7 月擴大會議上的發言〉，轉引自趙蔚，《趙紫陽傳》，頁 67；伍晉南，〈伍晉南同志在華南分局 1952 年 7 月擴大會議上的發言〉，轉引自趙蔚，《趙紫陽傳》，頁 67。

⁶⁸ 趙紫陽，〈趙紫陽同志在華南分局 1952 年 7 月擴大會議上的發言〉，轉引自趙蔚，《趙紫陽傳》，頁 68。

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將這些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污毒洗乾淨。」⁶⁹「三反」運動隨即在大陸熱烈推行，陶鑄也在廣東發起一系列整風運動，掌握實權。在這場運動中，幾乎所有幹部都要做自我鑒定，1952年7月華南分局辦公廳黨支部依據趙紫陽的自我鑒定做了組織鑒定：「趙紫陽同志有較強的領導能力和較豐富的工作經驗，思想方法與學習方法正確。因之，觀察問題考慮周詳，認識深刻，全面而又能抓住中心環節。工作能有中心、有步驟的解決問題。領導作風能經常保持冷靜頭腦和從容態度。其缺點是在處理某些問題時，有些自由主義和個人得失的考慮。」⁷⁰這段描述中肯的反應趙紫陽的能力與官場哲學。1952年底因為廣東土改於結束，華南分局進行改組，1953年陶鑄被任命華南分局代理第一書記，趙紫陽擔任農村工作部部長兼任華南分局書記處秘書長，同時也擔任華南分局黨校主任教官及駐廣州市機關總路線學習考試委員會委員；即使當時中共幹部普遍年輕，但如趙紫陽年僅34歲即當上省籍幹部也不多見。⁷¹

1953年至1960年「三面紅旗」⁷²結束，中共掀起經濟目的或政治目的的運動，趙紫陽適當的領導與積極參與運動，隨著陶鑄掌握實權，趙紫陽也在不斷的運動中獲得升遷。這段時間趙紫陽職位雖有調動，但其內容都是負責管理廣東農業。長期經營農業，使趙紫陽對農業的發展與問題有比較深刻的了解。

1953年初，「各地反映，目前農村的情況仍然比較混亂，山林水利糾紛、械鬥仍不斷發生，強迫借貸、強迫互助等違反保護私有制政策的行為仍在繼續，土改中伙分牛因管理不當造成大量死亡；農村中壞份子和二流子大吃大喝、聚賭、

⁶⁹ 吉林省中共黨史學會編，《新中國紀事（1949-1984）》，頁63。

⁷⁰ 參閱〈中共中央華南分局辦公廳黨支部隊趙紫陽同志的鑒定，1952年7月25日〉，轉引自趙蔚，《趙紫陽傳》，頁72-73。

⁷¹ 沈大為、寒山碧、范言、陸鏗著，徐澤榮譯，《趙紫陽》，頁24-27；政大國研中心，《中共人名錄》（台北：政大國研中心，1978年），頁852。

⁷² 「三面紅旗」：1958年至1960年上半年，中共企圖利用大量人口投入生產，讓產量「大躍進」，快速達到工業化的運動；其結果造成嚴重的經濟破壞與飢荒。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頁873。

偷竊，打擊鄉村幹部，使部分鄉村處於無政府狀態。一部份轉業工人不安心農村生產，請願、盲目流回城市；地主不勞動，丟荒不少土地，未分配之機動田亦有一些丟荒。……必須把穩定新的生產關係，安定農村生產作為當前的中心環節。」⁷³因此農業部門的挑戰並不輕鬆。但是透過土改完成了土地重新分配，華南分局接著指示保護私有財產權，頓時提高農民生產意願，鄉村也迅速恢復秩序。

1953年11月4日毛澤東發表談話：「不靠社會主義，想從小農經濟作文章，靠在個體經濟基礎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產糧食，解決糧食問題，解決國際民生的大忌，那真是難矣哉！」⁷⁴12月16日，中共中央通過〈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決定「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就是要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逐步實現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認為「這種小規模的農業生產已日益表現出不能夠滿足廣大農民群眾改善生活的需要，不能夠滿足整個國民經濟高漲的需要。」⁷⁵此時韓戰結束不久，在勢如中天的毛澤東的推動下，農業合作化運動立即展開，趙紫陽也迅速放棄保護私有財產的農業政策；⁷⁶「靠小農經濟一家一戶的生產是太慢了，靠國營農場大量開荒，因沒有拖拉機，而且大量的荒地又在交通不便的地方，現在看來也不成。……目前就要靠半社會主義的合作社。」⁷⁷但是農業合作化運動很快出現問題，毛澤東也承認「生產關係要適合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否則生產力會起來暴動。」⁷⁸1955年1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頓和鞏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通知〉，要求合作化運動轉為控制發展、著重鞏固階段；趙紫陽也認為：「開始辦社不要搞得太複雜，內容要單純一些，要逐步地由低級到高級。目前我們對合作社的要求有些搞得太高

⁷³ 中共中央華南分局農村工作部，〈中共中央華南分局關於當前穩定生產關係、安定農村生產的指示〉，《華南農村》，總期1（1953年6月），頁3-4。

⁷⁴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卷5，頁120。

⁷⁵ 農業出版社，《人民公社萬歲》（北京：農業出版社，1960年），頁13。

⁷⁶ 趙蔚，《趙紫陽傳》，頁76-78。

⁷⁷ 趙紫陽，〈鞏固第一批社，辦好第二批社，迎接互助合作運動高潮〉，《華南農村》，總期18（1954年6月），頁3。

⁷⁸ 吉林省中共黨史學會編，《新中國紀事（1949-1984）》，頁139-140。

太複雜了。」⁷⁹

1953年至1954年中共整肅「高饒反黨聯盟」，並於1954年2月七屆四中全會中通過〈「關於黨的團結」的決議〉，撤銷大區制度，各大區領導人調往中央；⁸⁰陶鑄則在葉劍英調往中央後代理廣東省主席，1955年正式成為廣東省主席兼省委書記。1954年趙紫陽隨著陶鑄的升遷被任命為華南分局第三書記、「糧食徵購總部」的「總指揮」，並繼續擔任農村工作部部長；1953年中共宣布「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即農民除了糧食稅之外，還需要完成定額產量由國家低價收購。⁸¹由於廣東土改進展較外地緩慢，開始執行糧統購統銷時已經比外地延遲六個月，趙紫陽與其領導的農村工作部便是負責此政策的解釋與執行。這段時間中共開啓以工業為重點的五年計劃，長期在農村餐與土改的趙紫陽並贊成「重輕農」的經濟政策。⁸²

1955年至1957年趙紫陽快速升遷，1955年選入廣東省人大常委，同年被任命廣東省委書記處副書記、亞熱帶資源開發委員會主席；1956年被任命為廣東軍區第一政委；1957年被推選為省委書記處秘書長，同年被任命為廣東軍區黨委書記。⁸³

1957年4月中共鼓勵黨外人士「大鳴大放」，⁸⁴劉少奇4月14日到訪廣東，

⁷⁹ 趙紫陽，〈趙紫陽同志關於今後農村工作安排的發言〉（1955年5月24日），轉引自趙蔚，《趙紫陽傳》，頁80。

⁸⁰ 〈「整肅高饒反黨聯盟」之決議〉，《人民日報》，1955年4月5日。「高饒事件」發生於1953年至1954年，是中共政權第一次整肅活動。參閱曾永賢，〈高饒事件剖析〉，收於姚孟軒編《匪黨內部門爭問題論集》（台北：政大國研中心，1965年），頁204-214。

⁸¹ 沈大為、寒山碧、范言、陸鏗著，徐澤榮譯，《趙紫陽》，頁38。

⁸² 陶鑄在1956年9月發表〈反對重輕農發展及農輕工業之強調〉，文中提到趙紫陽頗表贊同。轉引自趙紫陽，〈共產黨人的高尚品德〉，《人民日報》，1979年9月23日，版3。

⁸³ 亞熱帶資源開發委員會負責海南島和廣東地區亞熱帶資源開發。沈大為、寒山碧、范言、陸鏗著，徐澤榮譯，《趙紫陽》，頁34-35。

⁸⁴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5月6日有發出〈關於繼續組織黨外人士對黨證所犯錯誤缺點展開批評的指示〉，廣泛徵求意見。參閱趙蔚，《趙紫陽傳》，頁86。

向陶鑄、趙紫陽等廣東幹部傳達「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的目的與領導方法。⁸⁵隨著全國運動後批評的浪潮，廣東地方幹部也跟著批評陶鑄與趙紫陽的領導及「第一次反地方主義運動」⁸⁶；不滿的聲浪擴展政府各領域，而土改與肅反運動的殘酷，合作化運動過急與忽視當地條件，農產品供應缺乏，這些政策的缺失都與趙紫陽有關。⁸⁷同年 6 月，毛澤東親自起草〈組織力量反擊右派份子的猖狂進攻〉，⁸⁸「反右運動」於是展開，陶鑄在 12 月的廣東省第一屆黨代會第二次大會上，利用「辯論廣東歷史問題」時，清算有「地方主義」的幹部，興起「第二次反地方主義運動」⁸⁹，從而更鞏固陶鑄與趙紫陽在廣東的權位，順利推行其政策。⁹⁰毛澤東估計「大鳴大放」中提出意見的，有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十是惡意的，於是「反右運動」被提報為右派的人必須達到百分之十；由於中共規定工人與農民一律不劃「右派」，推行農業政策的趙紫陽，因此幸運的沒有捲入反右運動。⁹¹對於大陸內部的亂象，引起當時廣東居民移民港澳的需求，對此風潮趙紫陽以較彈性的角度看待，「今後對於去港澳的限制可以適當放寬些，……硬要去的可以允許他們。目前香港方面搞所謂『出入口平衡』的限制，所以不能怪我們的政府。」

92

⁸⁵ 《南方日報》，1957 年 4 月 23 日。

⁸⁶ 其後兩位廣東省副主席古大存、馮白駒被撤銷省委書記職務，有「地方主義」色彩的幹部或被撤銷職務，或被清算關押。區夢覺，〈古大存馮白駒的錯誤在哪裡？〉，《新華月報》，總期 141（1958 年 9 月），頁 43-45。

⁸⁷ 1957 年農民普遍不滿農村狀況，廣東省春季有 117916 戶農家退出合作社。參閱沈大為、寒山碧、范言、陸鏗著，徐澤榮譯，《趙紫陽》，頁 45。

⁸⁸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冊 10，頁 284，286-290。

⁸⁹ 這次運動持續到 1958 年 5 月，主要針對廣東出身的古大存與馮白駒兩位副省長，解除其職務，保留黨籍；這樣的人事變動，使趙紫陽成為受益者。沈大為、寒山碧、范言、陸鏗著，徐澤榮譯，《趙紫陽》，頁 48-49。

⁹⁰ 錢太康，〈趙紫陽評傳〉，《當代》，期 5（1981 年 1 月），頁 22。《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提示人們「少數的右派分子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名義之下，企圖乘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把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打翻」，在知識分子中找出「右派」的反右運動從此開始。參閱《人民日報》，1957 年 6 月 8 日。

⁹¹ 參閱毛澤東，〈事情正在起變化〉，轉引自趙蔚，《趙紫陽傳》，頁 86。

⁹² 趙紫陽，〈在全省處理人民群眾來信、來訪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7 年 7 月 13 日），轉引自趙蔚，《趙紫陽傳》，頁 84-85。1962 年廣東農民因飢饉逃往香港時，陶鑄、趙紫陽曾饑民開放邊界。胡國君，〈趙紫陽的崛起〉，頁 23。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以社論發表〈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提倡「在生產線上來一個大躍進」；⁹³接著毛澤東在參加蘇聯革命四十週年紀念中提出以十五年時間在鋼鐵產量上超過英國。⁹⁴1958年1958年1月南寧會議發動「大躍進」，隨後毛澤東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其內容再度重申毛澤東所提十五年鋼鐵產量趕上英國的口號，並批評周恩來、陳雲在1956年提出的「反冒進」是「政治問題，洩了六億人的氣，導致了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是方針性錯誤。」⁹⁵自此「大躍進」運動在大陸熱烈展開。

1958年4月「大躍進」運動初期，趙紫陽認為「大躍進能夠搞起來，現在主要是靠政治，靠群眾熱情。……但是單靠政治作還不行，這樣群眾的熱情是不能持久的，還必須有好的管理制度來保證，使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得到合理的解決，使按勞取酬的分配原則得到真正的體現，以促進生產的發展。」⁹⁶，但是趙紫陽基本上樂觀支持「大躍進」，一方面他以「農村調查員」的身分向縣、區的農村工作部幹部傳達新的生產目標，⁹⁷一方面也在《人民日報》發表「究竟我們能否按照多快好省的要求，以更快的速度發展糧食生產呢？從廣東這幾年來，特別是去冬今春的經驗看，是完全可能的。」⁹⁸同年7月23日《人民日報》社論樂觀的認為「只要我們需要，要生產多少就可以生產多少糧食出來。」⁹⁹隨後陶

⁹³ 〈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社論），《人民日報》，1957年11月13日。

⁹⁴ 當時蘇聯成功發射衛星，蘇聯總書記赫魯雪夫提出十五年趕上美國的口號，毛澤東跟著喊出十五年超過英國的口號。吉林省中共黨史學會編，《新中國紀事（1949-1984）》，頁225；參閱陳永發，《中國共產黨革命七十年》修訂版，下冊，頁698-699。

⁹⁵ 1958年3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繼續批評「反冒進」，提出「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參閱吉林省中共黨史學會編，《新中國紀事（1949-1984）》，頁231-232。

⁹⁶ 這段話在後來的文革中，被造反派認為是「反對突出政治，大搞修正主義的物質刺激」而被攻擊。趙紫陽，〈在廣東省合作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4月13日），轉引自趙蔚，《趙紫陽傳》，頁89-90。

⁹⁷ 《南方日報》，1958年4月23日。

⁹⁸ 趙紫陽，〈糧食生產速度可以加快〉，《人民日報》，1958年5月30日。

⁹⁹ 1958年中共農業部公佈〈夏收生產糧食作物公報〉中宣稱當年糧食作物產量成長69%，於是當時認為糧食年增率應為百分之幾的合理推測成為悲觀論調。參閱〈社論：今年夏季大豐收說明了什麼〉，《人民日報》，1958年7月23日；吉林省中共黨史學會編，《新中國紀事（1949-1984）》，頁239。

鑄、趙紫陽在廣東推動人民公社，同時設計一個畝產六萬斤的「豐年衛星」，鼓吹「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口號；¹⁰⁰「在全國農業生產高速飛躍發展的情況下，糧食局勢正在起著根本性的變化。一、二年之內，糧食問題就可以獲得解決。」¹⁰¹

不久，趙紫陽便察覺人民公社的問題，「他們（按：貧農下中農）中不少人由於共產主義覺悟不高，對軍事化、社會化供給制工資制等等不習慣，個人得失疑慮多，有些地區宣布不配工分實行供給制、工資制了，就出現勞動組織鬆弛，勞動紀律不好的現象。」¹⁰²直到 1959 年，陶鑄與趙紫陽都低調行事，報導中極少公開露面，並在六中全會後發表縮減公社規模的聲明，同時批評基層幹部過份熱心推行公社運動的「工作方法」，令許多農民不配合政府。¹⁰³「大躍進」運動的結果造成高估產量與過度徵糧，無法如數繳糧的農民與基層幹部被認定「瞞產」¹⁰⁴；「廣東早稻生產取得了巨大的勝利，……但在中南與其他省相比，就不是『很不錯』，而是差得很多。……廣東一個省的千斤畝（按：畝產量上千斤）僅等於江西一個縣，有點太不像話了。」¹⁰⁵1959 年 1 月，趙紫陽發動「反瞞產運動」，限制農民上繳計劃中的產量，因此生產隊與農民糧食多被徵調，「大躍進」造成的飢荒愈形嚴重。¹⁰⁶對此結果，趙紫陽也曾發表其看法：「在三年（按：1958 年

¹⁰⁰ 「豐年衛星」是廣東試辦地點。吳群策、劉應山、宋正春，〈堅持實事求是，才能發揮優勢〉，《南方日報》，1980 年 10 月 17 日。

¹⁰¹ 趙紫陽，〈在全省縣委書記會議上的報告（1958 年 7 月 31 日）〉，轉引自趙蔚，《趙紫陽傳》，頁 91。

¹⁰² 依據 1958 年 10 月 1 日《人民日報》的報導，當時人民公社共 23397 個，佔大陸農戶的 90.4%。趙紫陽，〈趙紫陽同志在廣東省委電話會議上的講話〉（1958 年 9 月 28 日），轉引自趙蔚，《趙紫陽傳》，頁 93。

¹⁰³ 雖然在 1958 年 12 月的全省幹部電話會議上，趙紫陽只是公社應該按勞分配，而不是按需分配，並要求幹部解決群眾生活物資需求的困難，但是當年產量預估的過度膨脹，使多數人有供應過剩的錯覺，人民開始藏匿私產。沈大為、寒山碧、范言、陸鏗著，徐澤榮譯，《趙紫陽》，頁 52-54。

¹⁰⁴ 農民不願以規定的低價無補償地大量出售他們的產品，因此匿糧不售的情形常發生。沈大為、寒山碧、范言、陸鏗著，徐澤榮譯，《趙紫陽》，頁 38。

¹⁰⁵ 趙紫陽，〈在全省縣委書記會議上的報告〉（1958 年 7 月 31 日），轉引自趙蔚，《趙紫陽傳》，頁 91-92。

¹⁰⁶ 趙紫陽相信 1958 年秋天豐收，其主導的「反瞞產運動」造成許多幹部被整肅與批評。錢太康，〈趙紫陽評傳〉，《當代》，期 6，頁 15。1959 年至 1961 年間，當時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為 2%，

-1960年)經濟困難時期,群眾的生活很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我們工作中犯了錯誤而造成的。.....陶鑄同志對問題也有不多思索脫口而出,未看準就下決心,甚至像他自己常說的『冒叫一聲』就幹了起來的情況。」¹⁰⁷

趙紫陽在1953至1960年擔任的職務,大部分與推動農業政策有關;例如領導政府農業部門的農村工作部部長,負責統購統銷的糧食徵購總部的總指揮,管理農業發展並向第一書記陶鑄匯報的華南分局第三書記。雖然「大躍進」期間,政策推動並不順利,但趙紫陽仍然平步青雲,1960年時已擔任廣東軍區第一政委,使趙紫陽與解放軍三大總部之一的總政治部關係密切;擔任省委常委務書記與秘書長,則使趙紫陽位居廣東政治權力的中心,其職務分工不再只是農業部份,而是全面協助第一書記陶鑄。¹⁰⁸鑒於飢荒造成的「右傾機會主義」、「地方民族主義」,中共中央恢復六個中央局建制,中南局所在地則從武漢遷至廣州,陶鑄因此以廣東第一書記出任中南局第一書記,換言之,此後廣東政務多由趙紫陽則以第二書記實際負責廣東工作。¹⁰⁹

毛澤東於1959年因為「三面紅旗」的失敗退居第二線,經由第二屆人大會議推選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此時無論中央或地方,各級領導都致力於恢復「大躍進」中被破壞的經濟;「人民公社從生產大隊基本所有制過渡是必然的趨勢,.....但目前來說還不具備過渡的條件。」¹¹⁰1961年中共召開八屆九中全會,提出以「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為「農業生產的八字憲法」,視農業與輕工業為振興經濟的重點。¹¹¹「見事快,思想活耀,善於在複雜情況下抓住主要矛盾,

但是卻減少二千萬人口。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中心編,《中國人口年鑑198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頁807,887。

¹⁰⁷ 趙紫陽,〈共產黨人的高尚人格〉,《人民日報》,1979年3月23日。

¹⁰⁸ 沈大為、寒山碧、范言、陸鏗著,徐澤榮譯,《趙紫陽》,頁35-37; Arthur Doak Barnett,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Communist China*, p136。

¹⁰⁹ 胡國君,〈趙紫陽的崛起〉,頁22。

¹¹⁰ 趙紫陽,〈在廣東省委電話會議上的講話(1960年2月19日)〉,參閱趙蔚,《趙紫陽傳》,頁100-101。

¹¹¹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公報〉,《紅旗》,期3(1961年2月),頁1-3。

大刀闊斧的打開局面」¹¹²的趙紫陽在這段時間，對中央修正「三面紅旗」的政策大力讚揚。¹¹³接著，趙紫陽便在廣東逐步解散食堂，准許農民經營小型家庭副業。¹¹⁴1960年以後，陶鑄與趙紫陽開始透過「四固定」運動分散公社的管理權，利用「三包一獎」與「三自一包」的方式，致力於增加生產與物資供應無虞；這些政策在1961年5月成爲廣州發布的〈農業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農業六十條〉），取得的良好成果。¹¹⁵

1962年中共召開中央擴大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毛澤東在會議上對「三面紅旗」政策的失敗做了檢討，劉少奇於會中提出書面報告，總結「大躍進」的錯誤爲「工農業的生產指標過高，基本建設戰線過長，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比例嚴重不協調；在農村人民公社的工作中，一個時期混淆兩種所有制界限，對集體所有制進行了不適當的過急的變動，違反按勞分配，等價交換的原則，颳起了『共產風』」¹¹⁶；會後劉少奇、陳雲（1905-1995）等對「三面紅旗」的政策做了較大的修正。1962年春，廣東饑民「浩浩蕩蕩、絡繹不絕」的逃往香港，影響國際視聽，周恩來甚至指示廣東省委「將此事作爲當前第一位的工作來抓」，趙紫陽對此下指示：「群眾大批跑，與我們放鬆有關。放鬆，主要是對群眾只說服，不動武，實在要跑的就讓他去，這條是對的。……管也要有個辦法：一、首先是就地管，由生產隊來管。……二、主要是控制交通。……三、在鐵路、公路線，分

¹¹² 趙紫陽，〈共產黨人的高尚人格〉，《人民日報》，1979年3月23日。

¹¹³ 當時中共領導人劉少奇、鄧小平、陳雲、薄一波……等合作起草一系列政策，試圖刺激經濟成長；趙紫陽則在1961年廣東省第二次黨代會的重要工作報告中響應。沈大爲、寒山碧、范言、陸鏗著，徐澤榮譯，《趙紫陽》，頁73-76。

¹¹⁴ 胡國君，〈趙紫陽的崛起〉，頁22。

¹¹⁵ 「四固定」運動是將土地、勞力、農具、牲畜分配給生產隊，在基層以最低投資創造最大產量；「三包一獎」是獎勵完成額度的生產隊；「三自一包」則是鼓勵自留地、自營副業與自由市場，產量則與農民訂定契約，即後來的「包產到戶」。沈大爲、寒山碧、范言、陸鏗著，徐澤榮譯，《趙紫陽》，頁59。

¹¹⁶ 吉林省中共黨史學會編，《新中國紀事（1949-1984）》，頁312。七千人大會普遍檢討「大躍進」的缺失，但接替彭德懷（1898-1974）接任國防部長的林彪（1907-1971）則認爲「過去工作搞得好的時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擾時，就會出毛病。」參閱高舉、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6）》（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190。

別設送人回去的接待站，在沿途勸阻。……對於香港要客氣些，……因為這涉及到反對美、蔣的鬥爭問題，同時國際上還可能颳起一陣風來反華。」¹¹⁷事實上，趙紫陽爲了解決糧食問題，更彈性的恢復廣東毗連港澳地區的小額對外貿易，放寬赴港探親規定。¹¹⁸面對廣東嚴峻的糧食需求，趙紫陽在廣東省清遠縣洲心公社試辦「聯繫產量責任制」，以「固定地段、包工定產、對產負責、超產獎勵」的方式，刺激農民的生產動機，由於效果顯著，其後並在廣東省推廣，雖然飢荒未解，但是農民生活稍獲改善。¹¹⁹

1960年後，歷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第二書記、第一書記，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處書記，曾兼任廣東省軍區政治委員、廣州軍區第三政治委員。1961年趙紫陽升任廣東省第二書記，當時陶鑄以廣東第一書記的身分出任中南局第一書記，所以廣東工作實際上是由第二書記趙紫陽負責。1965年陶鑄升任副總理，46歲的趙紫陽則接替陶鑄成爲廣東省第一書記，達到省級權力的巔峰，也是當時全國最年輕的省委書記。¹²⁰趙紫陽沒有深厚的軍事背景，卻能在鬥爭激烈的政治圈脫穎而出，同時避開不斷的政治運動的紛紛擾擾，屹立不搖，除了陶鑄的提攜外，趙的工作能力與政治敏銳度都令人印象深刻。

第三節 文化大革命中下台與復職

1965年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中，毛澤東強調「四清」運動是整黨內的「走資派」，當劉少奇反對提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概念時，毛澤東就

¹¹⁷ 當時香港並未收留廣東難民，而是採取遣返的措施。參閱趙紫陽，〈關於大批群眾外逃香港問題給各地的電話指示（1962年5月17日）〉，轉引自趙蔚，《趙紫陽傳》，頁113。

¹¹⁸ 參閱趙紫陽，〈我的檢查（1968年2月3日）〉，轉引自趙蔚，《趙紫陽傳》，頁114。

¹¹⁹ 「聯繫產量責任制」：就是後來的「包產責任制」；要求農民固定的生產量，超過的產量將予以獎勵。薛光軍，〈乾坤浩氣存-深切懷念陶鑄同志〉，《紅旗》，期1（1979年1月），頁46-53。

¹²⁰ 沈大爲、寒山碧、范言、陸鏗著，徐澤榮譯，《趙紫陽》，頁73-74；胡國君，〈趙紫陽的崛起〉，頁22。

決定讓劉少奇下台。¹²¹同年 11 月 12 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中，參謀總長羅瑞卿（1906-1978）因「反對突出政治」、「篡軍反黨」下台，¹²²林彪則因此擴大軍權，成為毛澤東在文革中一大助力。1966 年 5 月 16 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發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以下稱〈五一六通知〉），此依通知指出「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因此要「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領導權。」¹²³接著撤銷彭真（1902-1997）領導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以陳伯達（1904-1989）為組長，江青（1914-1991）為第一副組長，康生（1898-1975）為顧問，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文化大革命從此展開。5 月 18 日，林彪便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講話中支持「五一六通知」，說明「有了政權，無產階級、勞動人民就有了一切。沒有政權，就喪失一切。」¹²⁴

陶鑄身為中南局第一書記，憑藉他的影響力，以及過去與林彪「四野」的關係，1966 年 6 月便接替陸定一（1906-1996）擔任宣傳部長，8 月八屆十一中全會陶鑄再被擢昇為政治局常委，排名僅次於毛澤東、林彪、周恩來；趙紫陽則接替陶鑄成為廣東省委第一書記。¹²⁵陶鑄迅速升遷，使得趙紫陽在廣東的權位更形穩固。¹²⁶

¹²¹ 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著、賀和風譯，《漫長的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頁 16-17。

¹²² 吉林省中共黨史學會編，《新中國紀事（1949-1984）》，頁 382。

¹²³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又稱為〈五一六通知〉，文號為：中發（66）267 號，轉引自趙蔚，《趙紫陽傳》，頁 126。

¹²⁴ 林彪，〈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1966 年 5 月 18 日）〉，收於中國人民解放軍裝甲兵政治部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裝甲兵政治部，1969 年），頁 109。

¹²⁵ 胡國君，〈趙紫陽的崛起〉，頁 24。

¹²⁶ 面對當時險惡的鬥爭，趙紫陽曾勸陶鑄不要接受中央的職位。參閱曾志（按：陶鑄妻），〈如煙往事難忘卻〉，收於周明編，《歷史在這裡沉思 1966-1976 年記實》，卷 3（北京：華夏出版社，1986 年），頁 18。

1966年，陶鑄數度指示趙紫陽注意文革的形勢和政策變化，尤其保持對學校學生運動的控制。同年5月，中共中央認定文革不只是學術爭論，而是政治革命，廣東省委於是撤銷「學術革命領導小組」，改為成立「中共廣東省委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由省委書記區夢覺（1906-1992）擔任組長。¹²⁷6月，在劉少奇、鄧小平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對北京市的大學與中學派出工作組，協助各單位領導文化大革命；同時制訂八條指示，要求在運動中要「大字報不要上街」，「不要舉行示威」，「不搞大規模聲討會」。¹²⁸在廣東「一些學校的運動，我們掌握不了領導權，一些不正確的意見佔了上風，個別的甚至可能為壞份子所操控。」趙紫陽提醒幹部「這個運動我們還未真正領導起來，運動的領導權未真正抓到手，學生還不太相信我們。……《人民日報》六月二十四日〈黨的陽光照亮文化大革命的道路〉這篇社論發表以後，我們又不要忘記了總的方向。……這個運動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認真學好毛主席著作，把毛澤東思想作為最高指示。」¹²⁹7月，趙紫陽在廣東的文革組長會議上制定了「大會紀要」，要求各地「揭發右派」，把鬥爭的對象指向學校的師生與作家，避免波及廣東的領導幹部；¹³⁰「鬥爭必須堅持文鬥，嚴禁動武，堅持擺事實，講道理，口誅筆伐，但不得動手。……一般應採取小組會活動，大會批判要有領導進行，重點批判對象要經過一定的批准手續。」¹³¹

1966年7月19日，毛澤東在接見劉少奇指出派工作組去大學是錯誤的；「學生運動受到鎮壓，只有北洋軍閥才鎮壓學生運動，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劉少奇則認為「大部分工作組還是好的，不能採取消極撤換的辦法。」

¹²⁷ 〈中共廣東省委通知〉，（1966年5月9日），粵發（66）18號，轉引自趙蔚，《趙紫陽傳》，頁128。

¹²⁸ 吉林省中共黨史學會編，《新中國紀事（1949-1984）》，頁402。

¹²⁹ 趙紫陽，〈趙紫陽同志在廣東省委文化革命工作隊長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6月26日），轉引自趙蔚，《趙紫陽傳》，頁131-132。

¹³⁰ 錢太康，〈趙紫陽評傳〉，《當代》，期6，頁18。

¹³¹ 〈中共廣東省委關於文化大革命若干問題的指示〉，（1966年6月9日），粵發（66）18號，轉引自趙蔚，《趙紫陽傳》，頁129。

¹³²7月26日，毛澤東在接見「中央文革」全體成員時又指出「全國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性的錯誤，必須撤銷。」¹³³這段時間趙紫陽透過陶鑄在中共內部宣傳其「學習毛著」的經驗，藉此向毛澤東表態。¹³⁴8月1日至8月12日，毛澤東親自主持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並於8月5日時在中南海張貼〈砲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指責「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¹³⁵對此發展，趙紫陽主動在會議期間，通過電話口述一份「大字報」，命屬下張貼於省委辦公處，並歡迎群眾貼自己的大字報，揭露、批判自己的錯誤；這是文化大革命時許多地方與部門領導人明哲保身的共同作法。

由於陶鑄此時位居中央高位，廣東幹部自然期待能得到他的庇護，「大家對陶鑄同志參加中央常委感到很興奮。許多同志說陶鑄同志對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舉得高，對困難頂得住，幹勁大。」¹³⁶9月開始，各地紅衛兵四處串聯湧入廣東；¹³⁷廣東省委發出〈通知〉：「這是對廣州和廣東全省紅衛兵、革命師生、革命幹部的巨大鼓舞和有力支持。」¹³⁸陶鑄則勸告趙紫陽做自我檢查，並在北京接見南下革命師生時說：「趙紫陽很聰明，學生叫他怎麼做，他就怎麼做，不與學生鬧對立。」¹³⁹

1966年10月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對劉少奇、鄧小平進行批判；陶鑄對此表

¹³² 高舉、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1966-1976》，頁 30-32。

¹³³ 高舉、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1966-1976》，頁 33-34。

¹³⁴ 趙紫陽，〈大搞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加速農民思想的無產階級革命化，廣東農村開展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的基本情況和經驗〉，《紅旗》，期 10，頁 14-25。

¹³⁵ 吉林省中共黨史學會編，《新中國紀事（1949-1984）》，頁 406-407。

¹³⁶ 〈中共廣東省委召開的縣委書記會議簡報〉，汕頭地區第一號，1966年8月22日，轉引自趙蔚，《趙紫陽傳》，頁 140。

¹³⁷ 9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組之外第高等學校和中等學校學生代表來京參觀「文化大革命」運動〉通知，規定「分期分批來京參觀、學習、相互支援，交流革命經驗。……參觀一率免費坐火車。」吉林省中共黨史學會編，《新中國紀事（1949-1984）》，頁 409-410。

¹³⁸ 〈關於進一步做好接待外地紅衛兵和革命師生的通知〉（1966年9月15日），轉引自趙蔚，《趙紫陽傳》，頁 142。

¹³⁹ 丁望編，《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卷 1，頁 527。

示「組織幾百人去中南海喊打倒劉少奇，貼他的大字報，這種作法我不贊成。」¹⁴⁰而在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前夕，江青就曾要求陶鑄在會上批評劉少奇、鄧小平，但被陶鑄以新上任、不了解情況拒絕了。¹⁴¹這些事情都讓陶鑄深陷風暴。11月，趙紫陽做了自我檢查，但是隨著陶鑄遭到全國大字報的批評，指責陶鑄為「在中央某階機關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關鍵人物」，「玩弄折衷主義，充當極少數頑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物（按：王任重、張平化（1908-2001）、趙紫陽等陶鑄親信）的護法神」；¹⁴²此時趙紫陽的自我檢查也沒有過關，接著便在12月受到公開批評。¹⁴³1966年12月，廣東的群眾組織發動「廣東省批判省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群眾大會，趙紫陽被迫前往接受批判。¹⁴⁴1967年1月，北京出現指責陶鑄「是一個較劉鄧更危險的資產階級路線代表」的大字報，¹⁴⁵接著陶鑄不斷受到批評。隨著陶鑄遭受清算並被解除一切職務，趙紫陽也失去其在中央的支持；趙紫陽甚至曾對省委的同仁說：「陶鑄被揪後，紅衛兵小將對省委的看法將會根本改變，省委書記處的同志，特別是我本人，可能會被揪來揪去，今後省委書記處外碰頭的機會將更少更困難了，希望大家獨立作戰，處理工作中的問題。」¹⁴⁶

1967年1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無產階級革命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引述毛澤東「上海革命力量起來，全國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響華東，影響全國各省市。」的號召；¹⁴⁷在「上海風暴」的影響下，奪權迅速成為風潮。¹⁴⁸1月21日，廣東省革命造反委聯合員會（以下稱省革聯）

¹⁴⁰ 高舉、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1966-1976》，頁126-127。

¹⁴¹ 曾志，〈如煙往是難忘卻〉，收於《歷史在這裡沉思》，冊2，頁18。

¹⁴² 丁望編，《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卷1，頁507。

¹⁴³ 胡國君，〈趙紫陽的崛起〉，頁25-26。

¹⁴⁴ 趙蔚，《趙紫陽傳》，頁151。

¹⁴⁵ 趙聰，《文革運動歷程述略》，卷2（香港：友聯研究所，1971年），頁423。

¹⁴⁶ 楊應彬（按：當時廣東省委秘書長），〈交代〉（1968年12月30日），轉引自趙蔚，《趙紫陽傳》，頁151-152。

¹⁴⁷ 《人民日報》，1967年1月11日。

¹⁴⁸ 吉林省中共黨史學會編，《新中國紀事（1949-1984）》，頁418-419。

召開「批判廣東省委貫徹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趙紫陽被迫做自我檢查，坦承過去執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犯了方向與路線的錯誤。¹⁴⁹22日，省革聯宣布奪權通令，「省委在接受革命造反派監督之後，一定更加積極工作，決不消極怠工，敷衍塞責。」¹⁵⁰「今後你們聽我們的，我們聽毛主席的。」¹⁵¹趙紫陽隨即寫字條要值班的省委書記林李明（1910-1977）交出省委大印，作為取得權力的象徵，隨即召開省委常委擴大會議，發表〈中共廣東省委告全省黨員、幹部、人民書〉，下達權力轉換經過，由省革聯委任的一個小組保管省委與省委文革小組大印，並與省革聯議定省委大印使用方式，約定省委大印使用時必須經過造反派的監管人員同意。¹⁵²奪權過程透過和平談判，結果廣東省委的日常工作，所有請示、報告與指示實際上仍由趙紫陽等審批，然後由省革聯蓋省委大印發出。¹⁵³

省革聯的奪權行動並沒有得到中央文革小組承認，一方面因為省革聯的成立與運作受到廣東領導人的牽制並不健全，另一方面其奪權後並沒有解構省委機構；加上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並不支持省革聯，¹⁵⁴促使沒有參與奪權經過的廣東紅衛兵組織聲稱：「省革聯的奪權是一個機會主義的假奪權，陶（按：陶鑄）趙（按：趙紫陽）黑線的交權是一個金蟬脫殼的假交權，是由幾個秀才與趙紫陽等開圓桌會議達成讓權送印的協議」。¹⁵⁵其後廣東省紅衛兵發起「打倒趙紫陽，

¹⁴⁹ 區夢覺，〈區夢覺談省革聯問題〉，收於丁望編，《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卷6，頁109。省革聯組織並不健全，主要以中山大學「紅旗」為主，其運作仍有廣東領導人的羈絆；省革聯沒有發動革命派的大聯合，也沒有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和工人階級的領導。趙聰，《文革運動歷程述略》，卷2，頁582。

¹⁵⁰ 〈中共廣東省委告全省黨員、幹部、人民書〉（1967年2月23日），轉引自趙蔚，《趙紫陽傳》，頁156。

¹⁵¹ 寇慶延（按：當時廣東省省委常委兼副省長），〈交代〉（1969年1月6日），轉引自趙蔚，《趙紫陽傳》，頁154。

¹⁵² 伊凡，〈廣東奪權的曖昧情勢〉，《祖國》，總期41（1967年8月），頁21；胡國君，〈趙紫陽的崛起〉，頁27。

¹⁵³ 東被奪權前後數天，大陸大部分黨委大部分被奪權了。胡國君，〈趙紫陽的崛起〉，頁28。

¹⁵⁴ 此後廣東軍區掌握廣東權力，1967年3月15日成立的軍管會成爲最高權力機關。趙蔚，《趙紫陽傳》，頁160-162。

¹⁵⁵ 區夢覺，〈區夢覺談省革聯問題〉，收於丁望編，《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卷6，頁242；〈省委交權是個大陰謀〉，《南方日報》，1967年2月16日。

踢開省革聯，大亂廣東省，徹底鬧革命」的口號，1967年2月25日廣州工人遊行，高舉「打倒趙紫陽」的標語，並用禾草布料紮成趙紫陽的人像，倒掛在長堤等通衢要道；¹⁵⁶4月，趙紫陽被解除一切職務；5月5日，周恩來指示廣州軍區「對廣東省幾個當權派進行監護」，「監護中的應注意的問題，初步考慮有五條：一、保證安全，不許動武，有去有回；二、要做好批鬥的準備；三、事先看好會場；四、研究確定往返路線；五、掌握鬥爭時間。」¹⁵⁷此時趙紫陽「對搞經濟主義、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已表示承認。群眾在鬥爭時喊『打倒趙紫陽』，『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趙紫陽』時，他也舉手，但群眾在鬥爭時喊『打倒劉鄧陶』口號時，他堅持不舉手。」¹⁵⁸11月，紅衛兵在廣東省越秀山運動場萬人批鬥大會逼問趙紫陽承認「是否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思想」。¹⁵⁹在此之前，趙紫陽都謹遵陶鑄的指示，身段放低並在紅衛兵對其發動批評時先以書面或講話支持紅衛兵的立場，同時輕描淡寫的說明自己過去可能抵觸文革訴求的情事；但是這一次卻無法再以這些手段避開紅衛兵的「公審」，直至趙紫陽公開承認錯誤才送其回省委辦公室。

1968年2月21日，廣東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它宣告了中國赫魯雪夫及其在中南和廣東地區的代理人陶鑄、趙紫陽之流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徹底破產。」¹⁶⁰22日《人民日報》與《解放軍報》同步發表社論〈戰士指看南粵，更加鬱鬱蔥蔥-熱烈歡呼廣東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再度攻擊：「陶鑄這個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通過廣東的代理人（按：趙紫陽），時而從右的方面，時而從『左』的方面，破壞廣東省的無產階級大革命。」¹⁶¹文革期間，

¹⁵⁶ 王恩編，《紅衛兵造反記》，下冊（香港：宇宙出版社，1967年），頁283-284。

¹⁵⁷ 廣州警備司令部，〈對趙紫陽、區夢覺、尹林平實行監護鬥爭的措施〉，收於廣東省軍事管制委員會文化革命小組編，《情況反應》，期9（1967年5月），轉引自趙蔚，《趙紫陽傳》，頁165。

¹⁵⁸ 廣州警備司令部，〈對趙紫陽、區夢覺、尹林平實行監護鬥爭的措施〉，收於廣東省軍事管制委員會文化革命小組編，《情況反應》，期9，轉引自趙蔚，《趙紫陽傳》，頁166。

¹⁵⁹ 蔣化，〈趙紫陽-鄧小平左右的第二號人物〉，《南北極》，期4（1980年4月），頁23。

¹⁶⁰ 廣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由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黃永勝擔任。《南方日報》，1968年2月23日。

¹⁶¹ 《人民日報》發表祝賀各地革命委員會成立的社論中，對原本的黨委第一書記多半點名批判，趙紫陽是少數例外，這可能暗示趙紫陽尚未「定性」。〈戰士指看南粵，更加鬱鬱蔥蔥-熱烈歡呼

趙紫陽遭紅衛兵指為「走資本主義反動派路線」、「黨內走資派兼劉(按:劉少奇)、鄧(按:鄧小平)、陶(按:陶鑄)在廣東的代理人」,¹⁶²受到批鬥,此後趙紫陽終被解職,在廣州軍區的「保護」(既維護其安全但又限制其自由)下,等待機會東山再起;但是這樣的結果已經比當時大多數的中共幹部優遇多了。

文化大革命的奪權鬥爭破壞了原有黨政機關的運作,代之而起的是「革命領導幹部」、「解放軍代表」與「群眾組織代表」組成的「革命委員會」,由這一個黨政軍合一的臨時機構維持政權的運作;¹⁶³但是文革破壞太過,大批幹部遭到整肅,新興幹部受限知識與經驗不足,無法讓行政機構運作,迫使毛澤東「必須正確面對幹部問題」,因為原本的幹部「在政治上比較成熟,組織能力較強,鬥爭經驗豐富,是黨和人民的寶貴財富」,有解放被整肅幹部的需要;¹⁶⁴因此擬定「解放幹部政策」,「讓大批的革命幹部,包括一些犯了錯誤不再堅持,而又認真改正的革命幹部,參加到各級三結合的臨時機構來,大膽地使用他們」。¹⁶⁵

毛澤東與林彪聯手在文化大革命中掌握權力,同時也讓軍隊權力擴張;但是毛澤東並不願意軍隊獨大,也不願意林彪與他共享權利,因此文革中毛澤東與林彪的聯手,雖讓林彪權力膨脹,卻也加深毛澤東與林彪之間的矛盾。1970年8月,林彪在中央第九屆二中全會上與陳伯達聯手,公然反對毛澤東不設黨主席的規定;¹⁶⁶接著毛澤東對陳伯達、林彪展開批判,並安排中央軍委辦公室的人事與改組北京軍區,漸次掌握林彪手中的軍權。¹⁶⁷1970年,對趙紫陽的軍事監護被

廣東省革命委員會成立》,《人民日報》,1968年2月22日;〈戰士指看南粵,更加鬱鬱蔥蔥-熱烈歡呼廣東省革命委員會成立》,《解放軍報》,1968年2月22日。

¹⁶²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論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65。

¹⁶³ 紅旗雜誌編輯群,〈吸收無產階級的新鮮血液-整黨工作中的一個重要問題〉,《紅旗》,期4(1968年10月),頁5-12。

¹⁶⁴ 紅旗雜誌編輯群,〈必須正確地對待幹部〉,《紅旗》,期4(1967年3月),頁5-11。

¹⁶⁵ 〈正確地執行毛主席的幹部政策〉,《人民日報》,1967年10月22日社論。

¹⁶⁶ 齊茂吉,《毛澤東和彭德懷、林彪的合作與衝突》(台北:新新聞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頁233-234。

¹⁶⁷ 鄭學稼,《從文革到十一大》(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頁47。

解除，依照「犯了走資派錯誤」處置方式下放趙紫陽到工廠勞動。¹⁶⁸

1971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召開「批陳整風」匯報會，安排李先念參加中央軍委辦事組，分散林彪的軍權；會中認為黃永勝等林彪親信犯了方向性的嚴重錯誤，組織上犯了宗派主義錯誤。¹⁶⁹由於毛澤東與林彪之間的鬥爭，使黃永勝成為鬥爭的對象，在這樣的背景下趙紫陽的仕途出現轉機；4月，趙紫陽被解除監護審查後，分配到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工作。¹⁷⁰1971年5月趙紫陽復出，於18日內蒙古自治區第三次代表大會，經會議選舉與中央批准，任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書記兼內蒙古革命委員會副主任；¹⁷¹雖然趙紫陽重新起用職位比下台前的第一書記低，但對照當時多數被關押的幹部，已經非常幸運。趙紫陽在內蒙古的時間不長，但仍發揮其豐富經驗推展農業，「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三級所有制，按勞分配、等價交換的原則，……人民公社社員可以經營少量的自留地與家庭副業。」¹⁷²同時藉此機會，接觸到大陸境內少數民族的管理。

1971年8月14日至9月12日，毛澤東巡視南方，與各地領導人會談，多次批判林彪「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¹⁷³9月13日林彪墜機事件¹⁷⁴發生後，毛澤東陸續調動林彪過去的部屬，首先將廣州軍區第一政委劉

¹⁶⁸ 趙蔚，《趙紫陽傳》，頁177。

¹⁶⁹ 除黃永勝外，另外還有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藉此機會任命李德生為北京軍區司令員，謝富治為第一政治委員，紀登奎為第二政治委員。吉林省中共黨史學會編，《新中國紀事（1949-1984）》，頁492。毛澤東說削減林彪軍權的過程是「甩石頭、摻沙子和挖牆角」。〈毛主席在外地巡視期間沿途各地負責同志的談話記要（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收於郭華倫編，《中共機密文件彙編》（台北：政大國研中心，1978年），頁35。

¹⁷⁰ 趙紫陽，〈趙紫陽同志在中共廣東省委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72年3月25日）〉，轉引自趙蔚，《趙紫陽傳》，頁178。

¹⁷¹ 當時的內蒙古革命委員會主任為尤太忠。《內蒙古日報》，1971年5月23日，轉引自趙蔚，《趙紫陽傳》，頁181-182。

¹⁷² 《內蒙古日報》，1971年12月29日。

¹⁷³ 吉林省中共黨史學會編，《新中國紀事（1949-1984）》，頁497-498。林彪是否發動政變有頗多疑點，林彪外逃之前也始終按兵不動。參閱齊茂吉，《毛澤東和彭德懷、林彪的合作與衝突》，頁295-303。

¹⁷⁴ 1971年9月13日晚上11點，林彪前往蘇聯，圖中飛機迫降蒙古失事，機上八男一女全部罹難。吉林省中共黨史學會編，《新中國紀事（1949-1984）》，頁499-500。

興元（1908-1990）調往四川，由曾任毛澤東衛士的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1913-1999）取代其職務，接著派文革中崛起的幹部華國鋒（1921-）為廣州軍區政委，同時執行解放幹部政策，把文革前廣東黨政幹部調回廣東，分散軍隊權力。¹⁷⁵1972年4月，趙紫陽以不到1年的時間，回到廣東擔任省委第一書記兼革命委員會副主任。¹⁷⁶此時趙紫陽雖然沒有恢復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職位，但是二十年廣東工作經歷，使他發揮的影響力比名義上大得多；當時的廣州軍區政委兼書記孔石泉（1909-2002）曾說：「趙紫陽同志在廣東工作了近二十年了，經驗很豐富，我們要向他學習。」¹⁷⁷

回到廣東的趙紫陽很快就注意到廣東經濟的問題，「目前我們廣東，總的來講糧食還是偏緊，群眾的口糧還是緊張，市場也比較緊張，……反應農業基礎薄弱，農業生產跟不上去。……一些同農業沒有直接關係的，還沒有那麼迫切的工業基本建設戰線，還應當進一步的縮短，這樣我們才可以擠出資金和材料支援農業，我看這是考慮農、輕（按：輕工業）、重（按：重工業）關係中的一個關鍵的問題。……要貫徹『以糧為綱，全面發展』的方針。」¹⁷⁸1974年廣東夏糧豐收，徵購入庫年增長率為28%，全省早稻豐收，總產量增加10%以上，比較當時各省政績相對突出；¹⁷⁹反映了趙紫陽廣東農業政策的成效。

1973年3月10日，毛澤東同意讓鄧小平「恢復黨的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因為「鄧小平犯的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分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捱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二）他沒有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1892-1986）

¹⁷⁵ 胡國君，〈趙紫陽的崛起〉，頁29-31。

¹⁷⁶ 《南方日報》，1972年4月8日。

¹⁷⁷ 孔石泉，〈孔石泉1972年3月24日在廣東省革命委員會常委擴大會議上的發言〉，轉引自趙蔚，《趙紫陽傳》，頁190。

¹⁷⁸ 趙紫陽，〈趙紫陽在廣東省農林科技會議上的講話〉（1972年7月4日），轉引自趙蔚，《趙紫陽傳》，頁193。

¹⁷⁹ 《南方日報》，1974年8月18日。

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¹⁸⁰8月，中共召開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中批判「林彪集團」的罪行，同時認為「九大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都是正確的」，文化大革命「今後還要進行多次」；另外文革中鄧小平、趙紫陽等受到打擊的老幹部則被選為中央委員，這是趙紫陽第一次當選中央委員。¹⁸¹1973年12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更換八大軍區司令員，並派黨政幹部接替各軍區的政委與第一書記，剷除軍區司令員的黨政大權；此時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調南京軍區，而丁盛兼任的廣東省第一書記與革命委員會主任改由趙紫陽升任。¹⁸²趙紫陽此時以回復文革前在廣東的權位。1974年4月，中共中央正式任命趙紫陽為廣東省第一書記、革命委員會主任兼廣州軍區政委。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1號文件，全國開始「批林批孔」運動，趙紫陽為避免運動失焦，認為：「鬥爭鋒芒要始終對準林彪及其死黨黃永勝一伙，不要指向革命群眾、革命群眾組織的代表和革命幹部，不要層層揪代理人、追隨者，擴大打擊面。」¹⁸³從此事件觀察，趙紫陽在打擊失勢政敵黃永勝雖然不手軟，但沒有藉機株連太多人，也沒有讓「批林批孔」運動發展成擾民的運動，在政治上是成熟的表現。

第四節 四川經驗成爲全國改革藍圖

1973年4月鄧小平復出，隨即在1975年2月十屆二中全會中當選黨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軍委會副主席兼總參謀長。1975年1月中共召開第四屆中

¹⁸⁰ 「鄧、毛、謝、古」分別指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均爲當時中央蘇區黨政軍幹部，其中毛澤覃爲毛澤東胞弟。〈中共中央關於恢復鄧小平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1973）14號，頁2，轉引自趙蔚，《趙紫陽傳》，頁194-196。

¹⁸¹ 另外晉身中央委員會的還有烏蘭夫、李井泉、譚震林、廖承志等。吉林省中共黨史學會編，《新中國紀事（1949-1984）》，頁529。

¹⁸² 會中毛澤東推薦鄧小平進入軍委，並擔任總參謀長。吉林省中共黨史學會編，《新中國紀事（1949-1984）》，頁537。

¹⁸³ 趙紫陽，〈趙紫陽在廣東省革命委員會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74年5月17日），頁6，轉引自趙蔚，《趙紫陽傳》，頁201。1月下旬，江青等在北京召開在京部隊單位、中直機關及國家機關萬人「批林批孔」大會，企圖將鬥爭的矛頭指向周恩來；毛澤東曾爲此批評江青。參閱吉林省中共黨史學會編，《新中國紀事（1949-1984）》，頁539-540。

共人大代表會議，周恩來在第一次會議的「政府施政報告」中，重新提出「現代化建設」，周指出：「遵照毛主席指示，三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曾經提出，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設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時間，即在 1980 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制；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在世界前列。」¹⁸⁴並由鄧小平擬定「1976 年到 1985 年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綱要草案」，整頓大陸經濟，推動「四個現代化」¹⁸⁵，其後因「四人幫」攻擊「現代化建設」為「走復辟資本主義道路」，隨著周恩來去世及鄧小平被整肅而停滯。¹⁸⁶

1975 年 12 月趙紫陽前往四川，擔任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兼任革命委員會主任及成都軍區第一政委，集四川黨、政、軍權力於一身，負責振興四川的經濟。¹⁸⁷四川本來就是第二野戰軍的根據地，趙紫陽調往四川時，許多地方幹部便是出身第二野戰軍，由同樣曾為第二野戰軍的趙紫陽管理四川，自然有人和上的好處。¹⁸⁸歷史上素有「天府之國」之稱的四川，總面積佔大陸 6%，人口卻佔了 10%，而地方行政單位劃分數量也是最多，可說是大陸第一行省，最能體現中國的國情。由於中共多年實行的「重工輕農」經濟政策，經濟凋敝；文革以後，四川也成為缺糧省份，需要由外省輸運糧食賑災；¹⁸⁹隨著鄧小平被整肅，趙紫陽在 1976 年也在四川發起「批鄧」運動，受到華國鋒「農業學大寨」運動的影響，趙紫陽在四川的前兩年的經濟改革成效有限。¹⁹⁰

¹⁸⁴ 宮校聞，〈要有一個全面規劃〉，《紅旗》，期 2（1975 年 2 月），頁 23。

¹⁸⁵ 1964 年 12 月，周恩來在三屆人代會的政府施政報告中即已提出「四個現代化」：「爭取在不太長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爲一個去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技的社會主義強國。」後因文化大革命而擱置。《人民日報》，1964 年 12 月 31 日。

¹⁸⁶ 1976 年 4 月 5 日天安門事件後，鄧小平再度垮臺。〈抓緊要害，深入批鄧〉，《人民日報》，1976 年 8 月 23 日。

¹⁸⁷ 胡國君，〈趙紫陽的崛起〉，頁 45-46。

¹⁸⁸ 趙蔚，《趙紫陽傳》，頁 210。

¹⁸⁹ 當時四川農村飢荒嚴重，甚至有賣兒賣女，要飯逃荒的情況。蔣化，〈趙紫陽-鄧小平左右的第二號人物〉，《南北極月刊》，期 4（1980 年 4 月），頁 23-24。

¹⁹⁰ 1976 年四川全省糧食畝產量 325 斤，其中雜糧佔 40%，農民年收入 53.6 元，年均口糧 369 斤，種種數據都比全國平均值低。中共四川省委研究室編，《四川省情》（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年），頁 138-139、141、225、227。

1976年1月1日，兩報一刊同時發表社論〈天下無難事，只要肯攀登〉，不點名批判鄧小平「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¹⁹¹1月8日周恩來去世，由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¹⁹²3月，中共中央所發出的〈毛主席重要指示〉，點名批判鄧小平，接著《人民日報》在社論傳達此項訊息。¹⁹³有鑒於政治運動的慣例，趙紫陽不能免俗的表態「在各級黨委一元化的領導下，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¹⁹⁴但是盡量保持低調，利用深入四川地震災區賑災的機會，避免在會議上批評鄧小平；由於趙紫陽在批鄧運動的消極態度，被批評為「躲進深山，消極抵制批鄧與反擊右傾翻風。」¹⁹⁵4月4日，群眾聚集天安門悼念周恩來，中央政治局認為「一批壞人跳出來了，……有的直接攻擊主席，有的攻擊中央。」¹⁹⁶「有計劃的、有組織的反革命」。¹⁹⁶「天安門事件」後，中央政治局通過「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華國鋒同志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和鄧小平同志最近的表現，認為鄧小平同志問題的性質已經轉變為對抗性的矛盾。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政治局一致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¹⁹⁷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10月6日，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聯手發動政變，逮捕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10月7日，華國鋒等代表中共中央政

¹⁹¹ 《人民日報》，1976年1月1日社論。兩報一刊是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辭彙，兩報指《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一刊指《紅旗》雜誌。文化大革命時期，其他的新聞媒體的主管都被打倒了，人民日報和紅旗由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1904-1989）為首的工作組領導，解放軍報是在「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副統帥林彪所領導。文化大革命中代表「無產階級司令部」聲音的社論通常同時在這兩報一刊上發表。兩報一刊發表社論後，中央和各地報刊都要全文轉載，廣播電臺都要全文廣播。於是兩報一刊就成了中國唯一的喉舌，出現了「小報抄大報，大報抄《紅旗》」的不正常現象。參閱趙蔚，《趙紫陽傳》，頁210。

¹⁹² 1月下旬由毛澤東提議，經中央政治局通過華國鋒的人事案。吉林省中共黨史學會編，《新中國紀事（1949-1984）》，頁580。

¹⁹³ 〈翻案不得人心〉，《人民日報》，1976年3月10日。

¹⁹⁴ 〈趙紫陽批鄧講話〉，《人民日報》，1976年4月10日。

¹⁹⁵ 嚴家其、高舉，《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頁865。

¹⁹⁶ 吉林省中共黨史學會編，《新中國紀事（1949-1984）》，頁582-583。

¹⁹⁷ 吉林省中共黨史學會編，《新中國紀事（1949-1984）》，頁583-584。

治局宣佈「四人幫」爲反黨集團，對他們實行隔離審查，結束歷時 10 年的文化大革命。¹⁹⁸隨著「四人幫」的下台，清算鬥爭隨即展開，11 月 20 日四川省委召開「揭發批判四人幫反黨集團大會」，但趙紫陽說：「對『四人幫』的罪行徹底的揭，狠狠的批，堅決的鬥！……要允許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改了就好，不要揪住不放。」¹⁹⁹由這次清算「四人幫」的事件可以再度發現趙紫陽對政治上犯錯誤的人比較寬容的。

雖然 1977 年當時局勢仍不適合推廣聯產責任制，但是修正農業經營管理，改善按勞分配辦法後，四川夏收與秋收作物豐收。²⁰⁰爲了提高產量，水源不足的田地不再執著種水稻，改爲旱作，「許多社、隊的經驗證明，在蓄水少、旱田多，水利又沒有過關的情況下，要早下決心，早做準備，走旱路走到底，這樣就可以大幅增產。」²⁰¹「有些同志對四川能不能搞上去，信心不足。……全省形式急轉直上，……工農業生產恢復之快，增長幅度之大，超出人們的預料。」²⁰²可見趙紫陽主導的農業政策獲得顯著的成果。在提振生產的同時，趙紫陽很注重資源分配的問題，「農業豐收了，再分配上要做到國家、集體、個人三兼顧，一定要體現按勞分配的原則，使社員得到實惠。……在目前生產水平還不高的情況下，集體的積累、儲備等一定不要提留太多，以保證百分之九十的社員收入有所增加。」²⁰³1978 年初，四川省委也在《四川日報》公佈〈關於目前農村經濟政策的幾個主要問題的規定〉，要求生產隊落實經濟政策與經營管理制度，解決增產不增收、多勞不多得、分配不兌現等問題。²⁰⁴這樣的政策宣示，實際上已經與「農業學大寨」自報自記的記工分管理模式產生矛盾；而 1977 年四川每個社員與 1976 年相

¹⁹⁸ 當時中央政治局委員還有李先念、汪東興（1916-）、葉劍英。趙蔚，《趙紫陽傳》，頁 215。

¹⁹⁹ 《四川日報》，1976 年 11 月 22 日。

²⁰⁰ 《四川日報》，1977 年 6 月 12 日。

²⁰¹ 《四川日報》，1977 年 12 月 12 日。

²⁰² 趙紫陽，〈奮發努力加快四川建設，爲國家爲人民多做貢獻〉，《紅旗》，期 1，頁 16-23。

²⁰³ 趙紫陽，〈奮發努力加快四川建設，爲國家爲人民多做貢獻〉，《紅旗》，期 1，頁 16-23。

²⁰⁴ 《四川日報》，1977 年 12 月 12 日。

以，口糧增加 66 斤，現金分配增加 9.6 元，這樣的經濟表現相對突出。²⁰⁵1978 年安徽省委開始試驗「包產到組」、「包產到戶」的生產模式時；四川也實行「放寬政策」，讓農民的自留地擴大到耕地面積的 15%，以「包產到組」的方式刺激農民的生產動機。²⁰⁶

1977 年 2 月 7 日，華國鋒透過兩報一刊發表〈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宣傳「兩個凡是」的立場，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的遵循。」²⁰⁷華國鋒這樣的立場，遭到老幹部的抵制，不得不讓鄧小平東山再起。7 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通過四項決議：「（一）關於追認華國鋒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會主席的決議；（二）關於恢復鄧小平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等職務的決議；（三）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四）關於提前召開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的決定。」²⁰⁸1976 年 10 月的「四人幫事件」與 1977 年 7 月的鄧小平復出，使中共經濟政策開始轉變；1977 年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余秋里（1914-1999）在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上，再度提出「現代化建設」的構想，「從 1976 年到 1985 年，是實現兩步宏圖（按：周恩來的兩步現代化建設）的關鍵十年，在這十年內我們首先要建成全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基本上完成國家經濟的技術改造。」²⁰⁹1977 年 8 月十一大中將「四個現代化」列入黨章，1978 年五屆人大會議更將其列入新憲法，稱為「新時期的總任務」。²¹⁰

²⁰⁵ 《四川日報》，1977 年 6 月 14 日。

²⁰⁶ 吉林省中共黨史學會編，《新中國紀事（1949-1984）》，頁 639。

²⁰⁷ 〈學好文件抓住綱〉，《紅旗》，期 3（1977 年 3 月），頁 15-18；〈學好文件抓住綱〉，《人民日報》，1977 年 2 月 7 日；〈學好文件抓住綱〉，《解放軍報》，1977 年 2 月 7 日。

²⁰⁸ 吉林省中共黨史學會編，《新中國紀事（1949-1984）》，頁 608。

²⁰⁹ 李鐵，〈努力提高自己的馬列主義水準-重新學習《整頓黨的作風》的一點體會〉，《紅旗》，期 6（1975 年 6 月），頁 27。

²¹⁰ 胡國君，〈趙紫陽的崛起〉，頁 48-49。

在亮眼的政績襯托下，1977年8月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趙紫陽連任中央委員，並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²¹¹8月，趙紫陽隨華國鋒到南斯拉夫與羅馬尼亞訪問，是當時地方領導幹部第一個有機會見識與比較他國的經濟制度。在四川的經濟改革中，有許多就是摹仿南斯拉夫的經濟經驗。²¹²趙紫陽結束南斯拉夫訪問回大陸後，積極鼓吹南斯拉夫經驗，並以此為基礎作為四川經濟改革的主要內容。²¹³1978年1月，當時最重要的雜誌《紅旗》刊登趙紫陽名為〈奮發努力加快四川經驗，位國家人民多做貢獻〉，使趙紫陽的聲望更形提高。²¹⁴

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重新掌握大權，會中為「文化大革命」時被整肅的部份幹部及「天安門事件」平反，同時承認大陸有嚴重的經濟問題和亟待改進的體制問題，並宣稱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方面；「對權力過分集中的經濟體制進行真的改革；解決好國民經濟的重大比例嚴重失調問題，加快農業的發展。」²¹⁵隨著鄧小平復出與大權在握，1978年10月趙紫陽依其在四川各地農村進行實地調查的心得，制定〈關於農村經濟改革的若干規定〉（又稱為〈農業十二條〉）²¹⁶開始在四川農村進行，並透過省委，在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的原則下，「什麼樣的體制、制度、政策、辦法最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就應當採用，絕不能作繭自縛。」²¹⁷「在經濟改革問題上，要有堅定性、堅韌性，鍥而不捨，長期搞下去，絕不能走回頭路。」²¹⁸在四川六

²¹¹ 王健英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匯編》，頁653。

²¹² 胡國君，〈趙紫陽的崛起〉，頁59。

²¹³ 南斯拉夫經濟改革內容包括地方適當分權，利用利潤動機、市場價格提高生產效率，但企業仍為國有。參閱George Nikolaus Halm著，賈士達譯，《經濟制度淺說》（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76年），頁171。

²¹⁴ 趙紫陽，〈奮發努力加快四川經驗，位國家人民多做貢獻〉，《紅旗》，期1，頁16-23。

²¹⁵ 吉林省中共黨史學會編，《新中國紀事（1949-1984）》，頁646-647；中共1989年12月22日通過的〈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轉引自國防部軍事情報局，《1979年匪情年報》（台北：國防部軍事情報局，1979年），頁三之85-三之89。

²¹⁶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1978年匪情年報》（台北：國防部軍事情報局，1978年），頁二之113。

²¹⁷ 趙紫陽，〈趙紫陽對四川省市地州縣委書記會議上講話〉，《人民日報》，1979年11月10日。

²¹⁸ 趙紫陽，〈趙紫陽於1980年3月16日在四川省委擴大會議講話第二部分〉，《人民日報》，1980年4月21日。

個企業試辦「擴大企業自主權」。²¹⁹趙紫陽在農村實行經濟改革，強調簡化政令、下放權力、管理鬆綁的方針，給四川農民較彈性的生產環境，提高生產的意願；「不解決恐『右』症，就不能改變這種思想僵化、半僵化的狀態，幹部和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就會被窒息，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²²⁰趙紫陽一方面重視生產，一方面利用政治風向保護自己的風格再次顯現。

趙紫陽在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後，確定經濟改革的理念。²²¹四川的農業政策因此再擴大生產隊的自主權，減少農民勞動與產量的攤派，漸漸減少「農業學大寨」運動的干擾；工業政策則是在 1979 年初頒布〈地方工業擴大企業權力，加快生產建設步伐的試點意見〉（又稱爲〈工業十四條〉），把試點擴展到四川全省一百個企業中進行，1979 年 10 月又把〈工業十四條〉改爲〈工業十二條〉，1980 年再把〈工業十二條〉修正爲〈工業二十條〉，而企業的自主權隨之更形擴大。²²²「從全國來看，全省都在試點，四川改得早一點，有責任繼續提供這方面的經驗。……四川就是十二條、十四條，四川改革的若干規定，農工商綜合經營的試點，基層供銷社獨立經營的試點等」²²³，讓四川改革腳步成爲大陸各省模仿的對象。1979 年初，趙紫陽參考南斯拉夫的經驗推行「農工商聯合企業」，建立相關產業供應鏈，在建立試驗性的「長江農工商聯合公司」，標榜財務獨立核算，自負盈虧；在取得成效後，推廣到四川全省。²²⁴

中共計劃經濟的基礎是透過「統購統銷」低價收購農產品，再將累積的資本

²¹⁹ 擴大企業自主權：從 1978 年 10 月開始試辦，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推行到一百個企業。參閱林子力，〈我國經濟體制政策的開端〉，《人民日報》，1980 年 4 月 4 日。

²²⁰ 《四川日報》，1979 年 1 月 22 日，轉引自趙蔚，《趙紫陽傳》，頁 224。

²²¹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1978 年匪情年報》，頁三之 87。

²²² 胡國君，〈趙紫陽的崛起〉，頁 64-65。

²²³ 趙紫陽，〈四川省委擴大會議講話第二部分〉，《人民日報》，1980 年 4 月 21 日。

²²⁴ 劉相齊，〈農工商聯合企業-中國的一種新事物〉，《經濟報導》，總期 1667（1980 年 4 月），頁 25。

發展重工業；鄧小平於文革後掌權體認到經濟改革迫切需要，²²⁵鼓勵務實的經濟改革，於是農業上「包產到戶」又重新上場，工業上則提出經濟特區的概念。²²⁶在中央的態度逐漸明朗後，趙紫陽也逐漸能避免政治的干擾，趙指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排除『左』右干擾，進一步解放思想，維護安定團結。……經濟工作是當前最大的政治，是壓倒一切的政治，是我們全黨的中心任務。……把我們的思想解放到四化建設所需要的高度。」²²⁷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最早的始點是在四川和安徽，在四川就是趙紫陽領導的，所謂「要吃糧，找紫陽」就是四川流傳的一句話。在四川任職期間，趙紫陽領導嘗試農村改革，成為後來中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試點。他領導的四川與萬里領導的安徽，是最早進行農村改革，取得很好效果的地方。1979年9月的十一屆四中全會，趙紫陽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²²⁸1980年2月調任中央，進入中共權力核心。

²²⁵ 文革結束象徵大陸對政治鬥爭不再熱情，同時經濟狀況也相對惡化；1978年的農業人口從1949年81.4%升為84%，個人生產量卻從1956年的612斤降為590斤，可是化學肥料與機械馬力都是增加的。陳一諮，《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頁22。

²²⁶ 包產到戶又稱「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俗稱「大包干」，1960年已經出現，它改變統購統銷的生產方式，允許農民擁有剩餘農產品；當時毛澤東並不認同而取消；1978年安徽農民又開始試用這一方法，並成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在中國農村推動的一項重要改革。陳一諮，《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頁13-15。

²²⁷ 參閱趙紫陽1979年11月在四川省地州縣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四川日報》，1979年11月10日，轉引自趙蔚，《趙紫陽傳》，頁227。。

²²⁸ 王健英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匯編》，頁645。

第三章 總理全國經濟

本章要描述的是趙紫陽在擔任總理期間，中共上下積極改善經濟，但是在意識型態的限制下，趙紫陽的做為；內容分為四節，第一節討論經濟體制改革的內容，第二節討論改革過程的問題與障礙，第三節則討論 1986 年的學潮的行程與影響，第四節則討論權力如何轉移等。

1980 年 2 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增選趙紫陽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相對年輕的趙紫陽在 61 歲時爬上中共黨權力結構的頂端。¹同年 4 月人大第十四次會議中，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²8 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向全國人大建議華國鋒不兼任總理，由趙紫陽接任。³9 月，五屆人大四次會議接受華國鋒辭去總理職務，任命趙紫陽為第三任國務院總理。⁴1981 年 6 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澤東做了正式的評價；趙紫陽也在會中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從此確立了鄧小平、胡耀邦（1915-1989）、趙紫陽為核心的中共最高領導體系；⁵胡耀邦在會議結束時對這樣的領導體系說明如下：「我是我們黨的一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被推上現在這個歷史崗位的。本來，按全黨絕大多數同志的意願，中央主席是由小平同志來當的，……現在這樣定下來了，這當然是一個很大的變化。但是，我有責任向全會說明，有兩條沒有變，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沒有變，二是我的水平也沒有變。」⁶這段話具體描繪

¹ 同時被增選為政治局常委的還有胡耀邦，會中同時恢復設立中央書記處，並以胡耀邦為總書記；而被稱為「小四人幫」的汪東興、陳錫聯、吳德、紀登奎等退出政治局。吉林省中共黨史學會編，《新中國紀事（1949-1984）》，頁 689-690。

² 萬里同時也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吉林省中共黨史學會編，《新中國紀事（1949-1984）》，頁 704。

³ 吉林省中共黨史學會編，《新中國紀事（1949-1984）》，頁 705-706。中央政治局和其常委會是中央委員會閉會期間中共黨中央的最高領導機關，常委會做決策時常不需要與政治局商量。李英明，《向鄧後時代轉折》，頁 32-37。

⁴ 鄧小平等在五屆人大三次會議時，藉著渤海二號沉船與寶鋼事件，引導華國鋒政策失敗的批評。許行，〈五屆人大四次會議引起問題〉，《爭鳴》，期 1（1982 年 1 月），頁 18-20。

⁵ 高舉，《後文革史》，中卷，頁 2。

⁶ 楊中美，《胡耀邦評傳》（香港：奔馬出版社，1989 年），頁 200。

出鄧小平是胡、趙的權力支柱。

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放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策，以經濟建設為工作重點；會後，逐漸在農村推行土地承包經營（分田單幹），改革農村經濟體制。⁷1982年9月，第十二屆全國代表大會中鄧小平廢除黨主席的職務，明定政治局常委會為中共中央領導核心，當時的委員分別為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和陳雲；⁸鄧小平在提到80年代的任務時指出：「核心是經濟建設，它是解決國內問題的基礎。……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堅定不移的實行對外開放政策。……進行體制改革。……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⁹1982年十二大以後，中共中央分工，總書記胡耀邦主管政治，總理趙紫陽主管經濟。¹⁰從1980年至1986年為止，趙紫陽在總理職務上主持全國經濟事務，便是依照鄧小平揭櫫的方向上；先農村後城市，發展中國經濟¹¹。

趙紫陽從四川的農村改革一直到以後主持國務院總理的工作，然後主持全國的農村改革、經濟城市改革，他是有一系列全盤的設想，而且試圖把經濟改革按照一個綜合的、有規劃、有步驟的方向來進行。¹²所以涉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桂冠，其實是趙紫陽的。鄧小平是運用趙紫陽來為他在第一線處理經濟上的難題，特別是經濟改革過程中冒出來的一系列複雜的問題，同時鄧小平對趙紫陽並不是真正的信任的，還時時箝制他，另外鄧小平也在趙紫陽身邊保留了一批對經濟改革持保留意見的領導人物，比方說趙紫陽當了總書記之後，接任的總理是李鵬。

第一節 經濟體制改革

⁷ 丁望，《六四前後》，上冊，頁5。

⁸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下冊，頁941。

⁹ 鄧小平，〈善與利用時機解決發展問題〉，《鄧小平文選》卷3，頁390-393。

¹⁰ 鮑彤，〈咫尺天涯念紫陽-兼為“六四”十五週年作〉，收於陳一諮、嚴家其主編，《趙紫陽與中國改革》，頁63。

¹¹ 許家屯，〈懷念鄧小平，關心趙紫陽〉，收於袁會章編，《趙紫陽最後的機會》，頁25。

¹² 在趙紫陽的支持下，80年代成立若干研究機構作為經濟改革的智囊，包括1980年成立「中國農村問題研究組」。陳一諮，《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頁15。

鄧小平掌權之後，體認到毛澤東改變生產關係以提高生產力的方法已經行不通，爲了提高生產力，不管採用的方法姓「資」還是姓「社」，只要有效都可採用，所謂「黑貓白貓，能抓老鼠，便是好貓。」¹³1978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中，鄧小平根據陳雲的意見，批評中共的經濟體制權力集中，政治掛帥，否定經濟規律，在「洋躍進」期間大舉外債，盲目引進工廠設備，不懂得量力而爲，循序漸進，以致產生瓶頸；針對改善農民生活，則建議推廣四川與安徽的經驗，揚棄以糧爲綱的口號，鼓勵多種經營，擴大農民自留地與恢復集鎮市場，以提高生產意願。¹⁴趙紫陽認爲其原因是：「不了解要把我國這樣落後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提高爲先進的生產力發展水平需要長期艱鉅的努力，因此在指導方針上老是急於求成，老是犯『左』的錯誤。」¹⁵

鄧小平雖然提出要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個目標，要在工業、農業、科技和國防等方面實現現代化，但是在實現目標的過程中卻沒有具體的方法，只能「摸著石頭過河」。¹⁶當時對大陸基本制度存著三種看法，在黨和政府的元老來說，認爲社會主義制度是好的，只是被「四人幫」破壞了；對於中階幹部和中年知識份子來說，傾向社會主義是好的，但是有缺陷需要克服的看法；少數青年知識分子則認爲社會主義實行已久，卻無法落實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¹⁷

1980年趙紫陽擔任總理，全面負責中國的經濟工作時，中國剛剛結束了歷

¹³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下冊，頁893。

¹⁴ 四川與安徽的經驗，即是由趙紫陽與萬里主持，其後兩人便晉身中央，成爲國務院副總理。馬齊彬、陳文斌、林蘊輝、叢進、王年一、張天榮、卜偉華，《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增訂本（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頁410、428。爲了刺激生產，1978年中共提高棉花、土特產品的收購價格。參閱趙德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67-1984）》（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634。

¹⁵ 趙紫陽，〈關於調整國民經濟的幾個問題〉，收於中共研究雜誌社編輯群，《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首長講話及文件選》，上冊（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1983年），頁608。

¹⁶ 陳雲，〈經濟形勢與經驗教訓〉，《陳雲文選（1956-1985）》（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251。

¹⁷ 陳一諮，《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頁7-9。

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華國鋒推動「洋躍進」的經濟政策所造成的經濟失調尚在，存在著財政大量赤字、貨幣發行過多、物價上漲的問題。因此在十一屆三全會以後，採取財政緊縮的政策，大量削減國防、行政、基礎建設的預算，另一方面嚴格控制物價、打擊倒把與走私行爲。¹⁸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工作會一決議在經濟上實行進一步調整，在政治上實現進一步安定團結。會中趙紫陽提出對「經濟調整」的看法：「在扭轉國民經濟被動狀況的重大調整措施上，要高度集中統一，要服從中央統一指揮；過去我們走的是一條重基建輕生產、高積累低效率的道路，表面上看生產的增長速度並不慢，但是真正創造的社會財富少，人民得到的實惠不多；今後要走出一條發展經濟的新路子，不是靠多少基本建設，而是主要靠發揮現有企業的作用，提高經濟效果。」¹⁹

1982年2月，五屆人大常委第二十二次會議中通過趙紫陽提出的精簡國務院編制的方案，配合鄧小平與胡耀邦推動的老幹部離休制度，國務院部門從100個減為61個，編制人員從5.1萬人減為3萬人，大量裁減冗員，提升人員素質。²⁰國務院的機構精簡方案是副總理由13人減為2人，設國務委員參與國務院常務會議；精簡過程中雖然有新闢若干部門，但是仍有機構整併1/2，人員編制裁減1/3的效果。水利部與電力工業部合併，正副部長平均年齡降低6歲，局長以上幹部具大專學歷佔60%，並都有領導或設計水電工程的經驗；合併後局級以上200多名超齡幹部離休或退休，其餘超編的一般幹部則輔導轉任其他職位。²¹趙紫陽積極精簡國務院機構與人事的同時，也藉此鞏固在國務院系統的地位。

¹⁸ 趙紫陽，〈關於調整國民經濟的幾個問題〉，收於《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首長講話及文件選》，上冊，頁608、612-615。

¹⁹ 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綜合組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大事記》（北京：紅旗出版社，1987年），頁124。

²⁰ 〈關於國務院機構改革的決議〉，《人民日報》，1981年3月9日。

²¹ 根據趙紫陽的提議，由萬里、姚依林擔任副總理，余秋里、耿飆、方毅、谷牧、康世恩、陳慕華、薄一波、姬鵬飛、黃華、張勁夫轉任國務委員。《新華月報》，期5（1982年5月），轉引自高舉，《後文革史-中國自由化潮流》，下卷，頁56-57。

1980年以來，從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農產品統購統銷逐漸取消，使其價格浮動，而工業成本及價格也隨之浮動；迫使國營企業也必須跟著進行改革。²²於是，隨著農村經濟改革，改革城市經濟與政府管理方式的需求也跟著出現。1982年2月，趙紫陽在「全國工業交通會議」中指出：「把各項經濟工作轉到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的道路上來，是實現財政經濟根本好轉的關鍵；國民經濟必須強調以計劃經濟為主，實行全國一盤棋的原則。」²³同年5月，經人大常委會批准，成立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由趙紫陽兼任主任，負責制定經濟改革的總體規劃。²⁴

1982年9月，趙紫陽致函政治局委員胡耀邦、鄧小平、李先念和陳雲，說明經濟體制改革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四點：

- 一、中國實行計劃經濟，不是市場經濟。
- 二、自發地盲目地通過市場進行調節的生產和交換，只限於小商品、三類農副產品和服務修理行業，它們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起輔助作用。
- 三、計劃經濟不等於指令性計劃為主。指令性計劃和指導性計劃都是計劃經濟的具體形式。我國幅員遼闊，現代化手段不發達，交通不便，信息不靈，編制包羅萬象的指令性計劃，不僅不可能，而且有害。在當前和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的方針應該是逐步縮小指令性計劃，擴大指導性計劃。
- 四、指導性計劃時主要用經濟手段調節，指令性計劃也必須考慮經濟規律，特別是價值規律的作用。社會主義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計劃要通過價值規律來實現，要運用價值規律來為計劃服務。「計劃第一，價值規律第二」這一表述並不確切，今後不宜繼續沿用。

²² 李英明，《向鄧後時代轉折》，頁102-105。

²³ 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綜合組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大事記》，頁208。

²⁴ 吉林省中共黨史學會編，《新中國紀事（1949-1984）》，頁760。

應該如實地把兩者統一起來，而不要把它們割裂開或對立起來。²⁵

爲了進一步務實推動經濟改革，同時避免被攻擊向資本主義靠攏，趙紫陽解釋：「把中國的經濟體制既同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模式相區別，又不與舊的模式相雷同。社會主義制度是優越的，但舊的模式清規戒律太盛，把企業捆的緊緊的。……中國應該走自己的路。……中國式的計劃經濟，應該是自覺依據並運用價值規律的計劃經濟。」²⁶鄧小平很同意這封信的看法，特別指示在黨內轉發傳達。²⁷從這封信的內容可看出趙紫陽不改其在經濟事務上的務實態度，同時在宣傳上盡量採取溫和的說法，而鄧小平仍是主導經濟方向的人，趙紫陽則是小心執行經濟政策。1982年11月的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便批准趙紫陽提出〈關於第六個五年計劃的報告〉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六個五年計劃〉，其內容是貫徹「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解決過去遺留的經濟問題，積極穩定的加快經濟體制改革進程，讓農工業產值年增率從4%增爲5%。²⁸事實上，1983年雖然有「清理精神污染運動」的干擾，但農工業產值仍然成長了10%，國民所得也成長10%。²⁹

在趙紫陽的主持下，經濟體制改革可分爲幾方面：

一、推廣工業經濟責任制

在農村承包責任制受到普遍認同時，工礦企業與員工利益直接相關的責任制也突顯他的優點，不少單位開始模仿類似制度。³⁰由於經濟責任制提高經濟效益上有明顯的效果，1981年4月副總理姚依林提出工業企業可根據不同情況實行經濟責任制；³¹各種形式的經濟責任制迅速在工礦企業中展

²⁵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冊，頁535。

²⁶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冊，頁535。

²⁷ 趙蔚，《趙紫陽傳》，頁238。

²⁸ 《人民日報》，1982年12月14日。

²⁹ 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鑑（1985年）》（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5年），頁20。

³⁰ 早在華國鋒倡導的工業學大慶時，便設計了崗位責任制、質量責任制及班組經濟核算制等相似責任制度，但其立意在於下級對中央經濟計劃的絕對服從，並無刺激員工積極生產的作用。高皋，《後文革史》，中卷，頁142。

³¹ 《人民日報》，1981年4月26日。

開，到了 8 月底，縣以上國營企業實行經濟責任制的達到 65%，有的省市達到 80% 以上。³²1982 年 4 月，國務院將首都鋼鐵公司實行經濟責任制的成績匯整為〈首鋼實行經濟責任制的經驗〉，向全國推廣，宣傳企業內部注重經濟責任制的經驗。³³11 月，國務院批轉〈關於當前完善工業經濟責任制的幾個問題的報告〉，強調以「權、責、利」相結合的原則，使企業的管理制度能夠在經濟責任制之下，提高經濟效益。³⁴

工業經濟責任制的設計是減少企業的管制，讓主管有較大的專業空間，同時縮小指令性計劃的規模，擴大指導性指標，由市場調節市場供需，讓過去由國家掌控的原物料供應與統購統銷政策轉變為企業因應市場需求的自負盈虧，再以分紅與獎金制度提振工作意願；換言之，一切設計均以市場需求為主，企業主管與員工都需要一心追求盈餘。³⁵

二、復甦個體經濟

中共執政後，經過 1956 年對工商業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個體戶迅速減少，1976 年只有 19 萬人左右，1978 年減少為 15 萬人。³⁶但是占多數的國營企業並無法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看病難、吃飯難、修鞋難、修車難……，而且程式規模越大越難解決。³⁷隨著改革開放，各種經濟形式應運而生，個體經濟也跟著復甦。

1980 年 8 月，國務院批准〈關於允許個體開業行醫問題的請示報告〉，雖然其內容有諸多限制，但卻也正式允許醫生公開執業，使地下化的醫療

³² 趙德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67-1984）》，頁 582。

³³ 《人民日報》，1982 年 4 月 15 日。首都鋼鐵公司在萬里的主導下，1981 年 6 月率先引進經濟責任制。參閱劉吉主編，《中國共產黨七十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頁 790。

³⁴ 趙德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67-1984）》，頁 585。

³⁵ 陳一諮、嚴家其主編，《趙紫陽與中國改革》，頁 106。

³⁶ 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鑑（1984）》（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4 年），頁 137。

³⁷ 高舉，《後文革史》，中卷，頁 146-147。

行爲得以正常運作。³⁸。1981年7月，國務院發布〈關於城鎮非農業個體經濟若干政策規定〉，說明扶持個體經濟，對於市場發展有重大助益，並允許個體戶可帶五個以內的學徒；³⁹換言之，可以有聘僱行爲。到了1984年底，個體戶已經有339萬人左右。⁴⁰

個體戶增加，解決了就業機會不足的問題，同時也使民眾的工作權得到解放，對過去共產主義強調全能的國營企業造成衝擊。

三、發展經濟特區

1979年鄧小平同意建立經濟特區後，廣東、福建便著手籌建經濟特區。1980年8月五屆人大第十五次會議批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同意在廣東深圳、珠海、汕頭設立經濟特區。⁴¹

1980年12月，胡耀邦召集趙紫陽、萬里、姚依林、谷牧（1914-）、楊尚昆等召開「廣東、福建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座談會」，會議決定在廣東、福建吸引外資的特殊政策不會動搖。⁴²另一方面，陳雲則擔心經濟開放過快，抗拒市場經濟主導的經濟模式，甚至批評經濟特區與過去的租界若干現象相似；⁴³1983年「除汙」運動時，鄧力群（1915-）更公開指責「深圳除了一面紅旗之外，什麼都不是社會主義的，和香港差不了多少。」⁴⁴

1983年10月，趙紫陽考察廈門特區時指出：「辦特區主要的目的是劃

³⁸ 劉魯風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要事錄（1949-1989）》，頁575。

³⁹ 1981年4月，工商行政管理局長會議強調要管活市場，就要在政治上、政策上積極支持個體工商戶經營。《人民日報》，1981年4月4日。

⁴⁰ 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鑑（1985）》，頁235。

⁴¹ 同年12月批准廈門設立經濟特區。《人民日報》，1980年8月27日。

⁴² 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綜合組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大事記》，頁125。

⁴³ 陳一諮，《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頁63。

⁴⁴ 楊中美，《胡耀邦評傳》，頁211。

出一塊地盤，給予優惠待遇，引進一些技術密集，知識密集的企業作為世界先進生產技術、先進管理辦法的窗口。只要使真正比較先進的企業，我們可以讓出一定的市場，或給予更優惠的條件。」⁴⁵1984年1月鄧小平南巡，對特區建設印象深刻，更在廈門特區提詞：「把經濟特區辦得更快些更好些」。⁴⁶至此，經濟特區的建設模式才告一錘定音。

四、開放沿海地帶

1984年4月，鄧小平視察經濟特區後指示：「除現在的特區以外，可一考慮在開放幾個點，增加幾個港口城市，如大連、青島。這些地方不叫特區，但可以實行特區的某些政策。這樣做，肯定利多弊少。」⁴⁷

1984年6月，海南島的三亞開放外籍船隻進入，開啓海南島的對外貿易。⁴⁸7月，國務院進一步說明開放沿海14個城市的基本內容：一是擴大這些城市對外開展經濟活動的權力，二是對投資辦廠的外國人士、企業給予優惠；同時放寬外資投資內容的審查權限，支持現有企業的改造。⁴⁹十二屆三中全會後，趙紫陽在11月視察珠江與長江三角洲時指出：「沿海地區的開放意義極大，可以為全國提供改革的經驗，再帶動內地經濟建設上起舉足輕重的作用。」⁵⁰開放沿海地帶中國的經濟開放政策在1984年以後於沿海獲得成功，大連、秦皇島、天津、煙台、青島、連雲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等十四個沿海港口城市的開放，因此沿海各省跟著發展，造成全面開放的格局。⁵¹

⁴⁵ 《新華月報》，1983年11月，轉引自高舉，《後文革史》，中卷，頁156。

⁴⁶ 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增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26。

⁴⁷ 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增訂本，頁26。當時以陳雲、姚依林代表的保守派怕經濟特區恢復勞資僱用與剝削關係、西方文化入侵、投資產業不符國家規劃等理由反對。陳一諮，《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頁63。

⁴⁸ 劉魯風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要事錄（1949-1989）》，頁679。

⁴⁹ 《人民日報》，1984年7月13日。

⁵⁰ 《新華月報》，1984年12月，轉引自高舉，《後文革史-中國自由化潮流》，中卷，頁160。

⁵¹ 經濟特區初具規模，閩、粵兩省經濟蓬勃發展，外資與技術也競相進入大陸市場；這些成果

五、帶動城市改革

農村改革取得成效後，城市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1978年趙紫陽自南斯拉夫訪問回國後，在四川推動企業簡政放權，增加企業活力，帶動城市改革；藉著四川的成功經驗，推廣全國工商部門經濟責任制，進一步推動城市改革；而農村生產責任制解放了生產力，促使農村經濟商品化，逐步改變消費型態。改革開放，允許多元經濟形式，商品生產與鄉鎮企業迅速發展，其中又以江蘇、浙江發展最快；⁵²1985年胡啓立肯定當地的發展，稱之為「蘇南模式」，⁵³鄧小平其後也稱許為「異軍突起，這不是中央的功績，每年有百分之二十的增長，很突然冒出來的。」⁵⁴1982年12月，國務院發布〈關於成立上海經濟區和山西能源基地規劃辦公室的通知〉，計劃把高度發展的城市由點彼此連結為區塊發展，發揮更大經濟效益。⁵⁵1983年，國務院批准湖北省沙市、江蘇省常州市、四川省重慶市進行城市改革試點。

56

1982年11月，趙紫陽在人大五次會議上提出有步驟的企業稅制改革。

⁵⁷1983年4月，國務院頒布〈關於國營企業利改稅試行辦法〉，決定自1983年1月起實行稅制第一步改革，並自6月起開始徵稅。⁵⁸1984年4月，「全

引起各省地方政府爭取開放的壓力。陳一諮，《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頁82-85。

⁵² 1980年，常州市工業產值37億5千萬元，平均每人產值1萬元，機械、電子、紡織、化工、輕工業、醫藥、建材等行業都有長足發展；受到常州市的帶動，1983年，無錫縣、江陰市、張家港市、常熟市、武進縣也快速發展，被稱為「蘇南五虎」；而1983年鄉鎮工業已佔江蘇省8/1的稅收。費孝通，〈小城鎮，再探索〉，《新華月報》，1984年5月，轉引自高皋，《後文革史》，中卷，頁161-162。

⁵³ 許家屯，〈懷念鄧小平，關心趙紫陽〉，收於袁會章編，《趙紫陽最後的機會》，頁24。

⁵⁴ 鄧小平，〈改革的步子要加快〉，收於《鄧小平文選》，卷3，頁258。

⁵⁵ 劉魯風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要事錄（1949-1989）》，頁635。

⁵⁶ 1984年，又陸續開放武漢市、瀋陽市、大連市、南京市為改革試點。尹鳳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簡史》（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222。

⁵⁷ 全國人大常委辦公廳研究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文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105。

⁵⁸ 利改稅即把過去國營企業向國家上繳利潤改變成上繳稅收，第一步改革是稅利並存的稅收辦法。趙德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67-1984）》，頁667；陳一諮，《中國：十年改革與八

國第二步利改稅會議」召開，討論稅利並存過渡到「以稅代利」的問題。⁵⁹

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宣布改革城市經濟體制。⁶⁰1985年成立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在陳一諮（1940-）⁶¹的主持下完成包含全國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綜合報告〉，調查結果發現經濟改革進展比預期的還快，同時其運作已從服從計劃轉變為部份依靠市場機制。⁶²改革開放帶動經濟發展，改變城市規劃與設計，快速的進步也牽動各個經濟層面。

六、引導價格改革

在1979年到1984年價格改革以「調放結合，以調為主」，在調升農產品價格的同時，另外有限的開放小商品價格調節。⁶³農村推行「包產到戶」後，剩餘的農產品帶到自由市場買賣，其價格普遍比以往國家低價收購的價錢高，於是政府只好再補貼民眾，不利政府財政。⁶⁴

1984年7月，趙紫陽在討論城市總體改革的莫干山會議上，一方面肯定經濟改革的成果，一方面對改革產生的問題，傾向以「價格調整」健全市場經濟。⁶⁵會議上的觀點成為往後經濟改革的方向。10月，鄧小平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中支持〈經濟體制改革決定〉，改革開放的政策堅

九民運》，頁60。。

⁵⁹ 劉魯風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要事錄（1949-1989）》，頁679。

⁶⁰ 丁望，《六四前後》，上冊，頁5。

⁶¹ 陳一諮也是共青團成員，1978年時任組織部部長的胡耀邦調其回社科院農業經濟研究所。陳一諮，《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頁4-5。

⁶² 陳一諮，《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頁80。

⁶³ 徐元旦，〈關於建立現代市場價格體制的初步構想〉，《貴州社會科學月刊》，期3（1993年3月），頁6-10。

⁶⁴ 陳一諮，《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頁46。

⁶⁵ 當時大陸的計劃價格並不合理，排斥市場競爭的原則，但是完全開放價格又怕脆弱的經濟體制承受不住，因此會議上多數學者傾向以調整代替開放的觀點；其後參與學者多加入「國務院農村發展中心發展研究所」。陳一諮，《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頁64-68。

持不變。⁶⁶有了鄧小平的支持，趙紫陽開始針對數十年不動的市場價格進行改革，使物價波動符合市場機制。

價格改革初期市場價格紊亂，民眾預期心理造成搶購風潮，造成物資短缺；但是 1984 年農工業產值成長 14.2%，國民所得也成長 12%，樂觀的經濟形勢使得價格改革能夠持續。⁶⁷當時農副產品交易狀況比較符合市場機制，陳雲與姚依林建議進一步開放，減少補貼，避免財政負擔，從而帶動價格改革。⁶⁸1985 年農副產品價格開放波動後，與之相關的加工食品也提高售價，副食品與蔬菜比 1984 年上漲 27%，同時也給民眾補貼。⁶⁹

1984 年 10 月十二屆三中全會，會中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確定改革城市經濟必須搞活企業，改革價格體系，把社會主義經濟定位為「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中共針對經濟改革的繼續推動，決定「商品經濟」不可逾越的底線，但是商品與貨幣交換關係則是不可避免的方針；也就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又稱為「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⁷⁰趙紫陽認為：「就實際工作而言，沒有差別（按：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用『商品經濟』的提法，是為了減少震動，使更多的人容易接受。」⁷¹有了鄧小平在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支持，趙紫陽開始全面的經濟改革，但是改革的方案並沒有迅速的制定，因此改革基本上是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情況下進行。在趙紫陽的主導下，商業方面逐步取消對企業原料供應與產品銷售的保證，同時放寬或取消對產量與產品種類的限制，逐步由市場機能決定供需，並由廠長、經理

⁶⁶ 《人民日報》，1984 年 10 月 24 日。

⁶⁷ 《人民日報》，1985 年 3 月 10 日。

⁶⁸ 陳一諮，《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頁 72。

⁶⁹ 以北京為例，一般市民每月補貼 7.5 元，回民 9 元，大學生 9 元。國家統計局編，《奮進的四十年》（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9 年），頁 406。

⁷⁰ 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綜合組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大事記》，頁 393。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就是市場經濟。參閱陳一諮，《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頁 69-70。

⁷¹ 鮑彤，〈咫尺天涯念紫陽-兼為「六四」十五週年作〉，收於陳一諮、嚴家祺主編，《趙紫陽與中國改革-紀念趙紫陽》，頁 62。

負盈虧責任；商品價格由行政命令規定改由市場供需決定；企業籌資不再由國家負責，而轉為向銀行等市場籌資管道籌措，並減少企業盈餘上繳中央的比例；廢除國家對企業員工工資的規定，依生產效率調整工資等。⁷²

在經濟改革方面，趙紫陽的主要貢獻是在價值觀念上終結了毛式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力主「放權讓利、企業鬆綁和精簡機構」。在經濟改革的具體操作上，1979年的「擴大自主權」、1982年「減稅讓利」、1984年「利改稅」、1986年「企業承包」和1988年「股份制試驗」，歷經二十多年經濟改革的考驗，今天已經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的主導模式，為中國改革奠定了市場化與私有化的方向。⁷³

在鄧小平的支持下，趙紫陽大力促進改革。趙紫陽擔任總理期間，除了領導經濟體制、計劃體制、科技體制、商業體制、外貿體制、稅收體制等改革配套措施外，也勤於巡訪各地，指導改革試點，推廣經濟責任制、廠長責任制、廠長任期制。⁷⁴

第二節 經濟改革困境

經濟改革的嘗試，雖然改善人民的生活，只是「摸著石頭過河」，卻也帶來新的問題，可是中共苦於無經濟典範可以學習，對於政治上的限制總是無法突破，對各種問題的解決總是只能治標。鄧小平提出「四個堅持」，讓鄧有很大的解釋空間，可以因時制宜，實事求是，只有對堅持共產黨的領導這一項不讓步。⁷⁵對經濟改革所形成的困境，在民怨累積至中共內部壓力過大時，鄧小平便大玩兩手策略，一方面開放「反自由化」的言論空間，批評經濟改革的缺失；另一方

⁷² 李英明，《向鄧後時代轉折》，頁 102-103。

⁷³ 劉曉波，〈趙紫陽對中國改革的貢獻〉，收於陳一諮、嚴家其主編《趙紫陽與中國改革》，頁 250-271。

⁷⁴ 高舉，《後文革史》，中卷，頁 178。

⁷⁵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下冊，頁 893-894。

面又要趙紫陽等人推出經濟改革的相應對策，重申改革開放方向不改變。儘管經濟政策推動時鬆時緊，但諸如農業改革的高成長不再、物價飛漲、官商勾結、地域與社會結構的貧富不均等問題卻越來越嚴重。以下列述在趙紫陽主持全國經濟期間，經濟改革面臨幾項困境：

一、政策出現瓶頸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召開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座談會，討論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問題。會中決議只在部分邊遠山區與貧困落後地區施行包產到戶，突顯生產責任制的侷限性。⁷⁶實行包產到戶後，農民積極生產，其收入已15%速度成長，但是1985年以後，成長速度開始減緩，土地零細化不利機械操作，單位生產量無法再提升，加上產業無法升級，1989年以後農民收入甚至負成長，而包產到戶政策也無法再吸收農村剩餘勞力，經濟效益遞減。⁷⁷

農村剩餘勞力轉移到工業上，政府順勢鼓勵鄉鎮企業，但是鄉鎮企業所需要的原料與市場都被政府嚴格管控，而政府的經濟計劃只納入國營企業，結果大量的鄉鎮企業面臨原料買不到，產品賣不出的窘境；而當時的制度並沒有要求企業自負盈虧，因此企業體多半盡量貸款，盲目投資。⁷⁸

二、通貨膨脹劇烈

1979年開始，中共大幅度提高部份農產品收購價格，牽動銷售價格，民生基本消費相對提高，同時補助職工價格補貼8元，但是根本無法應付物

⁷⁶ 吉林省中共黨史學會編，《新中國紀事（1949-1984）》，頁705-706。

⁷⁷ 1984年至1988年，包產到戶政策每年平均吸收農村1200萬剩餘人口，1989年開始，每年只能吸收200萬人左右。董瑞麒，〈大陸農村股份合作企業的發展趨勢〉，《中國大陸研究》，卷37期5（1994年），頁33。

⁷⁸ 鄉鎮企業位了生存只好找門路買原料，拉關係賣產品，甚至出現國企私下高價賣原料給鄉鎮企業，並讓鄉鎮企業做初級加工，換取利潤。陳一諮，《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頁47、87。

價上漲的幅度，沒有受薪者的家庭壓力更大。⁷⁹

80 年代的城市改革雖有成績，但是改革缺乏統一規劃，各部門自行其事，宏觀管理趕不上區域變化，盲目生產、重複建設陸續發生，價格與工資制度出現不符經濟規律的現象。⁸⁰

1984 年十二屆三中全會以後，趙紫陽聲明價格調整將循序漸進，同年年底，中共創立「計劃指導下的商品經濟」的政策，決定允許市場價格在城市經濟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但是實際上，趙紫陽顯然低估民眾對通貨膨脹的預期心理，一方面商業部門自行提高高價位商品的售價，另一方面民眾到銀行擠兌存款，搶購商品狀況幾乎失控。⁸¹這一變革將逐步提高城市購買力和人民生活水準，但它的短期效應並不令人滿意，通貨膨脹迅速蔓延，政府官員紛紛吃差價，以市場和國家價格之差牟利，導致官倒肆虐，商家根據市場承受力標價，造成價格飛漲。1985 年 3 月，國務院甚至發佈〈關於加強物價管理和監督檢查的通知〉，要求基層單位派出物價檢查員查訪物價，卻仍舊無法遏制因物資短缺造成的物價上揚。⁸²1985 年，國家城市居民消費支出成長 12%，1981 年時上升不到 3%，這對於 30 年來價格幾乎沒有浮動的國家來說，無疑是個巨大的震動。曾經控制過通貨膨脹的一些高級領導憂心忡忡，陳雲警告說，改革必須緩慢，價格需要控制，才能確保社會穩定。

價格改革應與工資改革同步進行才能減少衝擊。缺乏統籌規劃下，財政無法負荷工資應有的調整幅度；1985 年，基本工資調高 18%，物價卻揚升

⁷⁹ 當時農副產品價格平均提高 24.8%。劉魯風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要事錄（1949-1989）》，頁 537、546。

⁸⁰ 宋平，〈當前國民經濟中的幾個問題〉，《理論月刊》，期 3（1984 年 3 月），轉引自高舉，《後文革史》，中卷，頁 166。

⁸¹ 許行，《新改革引發新論調，中國經濟改革的探索》（香港：開拓出版社，1985 年），頁 193；《人民日報》，1984 年 12 月 24 日。

⁸² 劉魯風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要事錄（1949-1989）》，頁 699。

27%。⁸³1985年6月，國務院批轉物價局〈關於價格改革出台情況及穩定物價措施的報告〉反映了當時價格改革的狀況：「有的價格改革準備不足，影響較大；有的地方趁機亂漲價的歪風沒有刹住，部份城市蔬菜價格高，若干大城市零售物價指數上升幅度大；部分地區國營食品、蔬菜公司的工作不適應，調劑供求，平抑價格的主渠道作用，還沒有很好地發揮出來。……要嚴格管理控制工業消費品價格，要把已放開的農產品中的大宗副食品的價格變動控制在一定幅度之內。」⁸⁴

1986年4月，國務院發布〈關於進一步做好城市蔬菜產銷工作的報告〉，督促國營蔬菜公司做好平抑蔬菜價格的角色；⁸⁵但是蔬菜品質不一，品質好時多半供貨不足，在自由市場購買則貴一半以上，如此表現在副食品的需求上，自然引得怨聲載道。⁸⁶

三、權貴違法濫權

由於不少官員與機關經商，利用職權倒買倒賣，謀取暴利。1982年11月人大五次會議時，趙紫陽針對權貴違法的情形表示已經在查緝，但尚未發現；這樣脫離社會現實的報告引來趙紫陽遷就事實保護高幹濫用權力的批評。⁸⁷雖然趙紫陽作風務實，願意處理權貴腐敗情形，但出任總理時卻也不能大刀闊斧的進行；同時也可看出趙紫陽對不同意見採取較寬容的態度。

1984年12月，國務院發布〈關於嚴禁黨政機關和黨政幹部經商、辦企業的決定〉，要求清理黨政機關、黨政幹部經商、辦企業、辦公司的混亂情

⁸³ 國家統計局編，《奮進的四十年》，頁706。

⁸⁴ 劉魯風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要事錄（1949-1989）》，頁706。

⁸⁵ 劉魯風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要事錄（1949-1989）》，頁730。

⁸⁶ 當時民眾物質生活比起60年代已經明顯改善，但是對商品不足與通貨膨脹頗多不滿，這個現象被比喻為「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罵娘」。高舉，《後文革史》，中卷，頁294-295。

⁸⁷ 羅冰，〈趙紫陽報告受批評〉，《爭鳴》，期1，頁12-15。

形。⁸⁸

1985年11月，國務院發出通知，要求各級單位清除腐敗現象，諸如購買或更換進口轎車、濫派人員出國、揮霍公款、鋪張浪費、請客送禮、獲取不當收入、幹部親屬違規經商牟利等。⁸⁹由於對各種腐敗現象的查緝沒有明確的法律界定，終究效果不大。事實上，1985年時有學生擬定一份濫用特權的「太子黨」（按：高幹子弟）名單，要求政府公佈，這份名單中有列舉趙紫陽兒子趙大軍在深圳經商的情形，陳雲也因此寫信給胡耀邦與趙紫陽，雖然趙紫陽移交紀律委員會處理，但是趙大軍並沒有受到處分；不過這件事成爲日後趙紫陽屢被攻訐的污點。⁹⁰

1986年1月，中央書記處召開8000多人參加的中央機關幹部大會，會中胡耀邦針對整頓腐敗情況發表演講，指出：「一切忠誠正直的黨內外同志，對於我們黨的任何一級組織直至中央負責人的嚴重瀆職行為和違法亂紀行為，有權如實地向中央報告。」會中成立中央機端正黨風領導小組，由喬石（1924-）任組長。⁹¹隨後國務院便發布〈關於制止濫派團組和出國的通知〉⁹²、〈關於簡化各級領導幹部外出活動的接待活動的若干規定〉⁹³、〈關於嚴格按黨的原則選拔任用幹部的通知〉⁹⁴、〈關於制止幹部用公款旅遊的通知〉⁹⁵、〈關於進一步制止黨政機關和黨政幹部經商辦企業的規定〉⁹⁶等各項規定。2月，全國政法工作會議再次強調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活動和經濟犯罪活

⁸⁸ 劉魯風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要事錄（1949-1989）》，頁726。

⁸⁹ 《人民日報》，1985年12月31日。

⁹⁰ 羅冰，〈陳雲抓住胡趙痛腳〉，《爭鳴》，期1（1986年1月），頁6-8。

⁹¹ 《人民日報》，1986年1月11日。

⁹² 《人民日報》，1986年1月29日。

⁹³ 《人民日報》，1986年1月31日。

⁹⁴ 這項通知特別提到幹部子女的提拔問題。《人民日報》，1986年2月2日。

⁹⁵ 《人民日報》，1986年2月4日。

⁹⁶ 其內容包含黨政機關一律不准經商辦企業等十條規定。《人民日報》，1986年2月6日。

動。⁹⁷

即使國務院一再發文制止機關幹部違法濫權，但是從政府部門、機關學校到街道辦事處，仍以各種藉口向企業索取資助，否則企業運作便受到刁難；不斷升高的投資費用，使得外商資金卻步。⁹⁸

爲了改善投資環境，1986年10月，國務院發布〈關於鼓勵外商投資的規定〉⁹⁹，各省市也陸續制訂鼓勵外商投資的條例，並積極洽談投資合作；但是中共的決策機制與運作仍無法受到外商的普遍認同，到了1986年底，外商投資金額爲22億4千萬美元，成長率比1985年還少。¹⁰⁰

四、經濟犯罪嚴重

1980年，爲了因應開放以來經濟犯罪日益嚴重，除了立法規範外，也開始在法院設置經濟審判庭。¹⁰¹但是在1981年9月，國務院在批轉經濟法規研究中心〈關於加強經濟立法工作的幾點建議〉時，提出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制定經濟法規，建立各經濟部門法律機構。¹⁰²於是在制定法律的時候，仍然需要考慮政治的需要；換言之，當制定法律與意識型態相衝突時，那些法律不免產生無法釐清的問題。

商品的短缺，劣質商品、冒牌商品應運而生，其中尤以偽藥最爲氾濫。

70年代末期，偽藥已經充斥市場，因此，1981年5月，國務院發布〈關於

⁹⁷ 劉魯風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要事錄（1949-1989）》，頁406。

⁹⁸ 高舉，《後文革史》，中卷，頁288-289。

⁹⁹ 劉魯風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要事錄（1949-1989）》，頁744。

¹⁰⁰ 1986年外商投資額只比1985年多3億美元。國家統計局編，《奮進的四十年》，頁420。

¹⁰¹ 至1980年底，經濟審判庭在高級人民法院設立28個，中級人民法院設立277個（佔中級人民法院89%），基層人民法院設立697個（佔基層人民法院27%）。高舉，《後文革史》，中卷，頁61。

¹⁰² 《人民日報》，1981年3月27日。

加強醫藥管理的決定〉，取締亂辦藥廠、濫製藥品，販售與製造假藥等。¹⁰³

改革開放後，包產到戶的推廣與集鎮市場的恢復，促進商品的有限流通，但是對於當時經濟立法的缺乏與落後的市場管理，僵硬的國家經濟計劃體制，產生諸多異常狀況；有鑑於此，國務院於 1981 年 1 月發出〈關於加強市場管理，打擊投機倒把和走私的指示〉，說明「凡是破壞國家收購計劃、買空賣空、以假充真、代出證明和提供銀行帳戶、支票從中牟取非法收入等行為，均屬於投機倒把活動」。¹⁰⁴ 1981 年 7 月國務院又發出〈關於制止商品流通中不正之風的通知〉，「禁止採購、銷售人員請客、送禮、提取回扣」。¹⁰⁵ 1982 年 1 月，國務院發出〈緊急通知〉，指出「一些幹部，甚至一些負責幹部不同程度走私販私，貪污受賄，把大量國家財產竊為己有的違法犯罪行為，嚴重毀壞著黨的威信，是關係我黨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全黨一定要抓住不放，雷厲風行地加以解決。有的特大案件的處理結果要登報。」¹⁰⁶ 4 月，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討論〈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打擊經濟領域中嚴重犯罪活動的決定〉時提出：「我們自從實行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經濟兩方面政策以來，不過一、兩年時間，就有相當多的幹部被腐蝕了。捲進經濟犯罪活動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四月五月每個省裡要抓幾個大案，要從快從嚴從重懲處竊盜國家財產，貪污受賄的罪犯。我們的政策是兩手，一手堅持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經濟，一手堅決打擊經濟犯罪活動。」¹⁰⁷ 隨後國務院便發出〈關於打擊經濟領域中嚴重犯罪活動的決定〉，要求各省、市、自

¹⁰³ 另外尚有以工業酒精充當茅臺酒、以化肥製作蛋糕、流通病死豬肉等事件層出不窮。劉魯風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要事錄（1949-1989）》，頁 595。

¹⁰⁴ 劉魯風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要事錄（1949-1989）》，頁 586。

¹⁰⁵ 80 年代初期，大陸的經濟水平低，月薪多未達百元，但是商品流通過程中，負責人、審批人、經辦人、中間人、業務員、採購員、推銷員都有機會以各種名目獲得額外收入，其所得甚至高達萬元。劉魯風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要事錄（1949-1989）》，頁 598。

¹⁰⁶ 劉魯風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要事錄（1949-1989）》，頁 611。1982 年 1 月陳雲批評廣東走私猖獗，主張嚴辦並登報，中共中央隨即發出〈緊急通知〉。參閱陳雲，〈執政黨的黨風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陳雲文選（1956-1985）》，頁 245-247。

¹⁰⁷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1975-1982）》，頁 357-359。

治區黨委和政府要抓緊處理一批大案，同時每個月都要向國務院報告工作進度。¹⁰⁸

五、區域發展失衡

經濟特區、沿海地區、海南行政區等政策開放地區在 80 年代快速發展，包產到戶也為農村帶來經濟效益，但仍有一些條件較差的地區經濟落後；而這個經濟上的差距，演變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國務院為此特別成立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試圖拉近區域間經濟發展失衡的現象。¹⁰⁹

六、開放急進失控

1983 年 10 月，國務院發布〈中央擴大海南對外經濟貿易自主權八項規定〉，給予海南行政區比經濟特區更特殊的政策，讓海南可以使用地方留成外匯，進口海南市場短缺的商品，包括中央管制的汽車、摩托車、家電等十七種商品，同時允許海南自行出口，外匯得以自用；不久，內地廠商即利用海南的進口特權，自海南大量進口管制商品，在高價傾銷內地，致使內地外匯流失。¹¹⁰這樣的方式很快被其他地區模仿。

1984 年由於通貨膨脹嚴重，中央不得不动外匯儲備進口，促使人民銀行多發行的 80 億人民幣回流；到了 1985 年，外匯存底已下降到警戒線以下。

111

改革開放急躁的結果，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過大、失當，社會購買力超過供給，進口增加過速卻又助長物價上漲。各種矛盾使得剛剛起步的新舊經濟體制轉型顯

¹⁰⁸ 《人民日報》，1982 年 4 月 14 日。

¹⁰⁹ 劉魯風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要事錄（1949-1989）》，頁 731。

¹¹⁰ 高舉，《後文革史》，中卷，頁 200。

¹¹¹ 齊辛，〈從進口狂潮到緊急剎車〉，《九十年代》，期 6，頁 47-51。

得困難重重，表現在 1986 年初的經濟數據，則是工業成長下降 2%。¹¹²1986 年 1 月，趙紫陽在全國經濟工作會議與全國計劃會議說明 1986 年的改革方針是「鞏固、消化、補充、改善」，重點在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促進部門之間與區域之間的經濟連結。¹¹³換言之，1986 年，中共體認到改革的問題亟需解決，因此採取放慢改革進度的方式適應。

第三節 1986 年的學潮

1978 年底，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形象促使北京出現名為「北京之春」的大字報，1979 年已有學生參與批評時政。¹¹⁴鄧小平當時便堅決肅清「在黨內新出現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¹¹⁵對於學生的思想教育應該「又紅又專，那個紅是絕對不能丟的。」¹¹⁶1981 年 3 月 27 日，鄧小平利用與解放軍總政治部領導人談話時，提出不僅要糾「左」，也要糾「右」，「對電影文學劇本《苦戀》要批判，這是有關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¹¹⁷6 月，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一切偏離四項基本原則的言論和行動都是錯誤的，一切否定和破壞四項基本原則的言論和行動都是不能容許的。」¹¹⁸顯示出鄧小平對於改革開放後，隨之而來的反省批評在黨內出現反彈時，便以「資產階級自由化」，違反四個堅持為由加以打壓，卻又不願停下經濟的改革開放。

¹¹² 陳一諮，《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頁 86。1986 年工農業產值成長 9.5%，國民所得成長 8%，都低於 1985 年的水準。參閱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鑑（1987）》（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7 年），頁 39，46，53。

¹¹³ 劉魯風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要事錄（1949-1989）》，頁 728。

¹¹⁴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下冊，頁 916-918。

¹¹⁵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1975-1982）》，頁 236。

¹¹⁶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1975-1982）》，頁 254。此時大陸作家已開始質疑「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模糊涵義，對中共的搖擺的政策提出不滿。胡永年，〈不見報導的一次文藝座談會-記黃山筆會〉，《七十年代》，期 1（1981 年 1 月），頁 98-105。

¹¹⁷ 《苦戀》是由白樺（1930-）創作的電影文學劇本，被批評為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資產階級自由化以致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錯誤思潮。鄧小平，《鄧小平文選（1975-1982）》，頁 337。

¹¹⁸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紅旗》，期 13（1981 年 7 月），頁 24。

1984年11月，胡耀邦在中共中央黨校演講時鼓吹開放言路：「有些人不讓講真話，也是弄虛作假，搞表面文章，形式主義，騙我們上當。」¹¹⁹1985年3月，中共中央發佈〈中共中央關於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聲明「反對濫用行政手段干預學術自由。……要真正做到尊重科學技術人才，就必須保障學術上的自由探索、自由討論，使人們無所畏懼地去追求真理。」¹²⁰7月，立場保守的中宣部長鄧力群下台，改由胡耀邦推薦的朱厚澤（1931-）接替。¹²¹

1984年以後，物價上漲影響學生伙食，貪污腐化時有所聞，過去被打壓的學生運動因此擴大，但尚未引起社會迴響；1985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1918-）參拜靖國神社，反日情緒導致學運擴大，但中共本來就不排斥反日輿情，加上當時的大字報與遊行示威只是發洩反日情緒，其焦點並沒有轉移到經濟民生的問題上，情況並無惡化。¹²²

1986年4月，胡耀邦在「端正黨風工作座談會」上談到毛澤東晚年無法接受不同意見，違者便指為「反黨」、「走資本主義道路」；要記取教訓，「允許黨員在黨的會議上自由發表意見和批評任何人，即使錯了也受保護。」¹²³4月，胡啓立在上海召集文藝界、社會科學界、自然科學界人士開會，要創造寬鬆、合諧的氣氛。¹²⁴7月31日，副總理萬里在軟體科學研究工作座談會演講時，也提到「尊重人們充分發表意見的民主權利，不要害怕別人講不同意見的話，甚至講反

¹¹⁹ 胡耀邦，〈進一步端正幹部作風〉，《理論月刊》，期1（1985年1月），頁2。

¹²⁰ 〈中共中央關於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人民日報》，1985年3月20日，轉引自丁望，《六四前後》，上冊，頁103-104。

¹²¹ 朱厚澤當時是貴州省委第一書記，1964年「四清運動」時被下放勞改8年，曾在中共宣傳部門工作。李中洛編，《中國黨政人物志》，集2（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9年），頁189。

¹²² 羅冰，〈震撼中南海的學潮〉，《爭鳴》，期1（1985年11月），頁6-10。

¹²³ 胡耀邦，〈正確處理黨內兩種不同矛盾〉，《人民日報》，1986年7月1日，轉引自丁望，《六四前後》，下冊，附錄1。

¹²⁴ 曾慧燕，《中國大陸學潮實錄》（香港：新報出版部，1989年），頁146-147。

對自己的話。」¹²⁵7月，朱厚澤在全國文化廳長座談會上，提出對不同觀念採取寬鬆、寬容、寬厚的態度，「三個『寬』」，提出一個問題，就是對於跟我們原來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觀點，是不是可以採取寬容一點的態度；對待有不同意見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寬厚一點；整個空氣、環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寬鬆，有彈性一點。」¹²⁶中宣部長朱厚澤的寬容態度立刻受到知識分子的歡迎。9月，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指出：「堅定不移地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堅定不移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有力地抵制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腐朽思想，防止種種迷失方向的危險。」並將「資產階級自由化」界定為「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主張資本主義制度。」¹²⁷

1986年5年一度的基層人民代表選舉，11月，中國科技大學選區的選舉領導小組公佈了一份未經選民提名的候選人名單，學生認為這種違反選舉法的提名程序並不民主。¹²⁸11月30日，萬里在合肥邀請十二所大學的有關人員召開「民主辦學」討論會，討論民主管理機制的運作；¹²⁹中國科技大學學生認為黨委包辦直選不民主，不滿情緒不久透過大字報表現出來。¹³⁰12月4日，中國科技大學選舉委員會在立禮堂主持選舉大會，自薦候選人與校方推薦候選人各自發表演說，氣氛熱烈；當下安徽大學副校長方勵之（1936-）發表演講，肯定自由競選市民主義式的提升，並指出民主不是從上而下給予的，而是大家爭取的。¹³¹12月5日，學生臨時起意上街遊行，校方獲知消息勸導學生珍惜當下，方勵之也前

¹²⁵ 萬里，〈決策民主化與科學化是政治改革的依個重要課題〉，《人民日報》，1986年8月15日，版1、2。

¹²⁶ 朱厚澤，〈關於思想文化問題的幾點考慮〉，《中國文化報》，1986年7月23日，版1、2。

¹²⁷ 〈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收於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卷，頁1173。

¹²⁸ 當時媒體多次報導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方勵之、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等主導的民主辦學經驗與理想，引起大學生的迴響。高皋，《後文革》，中卷，頁307。

¹²⁹ 《中國青年報》，1986年12月4日。

¹³⁰ 大字報的內容有的呼籲市長、區長直選，有的毛遂自薦參加選舉。高皋，《後文革史》，中卷，頁307-308。

¹³¹ 曙光圖書公司編，《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言論摘編》（香港：曙光圖書公司，1988年），頁72。

去勸阻，但是不能壓抑學生激動的情緒；下午毫無組織的出發，沿街高喊要求民主的口號，遊行到合肥市府廣場時，已經加入安徽大學與合肥大學的隊伍，雖然聲勢浩大，但在市府並無人接見下遊行隊伍自行潰散。12月5日的遊行結果引起大學生透過大字報反思，不久便開始成立社團，募款、演講、購買擴音器、印發傳單；12月9日，合肥市3000多名學生再度遊行，並讓選舉提名過程更改由中國科技大學學生提名四人，其結果則是方勵之最高票當選合肥市西區人民代表。¹³²

1986年12月18日，上海交通大學與同濟大學以尊重人權與新聞自由聯合組織遊行，但是上海市長江澤民在遊行前與交通大學學生對話，避免遊行擴大；12月19日，學生遊行陣容擴大，雖然江澤民與學生代表對話，但是並無法使遊行學生解散，最後一方面頒佈〈工安六條〉，決定強制驅離學生，另一方面江澤民也利用媒體宣傳遊行引起的不安，最後終於有效壓抑學生示威活動¹³³。

1986年12月30日，鄧小平召見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啓立、李鵬和何東昌（1923-），認為胡耀邦沒有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加上自由化知識分子方勵之、王若望（1918-2001）等的鼓吹，才使學潮擴大；¹³⁴鄧小平認為「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當然，使用時要慎重，抓人要盡量少。但如果有人要製造流血事件，你有什麼辦法？我們的辦法是首先揭露她們的陰謀，盡量避免流血，寧可我們自己人被打傷。但是對為首鬧事觸犯刑律的要依法處理。不下這個決心是制止不了這場事件的。如果不採

¹³² 高皋，《後文革史》，中卷，頁309-311。

¹³³ 江澤民利用媒體渲染學生打傷31名警察，並毆打同濟大學校長，使輿論偏向上海市委；〈工安六條〉主要便是針對學生遊行的管理，12月26日再頒佈〈關於集會、遊行管理暫行辦法〉。高皋，《後文革史》，中卷，頁331-337。

¹³⁴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1919.5-1987.1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413。1986年12月27日，彭真、王震、薄一波、胡喬木、鄧力群等拜訪鄧小平，把學潮歸罪自由化知識分子煽動與胡耀邦的姑息。參閱寒山碧，《鄧小平評傳（1979-1988）》（香港：東西文化事業公司，1989年），頁173。

取措施，我們後退了，以後麻煩會更多。」¹³⁵胡耀邦因此自我批評。

北京市爲了防止出現大規模學生示威遊行，1986年12月26日，頒布〈北京市關於遊行示威的暫行規定〉，要求示威者在遊行前5日提出申請，獲准後始可進行，並必須避開重要機關周圍。¹³⁶12月27日、28日，北京大專校園出現大量大字報，29日《北京日報》社論〈大字報不受法律保護〉，立刻引起大學生反彈。1987年元旦天安門湧進上千名大學生打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支持小平、要求民主」、「新聞自由」、「遊行自由」、「去消十條」等標語，短暫遊行後被警察驅離，數十名學生被捕，遊行隊伍潰散；到了晚間消息傳開，數千名大學生再度集結天安門遊行，要求釋放被捕學生，直至北京大學校長告知學生被捕學生獲釋才解散。¹³⁷

1986年12月發生在合肥、上海的學生示威活動開始時主要訴求都是爭取民主與尊重人權，隨著時間拉長，對社會通貨膨脹等改革弊病立刻發洩，同時也得到社會民眾的共鳴，造成學運的擴散。12月14日，深圳大學抗議學校制定新的收費制度，要學習成就不佳的學生增加學費；12月17日，昆明市2000多名學生遊行示威，要求民主自由；12月22日，廣州中山大學學生再市府前請願，聲援合肥學生；12月24日，天津的學生示威聲援其他城市的學生；12月27日，蘇州市的大學生也以示威遊行要求民主；太原、大同、哈爾濱、濟南、南京、北京也傳出學生示威的消息。但是示威遊行擴大之後，或有不法份子趁機滋事，發生推翻汽車、阻斷交通的現象，如此便讓行政部門抓到把柄，利用媒體宣傳，同時仿效上海頒布〈關於遊行管理方法的十條〉加強管制，各地學潮終究漸漸平息。

¹³⁵ 鄧小平，〈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增訂本，頁149-153。

¹³⁶ 1986年12月23日，北京大學生曾經遊行示威聲援上海學生。《人民日報》，1986年12月27日。

¹³⁷ 《光明日報》，1987年1月3日。

¹³⁸但是學潮已經打擊中共政權與總書記胡耀邦的威信，1987年元旦北京的學生示威，顯然會降低鄧小平對胡耀邦的信心。

第四節 繼承人的問題

毛澤東死後，華國鋒與四人幫都沒有辦法填補權力真空，反而讓鄧小平、陳雲等與毛澤東同輩的老人掌握權力，這也使得鄧小平必須馬上面對接班人的問題，並以此為由撤換幹部。¹³⁹除了鄧小平地位無法撼動外，趙紫陽當上總理後，雖然胡耀邦和他同樣鼓吹改革開放，但胡確也是他政治生涯的競爭對手。

1978年5月，胡耀邦利用華國鋒到北韓訪問的機會，在中共宣傳媒體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打擊華國鋒「兩個凡是」的主張。¹⁴⁰1980年11月，中央政治局召開九次會議，討論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以來的的主要錯誤，會中華國鋒被迫提出在十一屆六中全會辭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軍委主席和其他黨內職務；選舉胡耀邦為中共中央主席，鄧小平為中央軍委主席。¹⁴¹在六中全會之前，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工作，鄧小平主持中央軍委工作。

基於幹部「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的主張，鄧小平廢除黨主席的職務後，讓胡耀邦繼續擔任總書記，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為了要廢除幹部終身制，建立退休制度，鄧小平在黨中央成立中央顧問委員會，以維持全部特權為條件，並讓元老擁有列席黨重要會議與否決黨重要決定的權利，鼓勵退休。¹⁴²隨著幹部的更替，即使胡耀邦力求各方滿意，但是胡擔任第一書記時的共青團成

¹³⁸ 高舉，《後文革史》，中卷，頁 338-341。

¹³⁹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1975-1982）》，頁 177。

¹⁴⁰ 吳江，《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香港：鏡報有限公司，1995年），頁 34-42。

¹⁴¹ 吉林省中共黨史學會編，《新中國紀事（1949-1984）》，頁 709-710。

¹⁴² 趙生暉，《中國共產黨組織史綱要》（蕪湖：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 455，458-459；鄧小平，《鄧小平文選》，卷 3，頁 6。

員大量脫穎而出卻是不爭的事實，自然受人批評。¹⁴³

1982年9月十二大一中全會由胡耀邦與趙紫陽共同主持，會中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陳雲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擔任總理的趙紫陽至此被認為是胡耀邦外，鄧小平的第二名「接班人」。十二大以後，中共中央分工，總書記胡耀邦主持政治事務，總理趙紫陽主持經濟工作。¹⁴⁴但是趙紫陽的影響力不久便擴展至科學技術領域，在10月參加全國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強調振興經濟與科學技術進步的關係，接著國務院在12月發出〈關於成立國務院科技領導小組的通知〉，並由趙紫陽兼任組長。¹⁴⁵

趙紫陽從1980年至1986年就任總理期間，除了主持全國經濟工作外，也積極視察中國各地，同時頻繁的出訪世界各國。¹⁴⁶鄧小平在中國經濟改革取得成就的同時，政治上仍然很保守，因此在經濟改革開放與政治立場保守相衝突時，常常遊走兩派之間，有時支持保守的元老，有時支持胡耀邦。¹⁴⁷做為鄧小平的接班人，胡耀邦極力突顯鄧小平的威望。1983年7月，《鄧小平文選》出版，發行當日各大報都發表社論；組織民眾購書的情景可與文化大革命時發行《毛澤東選集》相比，一天便銷售200多萬冊；各單位職工都贈閱《鄧小平文選》一冊；同時7月召開的全國宣傳會議決定學習與宣傳《鄧小平文選》是往後宣傳工作重點，並且發出〈通知〉，要求全國人民認真學習，胡耀邦也親自演講表示重視。¹⁴⁸

¹⁴³ 許承宗，《胡耀邦評傳》（台北：著者自行出版，1986年），頁4；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下冊，頁943。

¹⁴⁴ 鮑彤，〈咫尺天涯念紫陽-兼寫「六四」十五週年作〉，收於陳一諮、嚴家祺主編，《趙紫陽與中國改革-紀念趙紫陽》，頁63。

¹⁴⁵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卷，頁115；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綜合組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大事記》，頁259。胡耀邦坦率直言的作風，是鄧小平不再支持胡耀邦的原因之一。高舉，《後文革史》，下冊，頁13。

¹⁴⁶ 趙蔚，《趙紫陽傳》，頁240-243。

¹⁴⁷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下冊，頁942。

¹⁴⁸ 高舉，《後文革史》，中卷，頁173-174。

1986年6月，胡耀邦出訪歐洲，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自己的年齡也不小了，七十了，趙紫陽也六十六了，我與趙紫陽看法相同，從明年開始，要少出主意，過幾年以後，也要慢慢退下來。」¹⁴⁹1979年7月鄧小平就提出建立退休制度的問題，¹⁵⁰胡耀邦這番話立刻被認為中共高層將出現人事變動，讓人有「逼宮」的想像。當胡耀邦回國時，趙紫陽立刻在接機現場向記者否認有關人事變動的傳言。¹⁵¹

儘管胡耀邦在建立幹部離休制度上有鄧小平的支持，但仍然受到陳雲、薄一波、宋任窮等元老的壓力，加上趙紫陽這位後起之秀的競爭，1986年學生運動使得鄧小平不再支持胡耀邦；¹⁵²在鄧小平提出「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名義壓抑學潮後，北京在元旦的學生示威使得胡耀邦的處境更不利。在這個時候，因為胡耀邦經常插手經濟改革事務，趙紫陽並沒有成為胡耀邦強有力的盟友，即使沒有落井下石，但也沒有站在改革派的立場支持胡耀邦，於是，在中央政治局及元老中，胡耀邦立刻孤立無援。¹⁵³

1987年1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批評「一些同志表現軟弱，不敢理直氣壯地起來鬥爭。……這種情況不能再下去了。」¹⁵⁴1月2日，胡耀邦提出辭職，並說：「一些壞傢伙居然把我當作他們的保護傘，蠱惑人心，毒害青年，製造動

¹⁴⁹ 許行，〈胡耀邦訪歐時透露內情〉，《鄧小平開放時代》，再版（香港：開拓出版社，1988年），頁103。

¹⁵⁰ 當時鄧小平希望建立退休制度，讓黨政人士能夠更新。鄧小平，〈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的實現要靠組織路線來保證〉，《鄧小平文選（1975-1982）》，頁178。1982年2月中共中央做出〈關於建立老幹部退休制度的決定〉，規定相當省部級以上幹部年齡不超過65歲。參閱劉魯風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要事錄（1949-1989）》，頁614。1982年4月，國務院發布〈關於老幹部離職休養制度的幾項規定〉，確保離休制度的實施。參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1919.5-1987.12）》，頁370。

¹⁵¹ 許行，〈胡耀邦訪歐時透露內情〉，《鄧小平開放時代》，再版，頁131。

¹⁵²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下冊，頁943。鄧小平聯合趙紫陽，要胡耀邦承擔1986年學運失控的責任，黯然下臺。高舉，《後文革》，中卷，頁3。

¹⁵³ 高舉，《後文革史》，下冊，頁9。

¹⁵⁴ 《人民日報》，1987年1月1日。

亂。」¹⁵⁵中共中央接到胡耀邦的辭呈後，1月10日至15日，政治局召開生活會，會中胡耀邦承認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薄一波則陳述胡耀邦的錯誤有「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態度不堅決，甚而採取反對立場；在經濟上提倡高消費，有冒進之嫌；不重視統一思想，提出整黨是為了促進經濟發展；違反外交紀律，接待外賓時說了不該說的話；到處講話，經常違背中央決定精神。」¹⁵⁶1月16日，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除了政治局的成員外，鄧小平同時召來中央顧問委員會的成員，中央顧問委員不只列席了政治局的擴大會議，甚至投票接受胡耀邦的辭職；¹⁵⁷會中胡耀邦檢討了自己擔任總書記期間違反黨的集體原則，在重大的政治問題上的失誤，請中央批准他的辭呈。會議決定：

- 一、一致同意接受胡耀邦辭去黨中央總書記的請求。
- 二、一致推選趙紫陽代理黨中央總書記。
- 三、以上兩項決定，將提請黨的下依次中央全會追認。
- 四、繼續保留胡耀邦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職務。¹⁵⁸

鄧小平不希望政治上的鎮壓，影響到改革開放政策的進行，於是形象開明的趙紫陽接替胡耀邦出任代理總書記，並在同年正式擔任黨總書記，趙紫陽成爲新的繼承人人選。趙紫陽的接替總書記，同時也庇護了胡耀邦周圍支持改革的知識份子，將其安排在體制內的研究單位。¹⁵⁹在對待胡耀邦下台問題上，趙紫陽曖昧的態度，除了他對胡在黨政不分，以過去推動政治運動的方法推行經濟改革的

¹⁵⁵ 這番話成爲日後胡耀邦被人攻擊的把柄。阮銘，《鄧小平帝國》（台北：時報文化公司，1992年），頁191。

¹⁵⁶ 余集文，〈中央紅頭文件一覽〉，《九十年代》，期6（1987年6月），頁33-35。

¹⁵⁷ 中共黨章規定中央顧問委員會有權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但是沒有投票權，所以胡耀邦的下台爭議頗多；當時政治局委員18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2人，中央書記處書記4人，中央顧問委員會負責人17人。李英明，《向鄧後時代轉折》，頁38-40。

¹⁵⁸ 姜萊宣、張蔚萍、蕭姓主編，《中國共產黨會議紀錄概要》（瀋陽：瀋陽出版社，1991年），頁750-751。在討論趙紫陽的接任人選時，趙紫陽推薦田紀雲，萬里推薦天津市長李瑞環，陳雲推薦李鵬。參閱羅冰，〈胡耀邦事件真相〉，《爭鳴》，期2（1987年2月），頁7-10。海外留學生對胡耀邦去職反應激烈，留美學生共2150多人簽名抗議。顧益民等，〈大陸留美學生公開信〉，《九十年代》，期3（1987年3月），頁93-95。

¹⁵⁹ 那些單位包括國務院農村經濟發展所、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所、社會科學院等。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下冊，頁921、939-943。

作風不滿以外，不能排除他了解自己將是胡耀邦下台後最熱門的繼承人。¹⁶⁰

¹⁶⁰ 陳小雅，《天安門之變：八九民運史》，頁 206。

第四章 直接面對政爭

本章主要針對趙紫陽接任總書記後，經過價格改革的失敗，失去總管經濟大權，並於天安門事件中堅持溫和處理學潮的立場，終至下台被軟禁終身的過程。本章內容分為四節，第一節討論價格改革失敗的形成與影響，第二節討論「反自由化」的干擾與趙紫陽的因應，第三節討論政治改革牛步的原因與影響，第四節討論趙紫陽與鄧小平在天安門事件中的互動與影響等。

80年代鄧小平所推動的改革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要搞現代化建設使中國興旺發達起來，第一、必須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第二、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主要是堅持黨的領導。」¹也就是黨的工作重點發展經濟為中心，但不能逾越「四個堅持」的框架，尤其不能動搖黨的領導。²只是在中共政治凌駕一切的傳統下，改革開放勢必觸及政治結構中一黨專政的缺陷，引起既得利益者以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方式攻擊。³

1986年的學潮促使胡耀邦下台，趙紫陽代理總書記。⁴在決定總理繼任人選時，趙紫陽支持陳雲、鄧穎超等元老期望的李鵬，而不是支持鄧小平期望的、立場同樣是改革開放的萬里。⁵1987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趙紫陽被推選為中共中央代理總書記，同年10月25日，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總書記，並任中共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比胡耀邦的權位更大。⁶也因為趙紫陽已達中共全力顛峰，一切政治上的鬥爭在也無法避免，而中央軍委副主席則

¹ 鄧小平，〈我國方針政策的兩個基本點〉，《鄧小平文選》卷3，頁268。

² 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鄧小平文選》卷3，頁398-411。

³ 齊茂吉，〈揚棄馬列主義才能深化改革-評鄧小平南巡後的大陸情勢〉，《國魂》，期7（1992年7月），頁36-38。

⁴ 雖然趙紫陽自認其專長在經濟層面，但是鄧小平認為趙紫陽應當擔任總書記。齊辛，〈高層人事塵埃初定〉，《九十年代》，期5，頁35-37。

⁵ 高舉，《後文革史》，下冊，頁2。

⁶ 沈大為著，徐澤榮譯，《趙紫陽》，頁275。

沒有相對應的權力，軍權仍是掌握在軍委主席鄧小平手中，而日常工作則是由常務副主席楊尚昆負責。老人尚且不願退休，保守派不時以反自由化攻擊改革開放，這時趙紫陽的權位可說全靠鄧小平的支持才坐的穩。

1987年十三大是趙紫陽主政後第一個黨代表大會，他以總書記的名義所作的〈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政治報告中指出：「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這個階段包括兩層含義：第一，我國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我們必須堅持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道路。第二，我國的社會主義還處在初級階段。我們必須從這個實際出發，而不能超越這個階段。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特別指明我國在生產力落後、商業經濟不發達的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過的特定階段。」⁷十三大這個觀點比較合乎鄧小平的看法，而且把「堅持社會主義」放在前面，又為鄧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作了說明。

「任何領袖人物之言論，應該是集體智慧的結晶，皆吸取了當時學術研究之成果……因此應該是專家學者為領袖人物提供學術研究成果，而不是專家學者為領袖人物之言論做注腳。」⁸在文革以後，大陸部分知識分子不再滿足於為領導人言論作注釋的捧場文章，以《世界經濟導報》等比較開放的輿論傳媒為舞台，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大量的政策性建議，這在客觀上為趙紫陽的決策提供了集思廣益的理性基礎、並成為趙紫陽時代的重要動力資源。⁹在趙紫陽的支持和保護下，緊隨著「反自由化」運動的半途而廢，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出現了更為自由的氣氛。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就是當時討論政治改革和新聞自由的重要刊物。¹⁰

第一節 價格改革失敗

⁷ 趙紫陽，〈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人民日報》，1987年10月25日。

⁸ 劉孔伏，〈中國落伍是近代才開始的嗎？-大陸歷史學界對中國近代社會性質問題之爭鳴〉，《明報月刊》，期7（1989年7月），頁84。

⁹ 張偉國，〈開放改革的「精神領袖」——趙紫陽〉，《動向》，總期233（2005年1月），頁27-33。

¹⁰ 劉曉波，〈趙紫陽對中國改革的貢獻〉，收於陳一諮、嚴家其主編《趙紫陽與中國改革》，頁250-271。

1978 年以後，在鄧小平的授意下，胡耀邦進行大規模的平反，其中一部分老幹部恢復權力、地位和利益，但這也使得舊的體制全面恢復；雖然鄧小平後來倡導退休制度，但是爲了減少大老們的疑慮與阻力，仍然以各種方式參與決策，甚至擁有最後決策權。¹¹在這種情況下，雖然四個堅持讓鄧小平有彈性的解釋空間，但是經濟改革就受限於僵化的、由上而下指揮的政治制度。1978 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共確定改革開放，全力發展經濟的國策。在 1987 年趙紫陽成爲總書記時，經濟發展獲得成果，但是政治上四個堅持的框架下，使得中共無法完全取法歐美國家的經濟發展模式，避免接踵而來的社會轉型問題；於是計劃經濟難以過渡到市場經濟、衍生貧富不均形成的社會脫序。中共 1987 年 10 月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後，趙紫陽權力達到顛峰，替代胡耀邦成爲總書記；但是此時趙紫陽失去總理的經濟決策權，總書記的人事權卻掌握在陳雲等大老組成的人事小組，因此才由保守色彩濃厚的李鵬擔任總理。¹²

1987 年十三大宣佈經濟改革的中心就是發展「商品經濟」，也就是發展市場經濟。此時快速的經濟成長，健全的市場機制卻尚未建立，經濟改革的措施常無法調節市場價格合理化。¹³1985 年至 1988 年，消費與投資擴張，引起通貨膨脹，中共無法有效在維持經濟成長的同時，排除通貨膨脹的困擾，經濟問題上的論戰，形成落實改革與改革過速的相反論調。¹⁴趙紫陽經過 1985 年以來通貨膨脹引發社會反彈後，對於以開放商品價格過渡到市場經濟態度謹慎。¹⁵

¹¹ 陳一諮，《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頁 101-105。

¹² 陳一諮，《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頁 123-125。

¹³ 以社科院研究員吳敬璉爲首的經濟學家主張開放商品價格限制，由市場機制決定；以北大教授李以寧爲首的經濟學家則傾向從別的途徑解決經濟發展的矛盾。陳一諮，《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頁 139。

¹⁴ 中共解決通貨膨脹多半以緊縮銀根爲策略，但是在公有制的商品經濟下，公有企業爭相擴張卻又不負虧損責任，造成金融手段效果不彰。陳一諮，《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頁 85-99。

¹⁵ 1985 年上海零售價格上漲 17%，而一年前只增長了 2%；從火車票到衣裝鞋帽所有的商品，一夜之間好像突然柴米貴如油。上海市委，《上海年鑒 1988》（上海：統計出版社，1989 年），頁 298。

1987年10月，趙紫陽迫於價格改革帶來的通貨膨脹倒買倒賣，辭去國務院總理的職位，由立場保守的李鵬接任；趙紫陽空有總書記的職位，卻喪失主導經濟事務的大權。¹⁶

1987年11月，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便再度實行雞蛋、豬肉的配給制度。¹⁷但是如此仍不能遏制物價飛漲，多數民眾的薪資成長跟不上物價上漲的速度，民怨驟起。¹⁸1988年2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中討論經濟情勢時，也發現物價漲幅過大，尤其是食品漲幅；會中決定讓市場經濟決定商品價格，但仍需鼓勵商品生產與購物補貼等配套措施。¹⁹4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再針對民眾過度反應的物價、以爭取補償為目的的搶購歪風討論對策。²⁰面對商品價格不合理的反映改革措施，鄧小平認同李鐵映（1936-）的方案，決定大幅度開放商品價格，「理順物價，改革才能加快步伐。……中國不是有一個『過五關斬六將』的關公的故事嗎？我們可能比關公還要過更多的『關』，斬更多的『將』。過一關很不容易，要擔很大的風險。……首先放開肉、蛋、菜、糖四種副食品價格，與之相關的副食品也隨之開放。」²¹政策一公佈，便引起搶購風潮。針對群眾不理性的購物習慣，鄧小平認為：「這次副食品價格一放開，就有人搶購，議論紛紛，不滿意的話多的很。……物價改革非搞不可。……要讓全黨和全國人民懂得，這是很艱苦的工作，十全十美的方針、十全十美的辦法是沒有的。」²²5月，中央政治局第九次會議，會中

¹⁶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下冊，頁944。

¹⁷ 不久北京等其他大城市也跟著實行配給制度。林衛，〈給李代總理打幾分〉，《九十年代》，期2，頁46-48。

¹⁸ 當時民眾流行「原子彈不如茶葉蛋」、「手術刀不如剃頭刀」的口頭禪，諷刺收入失衡的普遍情形；而北大一位副教授更因收入不如校門口的修鞋匠而聲明自己也要在北大校門擺攤。童顏怡，〈北京：無盡的憂慮〉，《九十年代》，期6，頁35-37。1986年因物價上漲而收入下降的城鄉居民占5/1，1987年已擴大到5/2，而入不敷出的城鄉居民占15%。余集文，〈全民怨憤的物價問題〉，《九十年代》，期2，頁52-53。

¹⁹ 劉魯風，《中華人民共和國要事錄》，頁778。

²⁰ 劉魯風，《中華人民共和國要事錄》，頁784。

²¹ 鄧小平，〈理順物價，加速改革〉，《鄧小平文選》卷3，頁283-284。

²² 鄧小平，〈理順物價，加速改革〉，《鄧小平文選》卷3，頁283-284。

決定價格與工資制度改革需要有通盤的考慮和系統的方案，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必須尊重市場機制，理順不合理的商品價格，並相對應的解決薪資不合理的情形。²³

1988年7月，中共高層在北戴河就物價問題開會，會中意見紛陳，無法統一，即使多次表明「價格闖關」的鄧小平也不得不同意暫時不做任何結論；²⁴但是會中仍決定先開放名煙、名酒價格，提高部份相關產品的價格。²⁵只是所有相對應措施都無法都收到預期效果，企業因為產權不清、自主權不夠，無法提供公平競爭的市場；社會其它階層在經濟收入沒有相應增長的情況下，也因通貨膨脹而生活品質下降，人心不穩。²⁶民眾普遍有物價只升不降的預期心理，對官方提出價格隨需求浮動的喊話無法適應。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開第十次會議，通過〈關於價格、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開放大多數商品價格，希望逐步實現「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²⁷的方針。雖然中共官方的設計是漸進的讓商品價格逐步貼近市場機制，但是仍舊引起民眾心理恐慌，再度引起搶購風潮。基於此，國務院於8月底的第二十次常務會議中通過〈做好當前物價工作和穩定市場的若干重要決定〉，申明年底前不再提出新的調價政策，並要求人民銀行開辦保值儲蓄，希望能安撫民心。²⁸

1988年9月，鄧小平公開表示：「我們要訂一個方針，就是要在中央領導下

²³ 劉魯風，《中華人民共和國要事錄（1949-1989）》，頁787。

²⁴ 齊辛，〈揭開北戴河會議的面紗〉，《九十年代》，期9，頁16-19。

²⁵ 劉魯風，《中華人民共和國要事錄（1949-1989）》，頁790。

²⁶ 企業由於沒有明確的產權界定，沒有配套的市場機制，在農民已經先富起來的情況下，企業把增加的利潤多數用來滿足工人們的期望。沒有盈餘的企業，藉口設備陳舊，競爭無力仍然靠在國家的「大鍋飯」體制上，向高收入單位的盈餘分配，不少企業甚至用國家貸款發獎金。陳小雅，《天安門之變：八九民運史》，頁207。當時一級香煙由8角調至2元4角，結果到消費者手中已賣到6元；茅臺酒每瓶20元調至120元，到消費者手中已賣到500元。齊辛，〈揭開北戴河會議的面紗〉，《九十年代》，期9，頁16-19。

²⁷ 劉魯風，《中華人民共和國要事錄（1949-1989）》，頁791。

²⁸ 同年9月，人民銀行便開辦保值儲蓄，三年以上定期存款給予保值服務。劉魯風，《中華人民共和國要事錄（1949-1989）》，頁792。

深化改革。不僅是價格一個方面的改革，而且是多方面的、綜合的改革。只有多方面的綜合的改革，才能為價格改革創造條件。當然，真正建立秩序，不理順價格不行。價格不理順，就談不上價格改革的真正成功。我們準備用若干時間把價格初步理順，最終達到面向世界市場。」²⁹至此，鄧小平對價格改革採取較婉轉、漸進的說法。隨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更是順著鄧小平的說法，強調身化改革不僅是價格與工資改革，而是多方面的改革；並預期在兩年內將經濟改革的重點放在健全市場經濟，整頓經濟秩序，同時「建議國務院在今後五年或較長一段時間內，根據嚴格控制物價上漲的要求，並考慮各方面實際可能，逐步地、穩妥地組織實施物價改革。」³⁰中共中央終於對物價改革採取了退卻的決定，從「價格闖關」的政策轉變為「治理整頓」，以嚴格控制物價的手段，降低物價劇烈波動的影響，卻也讓經濟改革步調減緩。³¹

1988年9月，趙紫陽接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Milton Friedman（1912-2006）與香港學者張五常時，以「審時度勢，寬嚴適度」表達其治國理念比較偏向人治；同時坦承改革並不容易，但是改革開放的方針不會改變。³²隨後於9月的十三中全會，趙紫陽在會中報告：「社會轉型過程中弊端叢生。偷稅漏稅、走私販私、行賄受賄、執法犯法、敲詐勒索、貪污盜竊、道德敗壞。」³³出面為物價闖關所造成的經濟失序承擔責任。³⁴9月底，國務院發出〈關於開展1988年稅收、物價大檢查的通知〉，調查國營、集體、私營和聯營公司、行政事業單位和個體戶各種違法情形。³⁵10月，國務院再發布〈關於清理整頓公司的決定〉，針對當時政企不分、官商勾結、轉手倒賣等牟取暴利的問題公司加以整頓。³⁶

²⁹ 鄧小平，〈中央要有權威〉，《鄧小平文選》卷3，頁298-299。

³⁰ 劉魯風，《中華人民共和國要事錄（1949-1989）》，頁792。

³¹ 陳一諮、嚴家其主編，《趙紫陽與中國改革》，頁119。

³² 李怡、方蘇，〈專訪張五常：趙紫陽對當前經改的想法〉，《九十年代》，期10，頁17-21。

³³ 趙紫陽，〈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人民日報》，1987年10月25日。

³⁴ 高皋，《後文革》，下卷，頁186。

³⁵ 劉魯風，《中華人民共和國要事錄（1949-1989）》，頁793。

³⁶ 主要是針對1986年以後成立的公司。劉魯風，《中華人民共和國要事錄（1949-1989）》，頁773。當時清理的公司中，以康華公司最引人注目，因為其董事長為鄧小平長子鄧樸方，該公司並掛名

價格改革完全失控，豬肉、雞蛋、蔬菜、糖的價格開放暴漲，帶動未開放物價的商品，一時呈現通貨膨脹過速，民怨不止，超出鄧小平、趙紫陽的預料；最後只能政策倒退，以行政命令控制物價、採取貨幣緊縮政策、減少投資、甚至憑票供應的手段來降低通貨膨脹的效應。³⁷價格闖關的失敗，突顯經濟改革的困難與複雜，經濟成長突飛猛進，卻同時衍生許多難以調解的弊病，造成社會壓力，也讓趙紫陽接任總書記後，另一方面必須對經濟困境負責，交出總管經濟的大權。

第二節 「反自由化」的干擾

鄧小平掌權以來，政治主流一直在「左」與「右」之間搖擺不定。當保守派壓力過大時，便以「反資產階級自由化」謹守堅持共產黨專政的底限；但是當保守派過度打壓改革派影響經濟開放時，鄧又表現出支持改革派的彈性。1984年以後經濟開放獲得的成功，使得改革派的觀點一直在高層佔有優勢。³⁸但是長久以來共產主義的思維仍然深入影響多數的人，農村因為經濟發展需要出現雇工現象時，跟著出現「資本主義復辟」的批評；知識份子提出新聞自由、創作自由時，也出現「清除資產階級精神污染」的運動；1987年更發展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此時鄧小平採取撤換胡耀邦總書記的方式，平息改革產生的矛盾與壓力，但仍以形象開明、支持改革的趙紫陽替代胡耀邦。³⁹

1983年6月，六屆人大會議召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副總理萬里與姚依

在鄧樸方殘疾人基金會名下，享有免稅特權；其後被清理後，由於其背景特殊，清理結果並不符合社會期望。高舉，《後文革》，下卷，頁188-189。

³⁷ 沈大為著，徐澤榮譯，《趙紫陽》，頁278-279。「一管就死，一放就亂。」成為中共經濟改革上的現象。陳一諮、嚴家其主編，《趙紫陽與中國改革》，頁106。

³⁸ 陳一諮，《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頁83。

³⁹ 1986年底因為伙食與居住條件不佳，產生學生運動；後來發展為對通貨膨脹、沒有言論自由的不滿，這些要求被打為「資產階級自由化」。陳一諮，《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頁104-105、110-113。

林（1917-1994）獲得留任，同時李鵬（1928-）與田紀雲（1929-）也被任命為副總理。⁴⁰這樣的人事安排，是鄧小平在保守派與改革派之間所取得的平衡。

1983年10月，鄧小平在十二屆二中全會提出「清除資產階級精神污染，……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思想戰線的範圍很廣，我現在主要說理論和文藝戰線。」⁴¹10月31日，《人民日報》便發表〈高舉社會主義文藝旗幟堅決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⁴²。由於改革派領導人胡耀邦、趙紫陽等不熱衷推動「清除資產階級精神汙染」運動，保守派「二十天就搞不下去了」，⁴³在「清除資產階級精神汙染」運動衝擊改革開放時，鄧小平才能接受胡耀邦與趙紫陽的建言，改變政治風向。⁴⁴

1984年12月，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啓立（1929-）在作家協會第四次代表大會致詞說：「創作是需要自由的。這就是說，作家必須用自己的頭腦來思維，有選擇題材、主題和藝術表現方法的充分自由，有抒發自己的感情、激情和表達自己思想的充分自由，……自由地發揮自己的創作才能。」⁴⁵這是中央領導人第一次公開支持創作自由，立刻得到文藝界的共鳴。⁴⁶1985年2月，主持起草〈中國新聞法〉的胡績偉（1816-）南下廣泛徵求各界人士的意見，堅持新聞法是保障新聞自由，促進新聞自由的觀點；這樣的說法立刻引起文化界的共鳴，同時成了中共當局的敏感問題。⁴⁷

⁴⁰ 吉林省中共黨史學會編，《新中國紀事（1949-1984）》，頁803-804。

⁴¹ 鄧小平，〈黨在組織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鄧小平文選》，卷3，頁48。

⁴² 《人民日報》，1983年10月31日。

⁴³ 林默涵，〈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警惕和平演變〉，《光明日報》，1989年7月16日。

⁴⁴ 高舉，《後文革史》，中卷，頁172。

⁴⁵ 胡啓立，〈在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人民日報》，1984年12月30日。

⁴⁶ 王亞夫稱之為「標誌著文藝界的春天來臨」。參閱王亞夫，〈論學術自由〉，《學術月刊》，期4（1985年4月），頁1。作家協會書記張光年呼籲要「抓住解放思想這一中心環節」。參閱張光年，〈新時期社會主義文學在闊步前進〉，《人民文學月刊》，期1（1985年1月），轉引自丁望，《六四前後》，上冊，頁49。

⁴⁷ 胡績偉曾擔任《人民日報》社長，後由胡耀邦調至全國人大常委會科教文衛委員會擔任副主任。陸鏗，《鄧小平，改革舵手？歷史罪人》（香港：百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0年），頁212。

1986年9月，十二屆六中全會中討論〈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會中陸定一（1906-1996）堅持決議中不提「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萬里也發言支持其看法，但是多數人則持不同意見，胡耀邦身爲主席，知道決議內容經過鄧小平審定，不便更動，只能迂迴的裁示留後討論來表達其立場；鄧小平對此在會中指出：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爲什麼？第一，現在在群眾中，在年輕人中，有一種思潮，這種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還有在那邊敲邊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議論、台灣的議論，都是反對我們的四項基本原則，主張我們把資本主義一套制度拿過來，似乎這樣才算真正搞現代化了。這種自由化實際是一種什麼東西？實際上就是要把我們中國現行的政策引導到走資本主義道路。……所以我們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提法。……我主張用。看來，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這個思潮不頂住，加上開放必然進來許多烏七八糟的東西，一結合起來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對我們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衝擊。你們注意看一些香港的議論，一些外國資產階級學者的議論，大都是要求我們搞自由化，包括說我們沒有人權。」⁴⁸

1986年12月30日，鄧小平曾說：「對於那些明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這次就要處理。可能會引起波浪，那也不可怕。對方勵之、劉賓雁（1925-2005）、王若望處理要堅決，他們狂妄到極點，想改變共產黨，他們有什麼資格當共產黨員？」⁴⁹1987年1月13日，中共上海市紀律檢查委員會做出〈關

⁴⁸ 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十二大以來重大文獻選編》，下冊，頁1171-1172。

⁴⁹ 鄧小平，〈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鄧小平文選》，卷3，頁213。

於開除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上海作協理事王若望黨籍的決定)；⁵⁰1月17日，中共安徽省紀律檢查委員會做出〈關於開除方勵之黨籍的決定〉；⁵¹1月23日，中共《人民日報》社機關紀律檢查委員會做出〈關於開除劉賓雁黨籍的決定〉；1月28日，朱厚澤被免去中央宣傳部長的職務。⁵²同時爲了加強對新聞、出版事業的管理，國務院於1月中旬成立新聞出版署。⁵³3月，中宣部長鄧力群召開全國宣傳部長會議，討論宣傳理論工作即報刊的整頓。⁵⁴

1987年，趙紫陽接任代理總書記首先要面對的就是「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政治壓力。1987年1月6日，中共中央向全民發佈〈鄧小平同志關於當前學生鬧事問題的講話要點〉(又稱一號文件)，其內容以「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爲基礎，表達壓制學潮的立場。⁵⁵1月13日，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發布〈關於共產黨員必須嚴格遵守黨章的通知〉，其內容指出「各級黨組織和每個黨員義不容辭的職責是，堅決同一切違背黨章的錯誤言行進行鬥爭。不管是誰，如果違反黨的政治紀律，違背四項基本原則，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就要受到黨的紀律處分。對於少數不顧黨組織一再警告，恣意妄為的，嚴重危害黨的人，要堅決清除出黨，以保持黨的純潔性。」⁵⁶1月15日，中共中央決定將鄧小平在十二屆六中全會上關於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發言傳達全黨(又稱二號文件)。⁵⁷對於1987年「批自由化」的方式和「政治界限」，趙紫陽發表過多次談話，傾向於「寬容化」；也就是「四號文件」。「四號文件」下達後，趙紫陽在春節團拜會上的講話，重申「四號文件」規定的「批自由化」對象和範圍，要求幹部不要重複「左」的那一套錯誤方法，把「批自由化」釀成政治運動。趙紫陽在1987年一月下旬主持制定的

⁵⁰ 《人民日報》，1987年1月15日。

⁵¹ 《人民日報》，1987年1月20日。

⁵² 阮銘，《鄧小平帝國》，頁203。

⁵³ 劉魯風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要事錄(1949-1989)》，頁753。

⁵⁴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1919.5-1987.12)》，頁417。

⁵⁵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1919.5-1987.12)》，頁414。

⁵⁶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1919.5-1987.12)》，頁415。

⁵⁷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1919.5-1987.12)》，頁414。

「四號文件」，把「批自由化」限定在黨內的政治層面，規定不在黨外和經濟領域「批自由化」。接著趙紫陽有發表「五一三講話」，並得到鄧小平的支持，順利制止「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⁵⁸

1月28日，趙紫陽簽發〈中共中央關於當前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干問題的通知〉（又稱四號文件），把「反自由化」限制在黨內與政治領域內，解決「根本政治原則問題，即主要是反對企圖擺脫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道路的錯誤思潮。」⁵⁹藉此避免「反自由化」波及經濟改革、農村政策、科學研究、文藝風格和人民日常生活。1月29日，趙紫陽利用春節團拜時，以歸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的社會主義觀點，將限制反自由化的範圍再說明一遍：「一條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條是堅持改革、開放、搞活的方針。……有人擔心，反對自由化會不會又是一次政治運動？我代表中共中央負責地向大家說明：我們不搞政治運動。我們深知，搞運動無助於解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靠一次或幾次運動也根本不可能消除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影響。……這項工作，嚴格限於中國共產黨內，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領域中進行。農村不搞。企業和機關是進行正面教育。即使在政治思想領域內，實質上也是進行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則的教育。」⁶⁰這番話顯然得到鄧小平的支持。1987年1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干問題的通知〉，提出「要防止以『左』批右，絕不允許因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而妨礙改革，開放方針的貫徹執行。」⁶¹但是3月8日，鄧小平接見外賓時仍說：「去年9月召開的六中全會上，有的同志主張在〈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中不要寫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胡耀邦同志實際上就持這種觀點。……當時我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僅現在要

⁵⁸ 「四號文件」限制「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侷限在政治面，並只能在黨內討論，避免事態擴大。丁望，《六四前後》，上冊，頁165、177；陳一諮，《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頁111-113。

⁵⁹ 〈中共中央關於當前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干問題的通知〉，《潮流月刊》，總期2（1987年4月），頁15-18。

⁶⁰ 《人民日報》，1987年2月1日。

⁶¹ 趙蔚，《趙紫陽傳》，頁287。

講，還要講十年到二十年。今天，我又加上五十年。」⁶²

1987年4月，鄧小平要趙紫陽發表一個強調改革的講話，鄧小平也藉此公開表態支持改革。⁶³鄧小平針對「反自由化」的紛紛擾擾指出：「我們既有『左』的干擾，也有『右』的干擾，但最大的危險還是『左』。」⁶⁴5月13日，趙紫陽在「宣傳、理論、新聞、黨校幹部會議」上強調1986年底的學潮已經結束，「批自由化」不能「突破四號文件」，只有改革才有出路，趙紫陽認為：「大家知道，1958年開始的三年『左』傾冒進，導致了比例的失調，爆發了危機，不得不進行大調整（按：調整經濟政策），費了五年的時間，那時把困難渡過去了，但是『左』的指導思想並沒有得到清理，經濟情況一好轉，老的一套『左』的方針政策又繼續貫徹執行起來，……這個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最重要的是把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端正過來，並且堅持下去。」⁶⁵這次重要的發表也稱爲〈五一三講話〉。⁶⁶胡耀邦下台以來，中共元老不斷曝光，擴大「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於是，鄧小平數月之間將政治風向又轉向改革派這邊，避免經濟開放改革受影響。⁶⁷對於1987年「批自由化」的方式和「政治界限」，趙紫陽發表過多次談話，傾向於「寬容化」；也就是「四號文件」。「四號文件」下達後，趙紫陽在春節團拜會上的講話，重申「四號文件」規定的「批自由化」對象和範圍，要求幹部不要重複「左」的那一套錯誤方法，把「批自由化」釀成政治運動。趙紫陽在1987年一月下旬主持制定的「四號文件」，把「批自由化」限定在黨內的政治層面，規定不在黨外和經濟領域「批自由化」。接著趙紫陽有發表「五一三講話」，並得到鄧小平的

⁶² 鄧小平，《鄧小平同志重要講話（一九八七年二月-七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10。

⁶³ 陳一諮，《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頁112。5月7日，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特別提到「現在管事的是趙紫陽和李先念」。參閱《人民日報》，1987年5月8日。

⁶⁴ 鄧小平，〈吸取歷史教訓，防止錯誤傾向〉，《鄧小平文選》，卷3，頁248。

⁶⁵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頁611-612。

⁶⁶ 這次講話也被稱爲〈五一三講話〉。趙紫陽，〈在宣傳、理論、新聞、黨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收於丁望，《六四前後》，下冊，附錄6；趙紫陽，〈在宣傳、理論、新聞、黨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十二大以來重大文獻選編》，下冊，頁1397-1409。。

⁶⁷ 陸京士，〈北京訪察實錄〉，《九十年代》，期7（1987年7月），頁27-31。

支持，順利制止「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⁶⁸

趙紫陽發表〈五一三講話〉後，有更大的彈性空間推動改革，但是改革派與保守派在「反自由化」的議題上的衝突並未就此結束，彼此利用宣傳機器製造有利於己的輿論，但真正的重點仍繫於鄧小平的態度。鄧力群是此時「反自由化」最積極的中共幹部，鼓勵其領導的中央書記處政策研究室針對「反自由化」在《人民日報》、《紅旗》等中共宣傳機器發表社論或評論。⁶⁹鄧力群發現鄧小平改變政治風向後，爲了使鄧小平支持其立場，便推動 1986 年底鄧小平處理方勵之的問題時提及的搞自由化份子的名單，到了 1987 年 3 月，中央書記處政策研究室已經整理出〈資產階級自由化言論摘編〉，包括鮑彤共涉及 13 人。⁷⁰這份以鄧小平過去講話爲基礎的名單，送到總書記趙紫陽手中時，其權威性無法否決，在 7 月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中通過對王若水、吳祖光、張顯揚等人「勸其退黨」的決議，其他人的處置則被擱置。⁷¹

經過 1987 年 7 月以「反自由化」整肅知識分子的事件後，趙紫陽決定成立五人思想意識工作領導小組取代中央書記處政策研究室，並把鮑彤、胡啓立安排在五人小組中；9 月 9 日《紅旗》雜誌總編輯熊復（1915-）也因輿論壓力辭去職務。⁷²趙紫陽成爲總書記後在這時的果斷措施雖然有效壓制「反自由化」的批評，與保守派在意識形態上的對抗雖佔上風，但是貿然撤銷中央書記處政策

⁶⁸ 「四號文件」限制「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侷限在政治面，並只能在黨內討論，避免事態擴大。丁望，《六四前後》，上冊，頁 165、177；陳一諮，《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頁 111-113。

⁶⁹ 高舉，《後文革史》，下冊，頁 23。1987 年 1 月，中央書記處政策研究室爲「反自由化」成立一個小組，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局長盧之超領導。參閱嚴家其，《我的思想自傳》增訂本（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0 年），頁 119。

⁷⁰ 嚴家其，《政治多麼簡單》（台北：正中書局，1992 年），頁 188。

⁷¹ 名單中共有鮑彤、于光遠、王若水、蘇紹智、吳祖光、張顯揚、孫長江、李洪林、于浩成、吳明瑜、嚴家其、張賢亮、管惟炎等。高舉，《後文革史》，下冊，頁 23-30。吳祖光曾爲此寫一封〈至中紀委書〉表達意見，批評其勸退違反黨章。參閱曾慧燕，〈黨的政策變，我始終沒變-吳祖光加州的一席話〉，《九十年代》，期 12（1987 年 12 月），頁 18-20。

⁷² 高舉，《後文革史》，下冊，頁 31。

研究室卻也讓人有運作粗糙、急迫的印象，其處理方式引起元老的反感。⁷³但是任由反自由化運動蔓延下去，可能多年改革開放的成果會因此消退，這不但不是趙紫陽所希望的結果，鄧小平也不願意政治上的四個堅持阻礙改革開放的方向。

74

胡耀邦擔任總書記時，中共高層在政治改革上的分歧主要在胡與鄧小平之間；由於胡耀邦和趙紫陽在防止個人崇拜、反對「清污」等方面是一致的，所以，在胡下台後，政治改革上的分歧只能出現在趙和鄧之間。胡耀邦被迫下台，趙紫陽接任總書記，同時兼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實質上是既管黨務也管經濟，所面對的局面極為複雜。

「反自由化」運動沒有波及全國，沒有影響經濟改革，被整肅的黨內自由派和知識分子也沒有完全失去人身自由；方勵之、劉賓雁等人的自由化言論在國內外得到更廣泛傳播。可見趙紫陽對知識分子的不同意見是比較能容忍的。⁷⁵趙紫陽是靠改革開放獲得提拔，若改革開放被否定，趙的政途勢必跟著黯淡，所以批判反自由化運動不但合乎趙紫陽與鄧小平的利益，同時也與中共改革開放的政策一致，因此能在胡耀邦下台後，迅速將政治風向轉為改革開放的一方。

第三節 政治改革牛步

1979年以來，以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為核心的改革派佔優勢，經濟體制改革得以大規模推展，政治體制的改革需求也越來越大。但是來自保守派的阻撓與干擾不小，而鄧小平在四個堅持之下，其引導的政治風向又變換無窮，政局便

⁷³ 高舉，《後文革史》，下冊，頁3、31-32。

⁷⁴ 沈大為著，徐澤榮譯，《趙紫陽》，頁274。

⁷⁵ 劉曉波，〈趙紫陽對中國改革的貢獻〉，收於陳一諮、嚴家其主編《趙紫陽與中國改革》，頁250-271。

經常有「反左」和「反右」的反覆。⁷⁶1985年的經濟失控，使得過去舊體制對改革的限制暴露出來，中共領導人開始討論政治體制隨著經濟改革調適的可能性。1987年初，原本負責政治事務的胡耀邦下台，鄧小平讓負責經濟事務的趙紫陽接任總書記，從而面對政治體制隨著經濟改革開放而被迫改革的複雜局面。

1980年華國鋒提出辭呈後，中共中央召開中央工作會議，⁷⁷權力轉移至鄧小平等老人手中，同時也馬上面對權力交接的問題，所以鄧在會中特別提到培養青年幹部的重要，「這項工作做不好，就要犯歷史性的大錯誤。」⁷⁸1981年5月負責推動培養青年幹部計劃的陳雲建議中央組織部成立青年幹部局，希望老幹部讓出工作崗位；⁷⁹6月，陳雲又召開會議討論老幹部退休問題。⁸⁰鄧小平在隨後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將陳雲的文章發給與會者，⁸¹在7月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座談會中專門討論中青幹部與老幹部交替的建議，陳雲在會中特別強調培養中青幹部的迫切，並說明其設計，鄧小平則呼應「陳雲這個建議我舉雙手擁護。……頭五年真正能夠選到五萬左右五十歲以下的，四十歲左右的，四十歲以下的幹部，用五至十年基本完成新老交替的五年計劃和十年計劃。」⁸²鄧小平提出排除「三種人」：「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⁸³但是幹部培養計劃並不順利，僧多粥少的結果，排除「三種人」的認定標準成為排除異己的法寶，強調文憑也產生偏頗，幹部革命化、年輕

⁷⁶ 1982年下半年「反左」的聲勢，比1981的「批自由化」和1984年的「清污」還要大，幾乎所有省區書記、大軍區司令員都發表文章，表示支持「反左」。中共總後勤部黨委第一書記王平說：「幹部隊伍中的錯誤傾向，既有『左』的，也有右的，但『左』是主要的。…重點在各級領導中清理『左』的影響。」--參閱《人民日報》1982年10月19日，版4；丁望，《六四前後》上冊，頁157、175。

⁷⁷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1919.5-1987.12）》，頁358。

⁷⁸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1975-1982）》，頁320。

⁷⁹ 陳雲，〈提拔培養中青年部是當務之急〉，收於《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冊，頁782。

⁸⁰ 陳雲，〈關於老幹部離休、退休問題座談會記要〉，《陳雲文選（1956-1985）》，頁267。

⁸¹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1975-1982）》，頁177。

⁸²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1975-1982）》，頁340。陳雲在會中的發言參閱陳雲，〈成千上萬地提拔中青年幹部〉，《陳雲文選（1956-1985）》，頁267-273。

⁸³ 〈關於清理領導班子中「三種人」問題的通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1919.5-1987.12）》，頁375-376。

化、知識化、專業化的目標難以實現，反而激化矛盾。⁸⁴

文革以後，胡耀邦主持平反工作頗有成效，讓許多老幹部回復原本職位或同等級的職位；⁸⁵這同時也造成政府機關臃腫，冗員過多。由於中國體制的高度獨裁化和政治化的特徵，中共高層有關改革的決策，無論是經濟改革還是思想解放，事實上都是政治決策。具體到政治體制改革的決策，鄧小平著重於提高行政效率的目標，以改變「權力過於集中」和「權力缺少監督」的局面為手段，克服官僚主義，實行精簡機構和改進作風。⁸⁶

1980年8月，五屆人大第三次會議，在鄧小平的主導下，逼迫華國鋒放棄總理職位，同時也改善中央機關幹部兼職過多的狀況，於是鄧小平以下等大老分別辭去副總理以及人大副委員長的職務。9月，五屆人大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通過〈國務院關於老幹部離職休養的暫行規定〉。⁸⁷1981年1月，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進一步討論精簡中央機構的問題；⁸⁸鄧小平認為「這場革命不搞，讓老人、病人擋住比較年輕、有幹勁、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個現代化沒有希望，還可能要亡黨亡國。……涉及數百萬人的精簡機構是個很大的問題，並準備用半年時間，最多三個季度完成中央一級的精簡，兩年時間完成各級機構改革。」

89

⁸⁴ 當時幹部子弟、秘書出身、工青團系有明顯優勢，以至流傳此歌謠：「年齡是個寶，文憑不可少，後台最重要，德才做參考。」高舉，《後文革史》，下卷，頁35-51。胡啓立曾為了強調文憑產生的問題說：「我們應該是講文憑，但不唯文憑，重在真才實幹。」《人民日報》，1987年12月11日。

⁸⁵ 鄧小平，〈關於政治體制改革問題〉，《鄧小平文選（1975-1982）》，頁196。當時行政效率不彰，出現「一張參考一包菸，一杯茶水泡一天」的諷刺順口溜，「參考」指的是內部發行的報紙《參考消息》。參閱高舉，《後文革史》，下卷，頁52。

⁸⁶ 劉曉波，〈趙紫陽對中國改革的貢獻〉，收於陳一諮、嚴家其主編《趙紫陽與中國改革》，頁250-271。

⁸⁷ 《人民日報》，1980年9月30日。但是具體推動則要到1981年陳雲主持「離休座談會」後開始，而負責執行此工作的胡耀邦也因此得罪人。參閱陳雲，〈關於老幹部離休、退休問題座談會記要〉，《陳雲文選（1956-1985）》，頁267。

⁸⁸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1919.5-1987.12）》，頁368。

⁸⁹ 鄧小平，〈精簡機構是一場革命〉，《鄧小平文選（1975-1982）》，頁351-356。鄧小平接著還提出裁軍得看法。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1919.5-1987.12）》，頁368。

1982年2月，趙紫陽配合鄧小平與胡耀邦推動的老幹部離休制度，提出精簡國務院編制的方案，並在五屆人大常委第二十二次會議中通過，並決定從下半年開始進行各省自治區的機構精簡。⁹⁰4月，趙紫陽在五屆人大常委第二十三次會議中發表〈關於國務院機構改革進展情況和三項議案的說明〉，宣佈國務院機構精簡與領導幹部調整基本完成。⁹¹8月，人大常委會宣佈，國務院41個直屬機關中保留15個，其餘併入其他部會。⁹²國務院進行機構精簡後，帶動其他中央機構進行精簡，局、處級機構減少10%，總編制減少17%，領導幹部平均年齡由64歲降為60歲。⁹³1982年10月，國務院開始推展省、市、地級的機構精簡。⁹⁴1983年3月，省級機構精簡與領導幹部調整基本上完成。⁹⁵

爲了安置因爲精簡被迫退休的高級幹部，即使建立退休制度仍無法滿足大老的需求，因此鄧小平提出設立顧問委員會，作爲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的替代方案。⁹⁶1982年9月，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成立由172人組成的中央顧問委員會，⁹⁷由鄧小平擔任主任。⁹⁸

在機構精簡的過程中，趁機牟利的事件頻傳。1983年4月，中央紀律委員會點名湖南湘潭地區等，要求各政風部門制止機構精簡過程中的不正之風。⁹⁹另

⁹⁰ 〈關於國務院機構改革的決議〉，《人民日報》，1981年3月9日。

⁹¹ 52個部，減爲41個；部長級人員減少67%；司局機構減少32%。趙紫陽，〈關於國務院機構改革進展情況和三項議案的說明〉，《新華月報》，期5（1982年5月），轉引自高舉，《後文革史》，下卷，頁56-57。

⁹² 《人民日報》，1981年8月25日。

⁹³ 《人民日報》，1981年8月16日。

⁹⁴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1919.5-1987.12）》，頁383。由於各地差異甚大，機構與人員編制等問題都不一樣。參閱《人民日報》，1983年1月21日。

⁹⁵ 省級領導幹部編制減少34%，平均年齡降7歲，具大專學歷者由20%提升至43%。《人民日報》，1983年1月24日。

⁹⁶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1975-1982）》，頁368。

⁹⁷ 《新華月報》，期（1982年9月），頁。轉引自高舉，《後文革史》，下卷，頁58。

⁹⁸ 《人民日報》，1982年9月14日。

⁹⁹ 《人民日報》，1983年4月26日。5月，中央紀律委員會有轉發湖南省委〈關於調查處理湘潭地區領導機關趁機構合併之機私分國家資財問題的情況匯報〉，要求各地嚴肅處理機構改革中私

外，機構精簡演變成新機構增設的藉口，將機構升格，增加新機構編制人員的情形普遍存在，機構精簡反變成機構膨脹；中央組織部於 10 月特別發出〈關於嚴格控制機構膨脹的通知〉。¹⁰⁰

機構精簡得到出成果後，軍隊的精簡整編則由軍委副主席楊尚昆負責推動；¹⁰¹鄧小平於 1984 年 11 月軍委座談會上提出軍隊進一步「消腫」的概念。¹⁰²1985 年 2 月，胡耀邦也透露裁軍 100 萬的消息。¹⁰³至 1986 年底，已裁軍 41 萬人，十一大軍區整編為七大軍區，整併師、團單位 4000 多個。¹⁰⁴

雖然黨政軍機構精簡過程中，出現利用改革名義增設新機構的浮濫現象，但是在領導幹部強調年輕化與學歷上，仍然有不錯的結果。機構精簡至此初見成效。在此之前，鄧小平主導的政治改革，著重在黨政分開、精簡機構、改善官僚作風；隨著經濟的改革開放，這些政治上的作為仍然不夠。

1984 年 10 月，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加快城市經濟改革，其結果卻是 1985 年的經濟失控與 1986 年採取經濟緊縮政策。此時鄧小平發現經濟停滯來自政治體制的限制，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需求；¹⁰⁵「1980 年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沒有具體化，現在應提到日程上來，否則會阻礙經濟體制改革，拖經濟發展的後腿。」¹⁰⁶1986 年 6 月，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提出黨政分離，「我們所有的改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的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

分國家財產的現象。《人民日報》，1983 年 5 月 29 日。

¹⁰⁰ 《人民日報》，1983 年 10 月 10 日。

¹⁰¹ 《人民日報》，1981 年 8 月 25 日。

¹⁰² 《人民日報》，1984 年 11 月 2 日。

¹⁰³ 陳一知，〈胡耀邦下台的軍隊因素〉，《九十年代》，期 8（1987 年 8 月），頁 57-60。

¹⁰⁴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1919.5-1987.12）》，頁 412-413。

¹⁰⁵ 5 月，胡啓立將鄧小平的想法傳達給媒體，強調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要能互相協調。李怡、方蘇，〈參與設計者的獻議-高放談政治改革〉，《九十年代》，期 12，頁 58-64。6 月，胡啓立接見法共代表團時，經濟體制改革牽涉廣泛，政治領域也不可避免。林衛，〈政治體制改革提上日程〉，《九十年代》，期 8（1986 年 8 月），頁 22-24。

¹⁰⁶ 鄧小平，〈爭取整個中華民族的大團結〉，《鄧小平文選》，卷 3，頁 178-179。

互相依賴，相互配合，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¹⁰⁷9月，鄧小平又在聽取中央財金領導小組匯報時說：「改革的內容，首先是黨政分開，解決黨如何善於領導的問題。這是關鍵。第二個內容是權力要下放，解決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同時地方各級也都有一個權力下放問題。第三個內容是精簡機構，這和權力下放有關。並希望明年黨的代表大會要能有一個藍圖出來。」¹⁰⁸接著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便〈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要「堅定不移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¹⁰⁹實際上，保守派不支持，鄧小平對政治體制改革也不積極。¹¹⁰

1986年9月，趙紫陽在國慶招待會上發表：「在推進經濟改革的時候，我們還要重視政治體制改革。我們將對政治體制改革進行充分的研究和醞釀，有領導、有計劃、有步驟地使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互相適應，互相促進」¹¹¹接著陳雲也在中央紀律委員會議中要求保證政治體制改革的健康發展。¹¹²隨後中共領導幹部紛紛發言表示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

面對政治改革，趙紫陽顯然極為謹慎，在無法體察鄧小平的心意前，先採取觀望的態度；直到1986年秋，鄧小平詢問趙紫陽有關政治改革的規劃，趙才著手成立「政治體制研討小組」，該小組由趙紫陽負責，成員包括胡啓立、田紀雲、薄一波、彭沖（1915-）在內，其下設辦公室，由鮑彤、賀光輝（1929-）、周杰（1927-2005）、嚴家其負責主持，陳一諮、陳福今（1941-）負責日常事務，其

¹⁰⁷ 鄧小平，〈黨和國家體制領導的改革〉，《鄧小平文選》，卷3，頁163-164。

¹⁰⁸ 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鄧小平文選》，卷3，頁198-199。

¹⁰⁹ 〈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新華月報》，期9（1986年9月），頁6-7。此決議的擬定引起中共高層激烈爭議，經過八、九次草擬才定稿，費時9個月。參閱林衛，〈十二屆六中全會的妥協〉，《九十年代》，期11，頁22-25。

¹¹⁰ 1986年9月，鄧小平會見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雄時表示政治體制的改革還在考慮。〈不搞政治體制改革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人民日報》，1986年9月4日。

¹¹¹ 《人民日報》，1986年10月1日。

¹¹² 《人民日報》，1986年12月8日。

改革方案在十三屆全國代表大會通過。¹¹³ 這個辦公室在擬定政治改革計劃後，向鄧小平報告，並獲得鄧的同意；¹¹⁴ 但是鄧要求「不要搞西方的三權分立」。¹¹⁵ 趙紫陽在計劃中指出：「中國政治體制有現代化問題。……舊體制至少有三弊病，即權力過分集中於黨；人治色彩嚴重；政治運作和政治資訊封閉。」¹¹⁶ 11月，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組成七個小組，第一組研究黨政分離，由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1942-）負責；第二組研究黨的組織和黨內民主，由周杰負責；第三組研究權力下放與機構改革，由賀光輝負責；第四組研究人事制度改革，由組織部副部長曹志（1928-）負責；第五組研究社會主義民主，由胡繩（1918-2000）負責；第六組研究社會主義法制，由法制委員會副秘書長餘孟孝負責；第七組研究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原則，由廖蓋隆（1918-）負責。¹¹⁷ 這股促進改革政治體制的風潮很快影響到大學生，在經濟改革出現弊端與社會轉型帶來的壓力下，盡快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變成爲 1986 年底學潮時大學生的共同訴求，同時成爲胡耀邦下台的導火線。

雖然鄧小平已經體認到政治體制的缺陷會限制經濟發展，但是中共內部並不是人人都如如同期望經濟發展一般的期望政治改革；因此，政治體制研究小組並沒有起太大作用。當時的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所長嚴家其在六四事件逃亡後曾說：「中央政治體制改革小組，是由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等批准成立的。由趙紫陽、胡啟立、田紀雲、彭沖和薄一波五人組成政治體制改革小組。趙紫陽還經常邀請胡喬木和鄧力群兩人參加會議，會議舉行時，都是根據鄧小平的有關言論談政治體制改革，鄧的任何依據話都不能動，五人小組只能在鄧講話剩下的空間

¹¹³ 另外從各部門抽調 30 幾人加入辦公室擔任研究人員。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紀研究所，1997 年），頁 22-25，36-40；高舉，《後文革史》，下冊，頁 34。

¹¹⁴ 陳一諮，《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頁 107。

¹¹⁵ 鮑彤，〈咫尺天涯念紫陽-兼爲“六四”十五周年作〉，收於陳一諮、嚴家其主編，《趙紫陽與中國改革》（香港：明鏡出版社，2005 年），頁 64。

¹¹⁶ 政治體制研討小組，〈政治體制改革總體方案〉，轉引自嚴家其，〈趙紫陽：綻射燦爛的陽光-沉痛哀悼人民的好總理趙紫陽〉，收於陳一諮、嚴家其主編，《趙紫陽與中國改革》（香港：明鏡出版社，2005 年），頁 23-25。

¹¹⁷ 陳一諮，《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頁 108。

發表意見。同時盡量做到相互尊重，從不辯論，五人小組談罷以後剩下的空間才是鮑彤、嚴家其、周傑這些實際從事政治體制研究設計者的，狹窄的不能再狹窄了。」¹¹⁸由此可知鄧小平雖然知道經濟改革開放與政治體制間有矛盾，但是並沒有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決心，而趙紫陽也明白自己的權位全靠鄧的支持，因此討論政治改革便只能在鄧的設限下消極進行，不了了之。

1987年，趙紫陽發表「五一三講話」，打擊反自由化的聲浪後，政治風向又偏向改革這一邊。6月，趙紫陽出訪東歐時透露十三大的中心議題是改革問題，將繼續深化經濟改革，並將著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¹¹⁹隨後鄧小平接見外賓時也說：「中國要加快經濟改革的步伐。……政治體制改革將是中共十三大的主要議題之一。……要從十三大開始實行政治體制改革。」¹²⁰7月，趙紫陽在《人民日報》發表政治體制改革委員會辦公室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設想〉，提出執政黨應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活動，避免黨政不分，因此撤銷各機關不擔任行政工作的黨組織；建立文官組織；建立政府與民眾對話協商制度；允許人民選擇行業的自由與流動；制定新聞法。¹²¹對〈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設想〉鄧小平也表示贊同。¹²²10月，趙紫陽在十二屆七中全會中提到：「黨政分家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首要關鍵，黨委機關應只負責政治方向、決策等方面的政治領導，對各方協調對行政機構實行監督，不要在包攬政府和企業的事務，要把政府各部的黨組逐步撤銷。」¹²³

1987年3月，趙紫陽就曾向鄧小平報告〈關於十三大報告大綱的設想〉，以

¹¹⁸ 《東方日報》，1989年8月16日。

¹¹⁹ 《人民日報》，1987年6月11日。

¹²⁰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卷3，頁236-243。

¹²¹ 趙紫陽，〈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人民日報》，1987年10月25日。

¹²² 高舉，《後文革史》，下卷，頁82。

¹²³ 趙紫陽，〈關於黨政分開〉，《紅旗》，期23（1987年12月），頁2-4。會中並決定把〈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設想〉的主要內容寫入中央委員會在十三大的報告中。參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1919.5-1987.12）》，頁422。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立論根據，鄧小平也批示「這個設計好」。¹²⁴10月，十三大召開，會中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與「生產力標準」；也就是把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定為發展生產力，以及是否有利於發展生產力，為「考慮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和檢驗一切工作的根本標準。」¹²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包含兩層涵義：一、中國已是社會主義國家，不能背離社會主義路線；二、中國的社會主義處於初級階段，不能超越這一現實。因此，社會主義階段是指中國在生產力落後，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經過的特定階段。¹²⁶趙紫陽根據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在十三大報告中指出：「我們長期目標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備、富有效率、增強活力和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的領導體制。……改革的關鍵首先是黨政分開，同時又進一步下放權力，改革政府機構，改革幹部人事制度，建立社會協商制度，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政治體制改革的近期目標是有限的。」¹²⁷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貼近改革現實的需要，解放中共社會主義理論對實踐改革的束縛。¹²⁸這樣的實用價值符合鄧小平的風格，鄧公開表示一切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制訂規劃。¹²⁹

十三大後，趙紫陽正式當選總書記，但是物價改革的失敗後的聲望大跌，也使趙必須辭去總理的職務，離開自己熟悉的舞台，權力大減。1987年11月，六屆人大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通過趙紫陽辭去總理職務，同意趙紫陽的建

¹²⁴ 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鄧小平文選》，卷3，頁407。

¹²⁵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13。

¹²⁶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頁8。在十三大之前，鮑彤以特別針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宣傳。參閱鮑彤，〈社會主義的幼駒和資本主義的老馬及其他〉，《人民日報》，1987年1月5日。

¹²⁷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52-59。

¹²⁸ 〈經濟理論在八年改革中實現的重要突破—經濟學家劉國光同記者的談話〉，《人民日報》，1987年7月20日。

¹²⁹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卷3，頁251。

議，以李鵬為代總理。¹³⁰由於趙紫陽容忍了保守派要求胡耀邦下台，他在高層領導中日益面臨形單影隻的局面。一時間趙紫陽不僅失去了主管經濟的權力，甚至連人事權也旁落。¹³¹

第四節 天安門事件

經濟改革十年，產生的社會經濟問題與政治矛盾也累積了十年，社會的不滿在 1989 年紀念胡耀邦的活動上一觸即發。1989 年春天，東歐出現了民主化運動。因為東歐民主化運動的鼓勵，知識份子藉口悼念胡耀邦，串聯請願活動，要求中共中央從事政治改革，徹底鎮壓權貴子弟的投機倒把活動。¹³²1989 年 4 月 15 日胡耀邦去世，各界迅速發起悼念活動，同時出現批評鄧小平、趙紫陽、李鵬及其他領導人的大字報；主要批評改革進程停滯，社會貧富不均、政經特權等。¹³³中國各地學生悼念胡耀邦的活動，很快演變成全國範圍內爭取民主的運動。

胡耀邦去世當時家屬要求喪事從簡，同時表達為 1987 年去職總書記不符程序作出結論。¹³⁴當天下午，社科院馬列研究所副所長彭克宏（1937-）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獻上第一個悼念花圈，晚上，紀念碑周圍已經聚集數百人及無數白花與黑紗。¹³⁵隔天北京校園出現許多悼念胡耀邦的大字報，清華大學更出現要求李鵬下台的標語。¹³⁶4 月 17 日，北京大學生迅速串聯，發起募捐響應悼念胡耀邦活動，匯集上萬人遊行隊到天安門向胡耀邦獻上敬意。¹³⁷隨著學潮愈

¹³⁰ 劉魯風，《中華人民共和國要事錄（1949-1989）》，頁 773。

¹³¹ 中共的人事問題，通常由組織部或元老提名，再由常委或政治局討論決定。陳小雅，《天安門之變：八九民運史》，頁 208-209。

¹³²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下冊，頁 944。

¹³³ 陳一諮，《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頁 148-149。

¹³⁴ 胡耀邦下台過程不符中共政治上的設計，因此其家屬要求中共中央應重新討論當時決策過程的瑕疵，還胡耀邦一個公道。吳牟人編，《八九民運紀實》（紐約：無出版者，1989 年），頁 4。

¹³⁵ 高舉，《後文革史》，下卷，頁 233。

¹³⁶ 《爭鳴》雜誌記者組，《英雄史頁》（香港：百家出版社，1989 年），頁 2。

¹³⁷ 中國時報記者群，《北京學運五十日》（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9 年），頁 13；《爭鳴》雜誌記者組，《英雄史頁》，頁 2。

演愈烈，學生轉而要求總理李鵬出面對話。¹³⁸在事件發生初期，李鵬請示趙紫陽時，趙傾向以較和緩的手段，由喬石處理第一線的問題；當時中央常委也認同趙紫陽的處理態度。¹³⁹直至4月22日胡耀邦追悼會舉行，喬石均以汽車將學生帶離天安門，但是並沒有任何官員重視學生的感受並加以安撫，而官方媒體更對少數學生「打倒共產黨」的激情喊話大加撻伐。¹⁴⁰

4月22日胡耀邦的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由國家主席楊尚昆主持，趙紫陽致追悼詞，鄧小平帶頭向胡遺體告別，儀式莊嚴肅穆。¹⁴¹同時會場外聚集眾多學生與民眾，在警方無力清場下，以廣播方式參與追悼會，在謠傳李鵬將出面對陳情書的情形下，期待與李鵬等高層對話。¹⁴²追悼會結束後，參加追悼會的中共高層均未出面對會場外群眾的陳情。隨著中共低調的處理方式，同情學潮的民眾反而增加，並有《科技日報》記者組團加入遊行；¹⁴³同時也促使北京大學生成立「首都高校學生臨時聯合會」，動員學生罷課，要求官員出面對話。¹⁴⁴北京的學潮此時也擴散到其他城市，同樣在官方低調迴避的態度下引發零星衝突。

145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會結束後，23日趙紫陽顯然誤判形勢，按原定行程離

¹³⁸ 4月18日晚，數千名學生擁向天安門廣場，高喊「李鵬出來！」《爭鳴》雜誌記者組，《英雄史頁》，頁4。

¹³⁹ 趙紫陽，〈趙紫陽在1989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收於袁會章主編，《趙紫陽最後的機會》，頁197-216。

¹⁴⁰ 圍觀群眾擁擠，前排學生難免與軍警產生摩擦，而軍警將學生帶入汽車時，也給人抓人的感覺。聯經出版公司編輯群，《天安門一九八九》（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9年），頁58；《爭鳴》雜誌記者組，《英雄史頁》，頁4。

¹⁴¹ 《人民日報》，1989年4月23日。

¹⁴² 當時警方不斷播放「請大家回去！」的廣播，但是並無效果。中國時報記者群，《北京學運五十日》，頁20；陳希同，〈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轉引自高舉，《後文革史》，下卷，頁246。

¹⁴³ 但是大多數媒體仍舊為官方發聲。譚衛兒、梁景雄，〈悼念耀邦，衝出校門〉，《人民不會忘記》（香港：香港記者協會，1989年），頁41。

¹⁴⁴ 《亞洲周刊》編輯群，《驚天動地的一百日-神州民運風雲彩圖錄》（香港：亞洲週刊社，1989年），頁128；《爭鳴》雜誌記者組，《英雄史頁》，頁4-5。

¹⁴⁵ 4月22日，西安市與長沙市都有追悼胡耀邦所引發的衝突。徐惟誠，〈必須旗幟鮮明的反對動亂〉，《人民日報》，1989年4月26日。

開北京到北韓做一星期的訪問，臨行指示處理學潮意見：一、勸阻遊行，讓學生復課；二、組織協商對話，解決學生提出的要求，不可擴大矛盾；三、避免流血，只要不發生打、砸、搶、燒，就不應該採取強制手段。上述趙紫陽的三點理念獲得鄧小平與中央委員會的支持。¹⁴⁶同一天，國家教育委員會主任李鐵映召集北京高等教育單位負責人開會，國家教委副主任何東昌、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1926-)都認為要以強硬態度對待動盪不安的大學生。¹⁴⁷24日北京市委開會，市長陳希同(1930-)等多認為大學生大規模鬧事，是長期以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氾濫，地下組織、非法組織活動猖狂的結果；當晚，李鵬召開中央政治局常會，以陳希同的報告為主要資訊，要求盡快穩定情勢，並由《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將這次學潮定性。¹⁴⁸25日，政治局常委胡啓立與李錫銘向鄧小平匯報當時局勢；鄧小平同意北京市委的分析與建議，認為這次學潮是否定共產主義的政治動亂，必須旗幟鮮明的反對動亂。¹⁴⁹26日，北京市委副書記徐惟誠(1930-)主筆的〈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成為當天《人民日報》的社論(以下稱〈4.26社論〉)，中共官方媒體也立刻宣傳這篇社論。¹⁵⁰

〈4.26社論〉發表後，立刻昇高學生的不滿情緒，學運並沒有如中共高層預期停止，反而激起更多北京市民加入學運，打出「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反對特權」、「懲治官倒」、「打擊腐敗」等口號，並把批評的對象從李鵬轉向鄧小平。4月27日，「首都高校學生臨時聯合會」發動遊行，以言論自由為主要訴

¹⁴⁶ 鮑彤，〈咫尺天涯念紫陽-兼為“六四”十五周年作〉，收於陳一諮、嚴家其主編，《趙紫陽與中國改革》，頁68；高舉，《後文革史》，下卷，頁255。

¹⁴⁷ 高舉，《後文革史》，下卷，頁256。

¹⁴⁸ 陳希同，〈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轉引自高舉，《後文革史》，下卷，頁257。

¹⁴⁹ 北京市委辦公廳編，《一九八九年，北京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紀事》(北京：北京日報出版社，1989年)，頁5。

¹⁵⁰ 徐惟誠，〈必須旗幟鮮明的反對動亂〉，《人民日報》，1989年4月26日。有人認為趙紫陽處理學運態度模糊，是為了解學運發展為有利於己的狀態。陳小雅，《天安門之變-八九民運史》，頁203；馬齊彬、陳文斌、林蘊輝、叢進、王年一、張天榮、卜偉華，《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頁575；徐達深主編，《中國人民共和國實錄》，冊4(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1391；許家屯，《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下冊，頁365；陳一諮，《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頁152-155。

求。¹⁵¹28日，「北京高校臨時聯合會」¹⁵²宣佈成立，與官方支持的「全國學生聯合會」、「北京學生聯合會」抗衡。29日，國務院發言人袁木（1928-）與國家教委副主任何東昌與學生代表對話，但是過程並沒有讓學生暢所欲言，學生代表的代表性亦受到質疑，「北京高校臨時聯合會」不承認這次對話的成果，決定繼續抗爭。¹⁵³30日趙紫陽回到北京後，明確提出〈4.26社論〉是錯誤的。他肯定學潮是一場「自發的愛國民主運動」，他主張再寫一篇社論來進行補救。但〈4.26社論〉的基調是鄧小平定的，趙的主張與中共高層無法一致，雖然獲得學生肯定，卻使其在中共中央孤立而左右為難。¹⁵⁴

5月3日，趙紫陽利用青年節紀念大會發表〈在建設和改革的新時代進一步發揚五四精神〉，對於學運依然保持溫和立場，學運中的部分大學生散去。趙紫陽相信自己能說服鄧小平改弦更張，嘗試以「安撫」一手解決學潮。趙紫陽爲了改變學運的定性，提出〈4.26社論〉的責任由自己承擔，再以其他社論代替，這樣的想法沒有得到支持。¹⁵⁵4日，趙紫陽再利用與亞洲銀行代表見面的機會發表談話，認爲「學生遊行的基本口號是『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擁護憲法』、『擁護改革』、『推進民主』、『反對腐敗』，這就反映了遊行隊伍中的絕大多數學生對共產黨和政府的基本態度：又滿意、又不滿意。……現在學生最不滿意的是貪污腐敗現象。……民眾所以意見這麼大，一是由於法制不健全，缺乏民主監督，以致某些確實存在腐敗現象，不能及時地得到舉報和處理；二是由於公開化不夠，透明度不夠，有些傳言，或是張冠李戴，或是無限擴大，或是無中生

¹⁵¹ 當時遊行人數超過10萬人，沿路受到市民熱情支援食物。中國時報記者群，《北京學運五十日》，頁28-29。

¹⁵² 又稱「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籌備委員會」，北京師範大學一年級生吾爾開希當選主席。高舉，《後文革史》，下卷，頁271。

¹⁵³ 聯經出版公司編輯群，《天安門一九八九》，頁190。其後袁木召開記者會，表明中共不會隨「北京高校臨時聯合會」的對話要求起舞，並申明官方支持學生社團的代表性。《爭鳴》雜誌記者組，《英雄史頁》，頁19。

¹⁵⁴ 趙紫陽，〈趙紫陽六四自辯報告〉，1989年中共第十三屆四中全會發表文稿，收於陳一諮、嚴家其主編，《趙紫陽與中國改革》，頁427-444；許家屯，《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下冊，頁366-371。

¹⁵⁵ 陳翰聖，〈趙紫陽對中國改革的貢獻〉，《動向》，總期235（2005年3月），頁45-48；陳小雅，《天安門之變-八九民運史》，頁212。

有。……當然，腐敗問題是一定要解決的，但這個問題只能同完善法制、民主監督、擴大透明度等措施結合進行。……現在需要廣泛地進行協商對話，同學生對話，同工人對話，同知識分子對話，同各黨派和各界人士對話。」¹⁵⁶這樣的談話內容顯然不符合鄧小平的看法，使得趙紫陽與鄧之間的矛盾公開化。¹⁵⁷在趙紫陽於5月發表立場溫和的談話後，北京大多數學校於5日宣布復課，「北京高校臨時聯合會」也願意派代表與政府對話；但是趙紫陽的溫和立場與改變〈4.26社論〉基調的想法並未獲得支持，李鵬對待學生對話的要求也消極推託，使得11日學潮又被激化，同時上千名記者遞交請願信要求新聞自由，數十名作家也加入支持學潮的行列。¹⁵⁸記者與作家的加入，不但鼓舞了學生，同時也讓中共處理學潮時更為棘手。

5月12日，鄧小平接見伊朗總統時，表示「中國要力爭有個穩定的國際環境和國內環境」重申其穩定局勢，要求學生克制的態度。15日，天安門學生以激進的絕食促使當局重視其聲音，甚至成立絕食指揮部。¹⁵⁹這不但形成李鵬的壓力，同時也讓強調溫和立場的趙紫陽顯出其和解、對話的策略效果不大，因此也造成趙紫陽的壓力。

5月16日趙紫陽接見戈巴契夫（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1931-）趙說：「今天上午你同小平同志的會見，才是兩黨最高級的會晤。七八年以來，鄧小平是國內外、我們黨公認的領袖。……在前年召開的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根據鄧小平同志本人的意願，他從黨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常委的崗位上退了

¹⁵⁶ 趙紫陽，〈趙紫陽接見亞洲銀行年會代表講話〉，《人民日報》，1989年5月5日。

¹⁵⁷ 1988年經濟學家Milton Friedman與趙紫陽晤談，返美演講時曾說：「趙紫陽有一種憂慮，『如果一個領導人不能被充分授權的話，就無法推動經濟改革。』」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香港：青文書屋，1990年），頁1。1988年與Milton Friedman同時訪問趙紫陽的香港學者張五常也認為趙紫陽「要有蔣經國那樣的權力，中國才有希望。」李怡、方蘇，〈專訪張五常：趙紫陽對當前經改的想法〉，《九十年代》，期10，頁17-21。

¹⁵⁸ 5月8日李鵬沒有答覆學生是否對話，並表示5月11日才能做出決定。沈大為，《趙紫陽》，頁284-285。

¹⁵⁹ 參閱聯經出版公司編輯群，《天安門一九八九》，頁191。

下來。但是，全黨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需要他的智慧和經驗，這對我們黨是至關重要的。十三屆一中全會我們黨通過了一個決定，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掌舵。因此，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最重大問題時，總是向鄧小平通報，向他請教。」¹⁶⁰這雖然是不公開的事實，但是趙仍是以「分裂中央」被攻擊，被認為是把責任推給鄧小平。戈巴契夫來訪視中蘇之間重要交流，無法在此之前解決學潮，讓趙紫陽溫和理性處理學潮的方式受到更大壓力。

5月17日凌晨，趙紫陽又發表書面談話，對學生運動的愛國熱情加以肯定，同時要求學生停止絕食，保證不會「秋後算帳」；但是北京示威活動人數卻暴增為百萬人，黨政機關與解放軍也加入其中，甚至出現鄧小平和李鵬下台的標語。¹⁶¹一些知識份子誤判形勢，鼓吹打倒鄧小平，擁護趙紫陽。¹⁶²這些隨學潮產生的政治訊息，顯然讓鄧小平及元老們無法忍受，趙紫陽在中共中央相形孤立。在實行軍管的問題上，最初，鄧小平及李鵬、姚依林堅持軍管，而楊尙昆、喬石和胡啓立則持反對意見。後來，中共高層5月17日在鄧小平家裡開會，在此之前，除鄧小平之外，只有李鵬、姚依林堅持軍管，楊尙昆、喬石和胡啓立則持反對意見；而在這次會議上，楊尙昆、喬石都臨時改變了立場，胡啓立則態度曖昧。¹⁶³

5月18日上午，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啓立等政治局常委到醫院探望絕食學生。中午，李鵬、嚴明復、李鐵映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王丹、吾爾開希等「北京高校臨時聯合會」學生代表，但是李鵬表示中央不能修正〈4.26社論〉的立場，

¹⁶⁰ 《人民日報》，1989年5月17日。

¹⁶¹ 沈大為著，徐澤榮譯，《趙紫陽》，頁288-289。

¹⁶² 包遵信，《六四的內情-未完成的涅槃》（台北：風雲時代出版社），頁135-137。以李洪林、于浩成爲首，發表〈紀念五·四深化改革倡議書-堅持改革確立民主與法治的權威〉，呼籲實現真正的民主選舉與司法獨立。參閱李洪林，《命運》（台北：文統書局，1993年），頁290-291。嚴家其、許良英等發起〈捍衛新聞自由-致中共上海市委的公開信〉，簽名者眾。參閱聯經出版公司編輯群，《天安門一九八九》，頁304；費孝通、馮友蘭等北大教師簽名聲援學生。參閱中國時報記者群，《北京學運五十日》，頁66。

¹⁶³ 許家屯，《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下冊，頁372-374；劉曉波，〈趙紫陽對中國改革的貢獻〉，收於陳一諮、嚴家其主編《趙紫陽與中國改革》，頁250-271；陳一諮，《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頁155-160。

對話仍無交集。北京因此再出現大規模示威活動，上海、天津、武漢、廣州等省市也發生示威活動。¹⁶⁴

5月19日，趙紫陽再度探訪天安門絕食學生，當場發表講話，聲淚俱下。當日學生代表開會，並於晚上九時宣布停止絕食，改為靜坐。¹⁶⁵

5月20日，總理李鵬宣布戒嚴。¹⁶⁶北京市政府隨即嚴格限制新聞採訪，切斷外國電視台國際通訊。¹⁶⁷中共以軍事戒嚴處理學潮的和平請願，引起國際譴責，卻無法改變中共高層以軍事解決學潮的決心。¹⁶⁸趙紫陽則因為「分裂黨和支持動亂」，從此被當局軟禁15年，出入與活動受到限制與監視，直至去世，再也無法公開露面。¹⁶⁹5月24日，鄧小平要求趙紫陽辭去總書記的職位，6月4日派軍成功鎮壓學生運動，同時提拔處理學潮態度強硬的江澤民。¹⁷⁰趙紫陽從一開始就不同意黨內保守派們對學潮作出的評價。在這一點上，趙紫陽無疑是始終如一的。¹⁷¹

趙紫陽被迫下臺，主因是處理學潮的意見分歧，但也牽涉到「批反自由化」的舊帳。所以，6月24日的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的公報說，趙紫陽「主持中央工作以來，消極對待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方針。」¹⁷²學潮

¹⁶⁴ 沈大為著，徐澤榮譯，《趙紫陽》，頁289-290。

¹⁶⁵ 沈大為著，徐澤榮譯，《趙紫陽》，頁290-291。

¹⁶⁶ 〈國務院五月二十日北京部分地區戒嚴令〉，《北京日報》，1989年5月20日。

¹⁶⁷ 中國時報記者群，《北京學運五十日》，頁97。

¹⁶⁸ 美國呼籲中共當局與示威者彼此自制；荷蘭女取消訪問中國；各地中國留學生示威遊行。聯經出版公司編輯群，《天安門一九八九》，頁193。

¹⁶⁹ 趙紫陽於2005年1月17日去世，終年85歲。張昕、張淑華編輯，《趙紫陽終於自由了 趙紫陽逝世風雲錄》，頁14。

¹⁷⁰ 6月6日，袁木再記者會中聲稱解放軍傷者五千多人，群眾二千多人受傷，三百多人死亡，二十三人為學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頁189；許家屯，《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下冊，頁373-380。江澤民當時宣布〈整頓世界經濟導報的決定〉，打壓同情學潮的知識份子。參閱聯經出版公司編輯群，《天安門一九八九》，頁304-306。

¹⁷¹ 陳小雅，《天安門之變-八九民運史》，頁205。

¹⁷² 《人民日報》，1989年6月25日。

之後，趙紫陽下台的原因是「分裂黨」、「支持動亂」，也就是說趙紫陽拒絕下令軍隊鎮壓學生，使黨內意見無法一致。

學潮中「公布領導人及其子女財產」、「反官倒」、「反貪污腐化」這些口號是針對社會不平等而發出的。而趙紫陽的改革思路的真正社會基礎，是在這十年的特殊政治經濟環境培育出來的特殊利益階層，既不希望出現徹底的經濟改革，也不希望倒退到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去，因為後者會使他們喪失了在不平等競爭中的優越地位。¹⁷³

趙紫陽相信用安撫能夠解決學潮。事實證明趙紫陽高估了改革開放在民間的威望，用改革精英的心理，代替民眾的心理。趙紫陽也理想化了某些學生領袖，以為對他們能動之以情，曉之以理。¹⁷⁴在學運擴大之際，各階層與地區陸續響應，但是占人口多數的農民卻沒有跟著響應，顯然農民在這十年經濟改革當中得到滿足，不願加入組織混亂的學運，其結果就是中共保守派勢力雖然受到考驗，但仍然迅速掌握全局。

鄧小平在 1992 年 1 月「南巡講話」中重申「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¹⁷⁵，也就是改革開放不能動搖黨的領導，以至於中共黨內主流思潮偏向改革開放，卻仍不斷掀起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這也是學潮無法及時安撫，演變成天安門廣場的悲劇。¹⁷⁶改革開放與反自由化的矛盾，突顯中共所有問題都成為政治問題，同時也消耗了胡耀邦與趙紫陽兩個總書記，談到這個問題時鄧小平曾說：「兩個人（按：指胡耀邦和趙紫陽）都失敗了，而且不是在經濟上出問題，都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栽跟斗。這就不能讓了。」

¹⁷³ 陳小雅，《天安門之變：八九民運史》，頁 210-211。

¹⁷⁴ 師東兵，《政壇秘聞錄—前中共政要訪談》（香港：港龍出版社，1998 年），頁 432。

¹⁷⁵ 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鄧小平文選》卷 3，頁 398-411。

¹⁷⁶ 齊茂吉，〈揚棄馬列主義才能深化改革-評鄧小平南巡後的大陸情勢〉，《國魂》，期 7，頁 36-38。

¹⁷⁷但是趙紫陽在 1997 年 9 月於中共十五屆人大發表的公開信仍堅持其想法：「第一，那次學潮不管存在什麼偏激、錯誤和可指責之處，但把它定性為『反革命暴亂』是沒有根據的。既然不是反革命暴亂就不應該採用武裝鎮壓的手段去解決。……第二、對那次學潮當時是否可以找到一個更好的方法，既避免流血又可以平息事態呢？我當時提出『在民主和法治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就是為了爭取這種結局。」¹⁷⁸

¹⁷⁷ 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鄧小平文選》卷 3，頁 398-411；王鵬令，〈趙紫陽政改實踐雖敗猶榮-評趙紫陽與鄧小平改革戰略的分歧〉，《動向》，期 233（2005 年），頁 34-36。

¹⁷⁸ 趙紫陽，〈趙紫陽的公開信（1997 年 3 月 5 日）〉，收於陳一諮、嚴家其主編，《趙紫陽與中國改革》，頁 445-447。

第五章 結論

趙紫陽在青年時代便對政治相當熱情，積極投入共黨的活動，這樣的經歷，讓趙在短時間內有機會參與不同領域的工作，表現搶眼。1928年至1937年間，先後就讀滑縣第十七小學、開封第一中學與武昌高級中學，直到1937年7月中日戰爭爆發輟學，加入中共冀魯豫省委黨校學習，雖然沒有受過高等教育，也沒有出國；但是在當時已經是難得的受到完整的教育，使趙紫陽有較豐富的知識與更寬廣的視野。1938年2月，19歲的趙紫陽加入中國共產黨，接著擔任滑縣工作委員會書記、滑縣縣委書記，開啓政治生涯。從1938年到1939年，短短兩年之間，趙紫陽便經歷了黨校、縣委的歷練，協助共產黨在滑縣打下良好基礎。趙紫陽自1938年加入共黨至1951年隨南下工作團南調廣東，共在河南工作了14年，由滑縣的基層幹部到桐柏區的地委書記，升遷非常迅速，其原因除了河南地處為武裝根據地，需要大量基層幹部，趙紫陽受過中學教育，也在基層幹部中比較突出，且這段時間參加「土改」，使其早期的政治生涯便經歷共產黨工作中農業、宣傳、組織的三個關鍵領域，也是趙紫陽得以年僅34歲便當上省級幹部的原因。

1953年至1960年「三面紅旗」結束，中共掀起經濟目的或政治目的的運動，趙紫陽適當的領導與積極參與運動，隨著陶鑄掌握實權，趙紫陽也在不斷的運動中獲得升遷。這段時間趙紫陽職位雖有調動，但其內容都是負責管理廣東農業工作。長期經營農業領域，使趙紫陽對農業的發展與問題有比較深刻的了解，促使其把握文革後全國急於發展經濟的共同心態，能夠準確以「包產到戶」的方式提振農業生產意願。

1960年後，趙紫陽歷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第二書記、第一書記，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處書記，還曾兼任廣東省軍區政治委員、廣州軍區第三政治

委員。1961年趙紫陽升任廣東省第二書記，當時陶鑄以廣東第一書記的身分出任中南局第一書記，所以廣東工作實際上是由第二書記趙紫陽負責。1965年陶鑄升任副總理，46歲的趙紫陽則接替陶鑄成為廣東省第一書記，達到省級權力的巔峰，也是當時全國最年輕的省委書記。雖然有陶鑄的提拔與照顧，但是趙紫陽沒有深厚的軍事背景，卻能在鬥爭激烈的政治圈脫穎而出，同時避開不斷的政治運動的紛紛擾擾，屹立不搖，趙紫陽的工作能力與政治敏銳度都令人印象深刻。

趙紫陽在文革末期復出政壇後，打擊失勢政敵黃永勝雖然不手軟，但沒有藉機株連太多人，也沒有讓「批林批孔」運動發展成擾民的運動，在政治上是成熟的表現。趙紫陽一方面重視生產，一方面利用政治風向保護自己的風格再次顯現。

鄧小平於文革後掌權體認到經濟改革迫切需要，鼓勵務實的經濟改革，於是農業上容許趙紫陽、萬里重新試用「包產到戶」來提振農業產量，工業上則提出經濟特區的概念刺激投資。因此，文革後支持經濟改革、形象開明的趙紫陽、萬里等人，便調到北京成為鄧小平推動經濟改革的助手。鄧小平既要顧及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又必須在經濟發展有所突破，便以「四個堅持」為框架，在農業改革獲得成功後，重用趙紫陽總管經濟。

值得注意的是，趙紫陽在廣東擔任省級幹部時積極配合中央政策，與陶鑄合作推展土改，各種政治運動中都跟隨陶鑄的步調，甚至被認為是極左派；但是在文革後，趙紫陽又以推廣包產到戶與企業改革的形象，晉身中央。因此，擔任總理前，雖然趙紫陽為了在政治圈求生存，其立場也不可避免的隨政治風向搖擺，可以稱他是配合中央政策、工作積極的幹部，但是卻無法稱道其能堅持政治理想。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增選趙紫陽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相對年輕的趙紫陽在61歲時爬上中共黨權力結構的頂端。1981年6月，中共十一

屆六中全會通過趙紫陽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從此確立了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為核心的中共最高領導體系。1982年十二大以後，中共中央分工，總書記胡耀邦主管政治，總理趙紫陽主管經濟。趙紫陽從四川的農村改革一直到以後主持國務院總理的工作，然後主持全國的農村改革、經濟城市改革。趙紫陽在第一線處理經濟上的難題，特別是經濟改革過程中冒出來的一系列複雜的問題，雖然貴為總理，但仍盡力達成鄧小平「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政策；也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四個堅持與改革開放為基本。

趙紫陽成為總理後，積極精簡國務院機構與人事的同時，也藉此鞏固在國務院系統的地位。在鄧小平的支持下，趙紫陽大力促進改革。趙紫陽擔任總理期間，除了領導經濟體制、計劃體制、科技體制、商業體制、外貿體制、稅收體制等改革配套措施外，也勤於巡訪各地，指導改革試點，推廣經濟責任制、廠長責任制、廠長任期制……。但由於改革開放過於急躁的結果，使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過大、失當，社會購買力超過供給，進口增加過速卻又助長物價上漲。各種矛盾始得剛剛起步的新舊經濟體制轉型顯得困難重重，趙紫陽不得不採取放慢改革進度的方式適應。

鄧小平對於改革開放後，隨之而來的反省批評在黨內出現反彈時，便以「資產階級自由化」，違反四個堅持為由加以打壓，卻又不願停下經濟的改革開放。鄧小平在中國經濟改革取得成就的同時，政治上仍然很保守，因此在經濟改革開放與政治立場保守相衝突時，常常遊走兩派之間，有時支持保守的元老，有時支持胡耀邦。1986年的學潮促使胡耀邦下台，趙紫陽於1987年元月被推選為代理總書記。在決定總理繼任人選時，趙紫陽支持陳雲、鄧穎超等元老期望的李鵬，而不是支持鄧小平期望的、立場同樣是改革開放的萬里。1987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趙紫陽被推選為中共中央代理總書記，1987年10月25日，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總書記，並任中共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比

胡耀邦的權位更大。也因為趙紫陽已達中共全力顛峰，一切政治上的鬥爭再也無法避免，而中央軍委副主席則沒有相對應的權力，軍權仍是掌握在軍委主席鄧小平手中，而日常工作則是由常務副主席楊尚昆負責。老人尚且不願退休，保守派不時以反自由化攻擊改革開放，這時趙紫陽的權位可說全靠鄧小平的支持才坐的穩。

1987年，總書記趙紫陽主持十三大，指出：「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這個階段包括兩層含義：第一，我國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我們必須堅持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道路。第二，我國的社會主義還處在初級階段。我們必須從這個實際出發，而不能超越這個階段。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特別指明我國在生產力落後、商業經濟不發達的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過的特定階段。」¹十三大這個觀點比較合乎鄧小平的看法，而且把「堅持社會主義」放在前面，又為鄧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作了說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理論試圖合理化共黨專政與改革開放的矛盾，解釋經濟成長與一黨專政的關係互為因果。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共確定改革開放，全力發展經濟的國策。在1987年趙紫陽成為總書記時，經濟發展雖獲得成果，但是政治上四個堅持的框架下，使得中共無法完全取法歐美國家的經濟發展模式，社會轉型問題衍生貧富不均形成的社會脫序。價格改革完全失控，豬肉、雞蛋、蔬菜、糖的價格開放暴漲，帶動未開放物價的商品，一時呈現通貨膨脹過速，民怨不止，超出鄧小平、趙紫陽的預料；最後只能以行政命令控制物價、採取貨幣緊縮政策、減少投資、甚至以憑票供應的手段來降低通貨膨脹的效應。雖然趙紫陽並不看好價格改革能夠成功，但是趙也沒有盡力阻止，因為鄧小平顯然大力推動這項經濟方案，被視

¹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9。

為改革派的趙紫陽若採取反對態度，只怕會被認為站在保守派的立場說話。價格闖關的失敗，突顯經濟改革的困難與複雜，經濟成長突飛猛進，卻同時衍生許多難以調解的弊病，造成社會壓力，也讓趙紫陽接任總書記後，另一方面必須對經濟困境負責，交出總管經濟的大權。

1979年以來，以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為核心的改革派佔優勢，經濟體制改革得以大規模推展，政治體制的改革需求也越來越大。但是來自保守派的阻撓與干擾不小，而鄧小平在四個堅持之下，其引導的政治風向又變換無窮，政局便經常有「反左」和「反右」的反覆。1985年的經濟失控，使得過去舊體制對改革的限制暴露出來，中共領導人開始討論政治體制隨著經濟改革調適的可能性。1987年初，原本負責政治事務的胡耀邦下台，鄧小平讓負責經濟事務的趙紫陽接任總書記，從而面對政治體制隨著經濟改革開放而被迫改革的複雜局面。「反自由化」運動沒有波及全國，沒有影響經濟改革，被整肅的黨內自由派和知識分子也沒有完全失去人身自由；方勵之、劉賓雁等人的自由化言論在國內外得到更廣泛傳播。可見趙紫陽對知識分子的不同意見是比較能容忍的。趙紫陽是靠改革開放獲得提拔，若改革開放被否定，趙的政途勢必跟著黯淡，所以批判反自由化運動不但合乎趙紫陽與鄧小平的利益，同時也與中共改革開放的政策一致，因此能在胡耀邦下台後，迅速將政治風向轉為改革開放的一方。

鄧小平雖然知道經濟改革開放與政治體制間有矛盾，但是並沒有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決心，而趙紫陽也明白自己的權位全靠鄧的支持，因此討論政治改革便只能在鄧的設限下消極進行，不了了之。

由於趙紫陽容忍了保守派要求胡耀邦下台，他在高層領導中日益面臨形單影隻的局面。一時間趙紫陽不僅失去了主管經濟的權力，甚至連人事權也旁落，即使有軍委副主席的職銜，軍權卻仍牢牢掌握在鄧小平手中。因此，趙紫陽成為總

書記後，推動事務反而更需要依靠鄧小平的權威來排除阻力，同時有必須自律的避開與鄧小平間的矛盾與衝突。

學潮初起時，最令人不解的應該是趙紫陽在緊要關頭卻訪問北韓一星期，以致局勢惡化後，鄧小平的訊息多由立場保守的李鵬、陳希同等提供，最後定下〈4.26社論〉的基調。等趙紫陽回國，趙溫和處理學潮的主張與中共高層已經無法一致，雖然獲得學生肯定，卻使其在中共中央孤立而左右為難。〈4.26社論〉將學潮定位為動亂，這使得各種立場的人不再有模糊空間，同情學潮與壓制學潮的立場不能同時兼顧，當然，中共中央的天平迅速倒向鄧小平的意志。不論趙紫陽的真正心意為何，有胡耀邦的例子在前，即使趙紫陽因為政治風向而與鄧小平配合壓制學潮，但事後追究責任，終會對其仕途產生不利影響。因此，當學潮在〈4.26社論〉公佈後難以控制時，趙紫陽也面臨是否要將政治前途與學潮綁在一起的抉擇。趙紫陽希望透過安撫的手段平息學運，但是對內李鵬等保守勢力無法說服，鄧小平也無法給他充分的時間解決；對外學運既無組織，更無計劃，亢奮的學生極易被少數人煽動，遑論平息事端。最後只能在領導鎮壓，保住權位；或是堅持理念，離開政治中心兩者擇一。

天安門學生以激進的絕食促使當局重視其聲音，甚至成立絕食指揮部。這不但形成李鵬的壓力，同時也讓強調溫和立場的趙紫陽顯出其和解、對話的策略效果不大，因此也造成趙紫陽的壓力。趙紫陽從一開始就不同意黨內保守派們對學潮作出的評價。在這一點上，趙紫陽無疑是始終如一的。學潮之後，趙紫陽下台的原因是「分裂黨」、「支持動亂」，也就是說趙紫陽拒絕下令軍隊鎮壓學生，與黨內意見無法一致。

學潮中「公布領導人及其子女財產」，「反官倒」，「反貪污腐化」這些口號是針對社會不平等而發出的。而趙紫陽的改革思路的真正社會基礎，是在這十年的

特殊政治經濟環境培育出來的特殊利益階層，既不希望出現徹底的經濟改革，也不希望倒退到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去，因為後者會使之失去他們的在不平等競爭中的優越地位。

趙紫陽相信用安撫能夠解決學潮。事實證明趙紫陽高估了改革開放在民間的威望，用改革精英的心理，代替民眾的心理。趙紫陽也理想化了某些學生領袖，以為對他們能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在學運擴大之際，各階層與地區陸續響應，但是占人口多數的農民卻沒有跟著響應，顯然農民在這十年經濟改革當中得到滿足，不願加入組織混亂的學運，其結果就是中共保守派勢力雖然受到考驗，但仍然迅速掌握全局。

中共領導人一方面希望中國富強，一方面「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於是觸及政治制度改革時，便無法有務實的效果；即使趙紫陽在天安門民氣可用的情況下，也不願挑戰黨領導的權威。

從文革結束到 1989 年學潮的後文革時代，鄧小平透過平反迅速復職、掌權，甚至在十二大之後擁有毛澤東般的權力。在掌權的過程中，鄧小平必須與平反的元老們站在同一陣線，從而保障元老們的權力，進而產生政治局常委會成為領導核心，又有黨中央顧問委員會，使得鄧小平的繼承人胡耀邦、趙紫陽，推動經濟改革的同時，無法對抗元老們保守的政治立場。從鄧小平在文革後的作為來看，鄧小平堅定支持經濟改革，同時對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沒有動搖，因此當時勢動盪，保守勢力批評改革，鄧小平便犧牲改革派領袖，代以其他人選繼續經濟改革，以保住經濟改革的成果。

中共領導階層有發展經濟的共識，也堅持黨的領導，反映在政治上，便是不願進行政治制度改革，當 1989 年學潮發生時，面對由下而上的反彈，顯然適應

不良；十年的經濟改革，也沒有形成堅強的、認知一致的領導階層。於是 1986 年底學運造成胡耀邦下台時，趙紫陽並沒有挺身為其辯護；1989 年學運造成趙紫陽下台時，政治局常委會也沒有替趙紫陽辯護。

改革開放與反自由化的矛盾，突顯中共所有問題都成為政治問題，同時也消耗了胡耀邦與趙紫陽兩個總書記。1989 年，胡耀邦去世引發的學潮，把趙紫陽逼入與鄧小平決裂境地，同時趙紫陽無力影響軍隊與中央政治局的缺陷畢露無遺，加上農民並不認同學潮，趙紫陽也因此被中共軟禁終身，無法如同毛澤東掀起文革，扳倒政敵。

趙紫陽青年時代便投入共產黨從事政治活動，文革之前，其精明幹練的能力，在陶鑄的提攜下，積極執行土改，於不斷的政治運動中迅速升遷，以「極左派」的形象成為中共當時最年輕的省級官僚；文革結束前，趙紫陽成為首批被重新啓用的官吏，並在四川嘗試經濟改革獲得成功，與萬里同享改革開放的形象。趙紫陽看準時勢的精明與改善經濟的能力，顯然受到鄧小平的重視，在鄧掌權之後提拔為總理，總管全國經濟，但是鄧小平設計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願景，雖強調經濟發展，但經濟發展卻無論如何不能凌駕在共黨專政之上，因此當改革開放觸及政治問題變成「資產階級自由化」，經濟政策常需要隨著社會問題退卻，趙紫陽在十三大發表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雖試圖調和改革開放與政治保守間的矛盾，卻無法調合社會問題引發的學潮。1987 年造成胡耀邦下台，趙紫陽即使接任總書記，卻失去總管經濟的大權，表面高高在上，權力卻掌握在鄧小平手中，當 1989 年學潮更形嚴重時，趙紫陽失去鄧小平的支持後，既無法溫和平息學潮，也無法以改革開放的形象脫身，終因堅持立場消失政治舞台。

晉身中央前，趙紫陽政治敏銳度高，能力強，也能積極配合中央政策，是一

個精明幹練的官僚，但或許受限於中共習於鬥爭的政治文化，此前的趙紫陽稱不上有政治理想；成爲總理後，趙紫陽執行鄧小平追求經濟改革開放的意志，同時也受限於政治上的「四個堅持」，以致經濟改革難以順利進行，社會轉型的問題接踵而來，承擔價格改革失敗的責任；及至升爲總書記，趙紫陽即使想推動政治改革，沒有鄧小平大力支持，也不容易，等到學潮不可收拾，趙竟能堅持自己的理念，不再依附鄧小平的想法，卻也葬送自己的前途，留下世人一個政治典範。

徵引書目

壹、中文參考資料

一、檔案暨史料彙編

丁望編，《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卷 1、6（香港：明報月刊，1967 年）。

上海市委，《上海年鑒 1988》（上海：統計出版社，1989 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冊 10（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

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綜合組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大事記》（北京：紅旗出版社，1987 年）。

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中共黨史資料》，集 24（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87 年）。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1919.5-1987.1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年）。

中共四川省委研究室編，《四川省情》（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年）。

中共河南省委資料整編委員會編，《中共河南黨史大事記》（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中共安陽地委黨史資料整編委員會編，《安陽地區革命回憶錄選》（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中共研究雜誌社編，《劉少奇問題資料專輯》（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1970年）。

中共研究雜誌社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首長講話及文件選》，上冊（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1983年）。

中共桐柏縣委黨史辦公室編，《桐柏解放區大世紀-戰鬥的十六個月》（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82年）。

中共桐柏縣委黨史辦公室編，《中共桐柏縣黨史大事記-新民主主義時期》（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84年）。

中共滑縣縣委黨史辦公室編，《中共滑縣黨史大事記 1925-1987》，上編（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中共濮陽市委組織部、中共濮陽市委黨史資料整編委員會、濮陽市檔案局編，《中共河南濮陽市組織史資料（1926-1986）》（北京：中國黨史出版社，1986年）。

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編委會編，《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大事記》（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87年）。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王健英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匯編》（北京：紅旗出版社，1983年）。

全國人大常委辦公廳研究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文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郭華倫編，《中共機密文件彙編》（台北：政大國研中心，1978年）。

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鑑（1984）》（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4年）。

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鑑（1985）》（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5年）。

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鑑（1987）》（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7年）。

二、專書

丁望編，《六四前後》，上、下冊（臺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95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 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中心編，《中國人口年鑑 198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

中國人民解放軍裝甲兵政治部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裝甲兵政治部，1969年）。

中國時報記者群，《北京學運五十日》（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9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香港：青文書屋，1990年）。

內政部調查局，《現階段共匪土改策略及其實施》（台北：內政部調查局，1950年）。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合訂本，卷 1-5（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年）。

王恩編，《紅衛兵造反記》，下冊（香港：宇宙出版社，1967年）。

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篇 3（台北：正中書局，1965年）。

尹鳳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簡史》（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出版社，1991年）。

包遵信，《六四的內情-未完成的涅槃》（台北：風雲時代出版社）。

北京市委辦公廳編，《一九八九年，北京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紀事》（北京：北京日報出版社，1989年）。

吉林省中共黨史學會編，《新中國紀事（1949-1984）》（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

- 社，1986年)。
- 沈大為著、徐澤榮譯，《趙紫陽》(台北：日知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2年)。
- 李中洛編，《中國黨政人物志》，集2(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9年)。
- 李英明，《向鄧後時代轉折》(台北：生智出版社，1999年)。
- 李洪林，《命運》(台北：文統書局，1993年)。
- 阮銘，《鄧小平帝國》(台北：時報文化公司，1992年)。
- 吳江，《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香港：鏡報有限公司，1995年)。
- 吳牟人編，《八九民運紀實》(紐約：無出版者，1989年)。
- 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紀研究所，1997年)。
- 金一鴻，《中共土地改革總論》(香港：新世紀出版社，1953年)。
-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論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 《爭鳴》雜誌記者組，《英雄史頁》(香港：百家出版社，1989年)。
- 周明編，《歷史在這裡沉思 1966-1976年記實》，卷3(北京：華夏出版社，1986年)，頁1。
- 政大國研中心，《中共人名錄》(台北：政大國研中心，1978年)。
- 姚孟軒編《匪黨內部鬥爭問題論集》(台北：政大國研中心，1965年)。
- 姜萊宣、張蔚萍、蕭牲主編，《中國共產黨會議紀錄概要》(瀋陽：瀋陽出版社，1991年)。
- 師東兵，《政壇秘聞錄—前中共政要訪談》(香港：港龍出版社，1998年)。
- 《亞洲周刊》編輯群，《驚天動地的一百日-神州民運風雲彩圖錄》(香港：亞洲週刊社，1989年)。
- 徐達深主編，《中國人民共和國實錄》，冊4(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袁會章主編，《趙紫陽最後的機會》(香港：明鏡出版社，1997年)。
- 桑鮑著、陳瑋譯，《趙紫陽：地方幹部到總理》(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88年)。
- 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著、賀和風譯，《漫長的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

- 版社，1975年)。
- 馬齊彬、陳文斌、林蘊輝、叢進、王年一、張天榮、卜偉華，《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1949-1989)》(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5)。
- 高皋，《後文革史》，上、中、下卷(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3年)。
- 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6)》(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
- 許行，《新改革引發新論調，中國經濟改革的探索》(香港：開拓出版社，1985年)。
- 許行，《鄧小平開放時代》，再版(香港：開拓出版社，1988年)。
- 許承宗，《胡耀邦評傳》(台北：著者自行出版，1986年)。
- 許家屯，《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上、下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3年)。
-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1978年匪情年報》(台北：國防部軍事情報局，1978年)。
-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1979年匪情年報》(台北：國防部軍事情報局，1979年)。
- 國家統計局編，《奮進的四十年》(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9年)。
- 寒山碧，《鄧小平評傳(1979-1988)》(香港：東西文化事業公司，1989年)。
- 陸鏗，《鄧小平，改革舵手？歷史罪人》(香港：百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0年)。
- 張昕、張淑華編，《他終於自由了-趙紫陽逝世風雲錄》(加州：博大出版社，2005年)。
- 陳一諮，《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
- 陳一諮、嚴家其主編，《趙紫陽與中國改革》(香港：明鏡出版社，2005年)。
- 陳小雅，《天安門之變-八九民運史》(台北：風雲時代出版事業公司，1996年)。
-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上、下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年)。
- 陳雲，《陳雲文選(1956-1985)》(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 曾慧燕，《中國大陸學潮實錄》（香港：新報出版部，1989年）。
- 楊立，《帶刺的紅玫瑰--古大存沈冤錄》（廣州：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1997）。
- 楊中美，《胡耀邦評傳》（香港：奔馬出版社，1989年）。
- 農業出版社，《人民公社萬歲》（北京：農業出版社，1960年）。
- 趙生暉，《中國共產黨組織史綱要》（蕪湖：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
- 趙蔚，《趙紫陽傳》（北京：中國新聞出版社，1989年）。
- 趙聰，《文革運動歷程述略》，卷2（香港：友聯研究所，1971年）。
- 趙德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67-1984）》（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 黎明華，《中共的土地鬥爭》（台北：政大國研中心，1955年）。
- 齊茂吉，《毛澤東和彭德懷、林彪的合作與衝突（1954-1971）》（臺北：新新聞出版社，1997）。
- 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增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 鄧小平，《鄧小平同志重要講話（一九八七年二月-七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卷3（台北：地球出版社，1994年）。
- 劉吉主編，《中國共產黨七十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 劉守森，《年輕時的趙紫陽》（香港，太平洋世紀出版社，2006年）。
- 劉魯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要事錄》（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
- 廣東葉劍英研究會、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編，《葉劍英在廣東》（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
- 鄭學稼，《從文革到十一大--毛澤東所扮演的最後悲劇》（臺北：黎明文化出版，1978）。
-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
- 曙光圖書公司編，《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言論摘編》（香港：曙光圖書公司，

1988年)。

嚴家其，《我的思想自傳》，增訂本（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0年）。

嚴家其，《政治多麼簡單》（台北：正中書局，1992年）。

嚴家其、高舉，《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上冊（臺北：遠流出版社，1992）。

嚴家其、高舉，《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下冊（臺北：遠流出版社，1992）。

聯經出版公司編輯群，《天安門一九八九》（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9年）。

George Nikolaus Halm 著，賈士達譯，《經濟制度淺說》（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76年）。

三、期刊論文

中共中央華南分局農村工作部，〈中共中央華南分局關於當前穩定生產關係、安定農村生產的指示〉，《華南農村》，期1（1953年6月），頁3-4。

中共滑縣縣委黨史資料整編委員會，〈中共滑縣黨史人物簡介〉，《黨史資料通訊》，期1（1986年1月），頁62-64。

伊凡，〈廣東奪權的曖昧情勢〉，《祖國》，總期41（1967年8月），頁21-23。

余集文，〈中央紅頭文件一覽〉，《九十年代》，期6（1987年6月），頁33-35。

余集文，〈全民怨憤的物價問題〉，《九十年代》，期2（1988年2月），頁52-53。

李怡、方蘇，〈專訪張五常：趙紫陽對當前經改的想法〉，《九十年代》，期10（1988年10月），頁17-21。

李怡、方蘇，〈參與設計者的獻議-高放談政治改革〉，《九十年代》，期12（1988年12月），頁58-64。

李鐵，〈努力提高自己的馬列主義水準-重新學習《整頓黨的作風》的一點體會〉，《紅旗》，期6（1975年6月），頁27-30。

林衛，〈政治體制改革提上日程〉，《九十年代》，期8（1986年8月），頁22-24。

林衛，〈十二屆六中全會的妥協〉，《九十年代》，期11（1986年11月），頁22-25。

- 林衛，〈給李代總理打幾分〉，《九十年代》，期 2（1988 年 2 月），頁 46-48。
- 胡敬一，〈我在滑縣搞建黨工作的情況回憶〉，《黨史資料通訊》，期 1（1986 年 1 月），頁 23。
- 宮校聞，〈要有一個全面規劃〉，《紅旗》，期 2（1975 年 2 月），頁 22-23。
- 紅旗雜誌編輯群，〈必須正確地對待幹部〉，《紅旗》，期 4（1967 年 3 月），頁 5-11。
- 紅旗雜誌編輯群，〈吸收無產階級的新鮮血液-整黨工作中的一個重要問題〉，《紅旗》，期 4（1968 年 10 月），頁 5-12。
- 區夢覺，〈古大存馮白駒的錯誤在哪裡？〉，《新華月報》，總期 141（1958 年），頁 43-45。
- 徐元旦，〈關於建立現代市場價格體制的初步構想〉，《貴州社會科學月刊》，期 3（1993 年 3 月），頁 6-10。
- 許行，〈五屆人大四次會議引起問題〉，《爭鳴》，期 1（1982 年 1 月），頁 18-20。
- 陳一知，〈胡耀邦下台的軍隊因素〉，《九十年代》，期 8（1987 年 8 月），頁 57-60。
- 陳翰聖，〈趙紫陽對中國改革的貢獻〉，《動向》，總期 235（2005 年 3 月），頁 45-48。
- 曾慧燕，〈黨的政策變，我始終沒變-吳祖光加州的一席話〉，《九十年代》，期 12（1987 年 12 月），頁 18-20。
- 童顏怡，〈北京：無盡的憂慮〉，《九十年代》，期 6（1988 年 6 月），頁 35-37。
- 陸京士，〈北京訪察實錄〉，《九十年代》，期 7（1987 年 7 月），頁 27-31。
- 張偉國，〈開放改革的「精神領袖」——趙紫陽〉，《動向》，總期 233（2005 年 1 月），頁 27-33。
- 楊波，〈匪晉冀魯豫邊區老根據地〉，《匪情研究》，期 325（1965 年 4 月），頁 81。
- 楊奎松，〈淺談中共歷史檔案的利用與研究〉，《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 27 期，1999 年 3 月，頁 137-155。
- 董瑞麒，〈大陸農村股份合作企業的發展趨勢〉，《中國大陸研究》，卷 37 期 5（1994 年），頁 33-35。
- 趙紫陽，〈鞏固第一批社，辦好第二批社，迎接互助合作運動高潮〉，《華南農村》，

- 總期 18 (1954 年 6 月), 頁 3-5。
- 趙紫陽,〈大搞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 加速農民思想的無產階級革命化, 廣東農村開展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的基本情況和經驗〉,《紅旗》, 期 10 (1966 年 8 月), 頁 14-25。
- 趙紫陽,〈奮發努力加快四川建設, 爲國家爲人民多做貢獻〉,《紅旗》, 期 1 (1978 年 1 月), 頁 16-23。
- 齊辛,〈從進口狂潮到緊急剎車〉,《九十年代》, 期 6 (1985 年 6 月), 頁 47-51。
- 齊辛,〈高層人事塵埃初定〉,《九十年代》, 期 5 (1987 年 5 月), 頁 35-37。
- 齊辛,〈揭開北戴河會議的面紗〉,《九十年代》, 期 9 (1988 年 9 月), 頁 16-19。
- 齊茂吉,〈揚棄馬列主義才能深化改革-評鄧小平南巡後的大陸情勢〉,《國魂》, 期 7 (1992 年 7 月), 頁 36-38。
- 蔣化,〈趙紫陽-鄧小平左右的第二號人物〉,《南北極》, 期 4 (1980 年 4 月), 頁 23-24。
- 劉孔伏,〈中國落伍是近代才開始的嗎?-大陸歷史學界對中國近代社會性質問題之爭鳴〉,《明報月刊》, 期 7 (1989 年 7 月), 頁 84-87。
- 劉相齊,〈農工商聯合企業-中國的一種新事物〉,《經濟報導》, 總期 1667 (1980 年 4 月), 頁 25-27。
- 薛光軍,〈乾坤浩氣存-深切懷念陶鑄同志〉,《紅旗》, 期 1 (1979 年 1 月), 頁 46-53。
- 錢太康,〈趙紫陽評傳〉,《當代》, 總期 5 (1981 年 1 月), 頁 22-25。
- 錢太康,〈趙紫陽評傳〉,《當代》, 總期 6 (1981 年 2 月), 頁 15-19。
- 顧益民等,〈大陸留美學生公開信〉,《九十年代》, 期 3 (1987 年 3 月), 頁 93-95。
- 羅冰,〈趙紫陽報告受批評〉,《爭鳴》, 期 1 (1983 年 1 月), 頁 12-15。
- 羅冰,〈震撼中南海的學潮〉,《爭鳴》, 期 11 (1985 年 11 月), 頁 6-10。
- 羅冰,〈陳雲抓住胡趙痛腳〉,《爭鳴》, 期 1 (1986 年 1 月), 頁 6-8。
- 羅冰,〈胡耀邦事件真相〉,《爭鳴》, 期 2 (1987 年 2 月), 頁 7-10。
- 李冬華,〈中共「胡趙體制」之研究〉(桃園: 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1984年)。

胡國君，〈趙紫陽崛起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1981年)。

陳漢昕，〈趙紫陽之研究-經濟路線探源〉(桃園：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1982年)。

國安民，〈八十年代中共改革派之興起與變遷〉(桃園：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年)。

翁振發，〈中共國務院之研究〉(台北：文化大學大陸問題研究所碩士論文，1982年)。

盧伯華，〈趙紫陽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年)。

四、報紙、其他資料

《人民日報》，1952年-1989年。

《四川日報》，1976-1979年。

《中國文化報》，1986年。

《中國青年報》，1986年。

《光明日報》，1987年、1989年。

《南方日報》，1955年、1967年-1968年、1974年。

《解放軍報》，1968年、1977年。